

## 目 录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王芸生 曹谷冰 (1)

“宁粤合作”亲历记……………陈铭枢 (45)

“非常会议”前后……………周一志 (82)

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孟 曦 (101)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贺贵严 (112)

### 短稿十篇

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恽宝惠 (119)

郑汝成之死……………陈一叶 (120)

袁世凯之死与唐天喜之背叛……………陶树德 (121)

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的经过……………邓汉祥 (122)

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郑庭笈 (123)

九六公债发给利息的一段公案……………周士观 (125)

一九三〇年阎锡山反蒋的一个起因……………南桂馨 (126)

回忆张家口抗日同盟军……………魏自愚 (126)

李生达之死……………王尊光 (127)

关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的一些补充……………宋希濂 (128)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王化一 (131)

东北抗日军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张凤仪 (148)

## 附注

对《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十二辑一五五页、第十八辑二  
二〇页

对《“宁粤合作”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十二辑一五六页

对《“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  
辑》第十八辑二二一页、第二十三辑二二七页

对《郑汝成之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  
二十三辑二三二页、第三十四辑二五八页

对《东北抗日军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一文的补  
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三三页

## 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在旧中国，大公报是创刊比较早也比较重要的报纸之一。它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斂之。到一九一六年九月，英斂之将大公报盘售与王郅隆。王郅隆接手经营后，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九个月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续刊，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大公报于六月十七日发表《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归于人民所有。由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旧大公报共有四十七年历史。我们叙述旧大公报的历史，拟分为两段：前段叙述英斂之经营的时代，而将王郅隆续办的时代附入，统称为“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后段叙述吴胡张时代的旧大公报。这里谈的是前段。

### 一九〇二年这个历史年代

“新闻事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①旧大公报创刊于一九〇二年的天津，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一

① 廖盖隆：《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办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见《新闻战线》一九六〇年八期三页。

九〇二年是个重要的历史年代。这年是庚子年义和团起义的第三年，辛丑条約簽訂的第二年。大公报創刊的日子，距离八国联軍攻破天津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四日）不滿两年，距离辛丑条約的簽訂（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还不滿一年。这时候，天津还被八国联軍占領着，由八国联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統治着。大公报在这时候創刊于国破民奴的天津，而且报館就設在天津的法国租界里，真可謂不平常。

庚子起义，是由反帝反教而起。天津人民曾經掀起两次反帝反教的大风暴：一次是一八七〇年火烧望海樓的教案，再一次就是庚子起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天主教徒假借洋勢欺压同胞，就訴諸烧教堂打教徒的直接行动。旧大公报創辦于帝国主义直接統治下的天津，而且是由天主教徒主办，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自然是很清楚的。

时代是在二十世紀初，这时中国的資產阶级已經初步形成。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完全由民間举办的厂矿企业，資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已有一百二十二家，資本总数为二千二百七十七万元<sup>①</sup>。戊戌变法，就是新兴資產阶级的維新运动的演出。这时候，新兴的資產阶级正在发展，戊戌变法的思想正深刻地影响着資產阶级知識分子。旧大公报創刊的編輯思想，也反映着資產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这是为資產阶级（包括买办資產阶级）利益服务的。

### 英斂之这个人

英斂之（一八六六——一九二六）这个人是很自負的。他在壬寅（一九〇二，即創辦大公报的那年）日記的扉頁上題着这样一首

<sup>①</sup> 吳玉章：《辛亥革命》二至三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詩：“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闊立多時。”

英斂之，姓英名華，字斂之，又號安塞，滿洲正紅旗人<sup>①</sup>，一八六六年生於北京。他的妻子是皇族，姓愛新覺羅，名淑仲。英斂之幼年家貧，出身寒微。據說他的父親和長兄都是體力勞動者，英斂之自我奮鬥，讀書靠自修。由他起，英家轉換了門庭，階級起了變化。英斂之的文集《也是集》《自序》說：“仆以一武夫，不屑於雕虫刻篆。願石可掇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馬步之射十中其九，每借此自豪。然此等伎倆，見遺於社會，無補於身家，遂棄之。弱冠後知耽文學，則又以汜濫百家、流覽稗史侈淵博；甚至窮兩月之目力，讀《四庫提要》一周，亦足見其涉獵之荒矣。”他所以習武，因為旗人照例要學武，並且可以入軍籍，得糧餉。他少年時致友函中有一節說：“予以家貧親老，無以為養，兼之多事待了，債負滿前，每以拙于生計為憂。故自挽弓操臂，俟挑入勇時，得補糧餉，尚為一綫之路。所以不憚煩勞，每日挽六力弓逾百勝也。但祝彼蒼，憫予苦心，曲賜矜全，則一枝有托，不復奢望矣。”可見他少年習武是為了生活，苦讀學文，希望得到一個可以維持生活的職業。英斂之自二十二歲信奉了天主教<sup>②</sup>，自習了一些法文，從此和天主教以及一些外國神甫發生了關係。據說英斂之在三十歲以後才結婚，這時他已經

<sup>①</sup> 關於英斂之是否滿洲旗人，曾經考證。《清史稿》中《文苑三》《斌良傳》內附有《英華傳》云：“英華，字斂之，赫佳氏，正紅旗人。”赫佳氏是滿族的姓氏，如愛新覺羅氏、叶赫氏、瓜爾佳氏等。英斂之和金梁友好，金梁參與《清史稿》的編纂，遂將《英華傳》編入《清史稿》。這個短短的傳稿是經過英斂之的同意的。據《欽定八旗氏族通譜輯要》上卷三十七頁載：“赫佳：原註，赫佳為滿洲一姓，其氏族世居雅蘭及訥音地方。”英斂之是滿族人是毫無疑義的。

成了文人，經他學文的老師介紹，與愛新覺羅淑仲結婚。英斂之的《也是集》內附有淑仲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所作的詩四首，韻律甚工，文化程度很高，不是寒家女子。英斂之以一個滿洲旗人，生在滿清末季，朝廷腐敗，外患嚴重，他一面恨家國不振，同時接觸到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潮，因此在崇洋思想中希望變法維新。在康有為“公車上書”之後，英斂之也在戊戌三月（一八九八年四月間）寫了一篇《論興利必先除弊》的文章，議論國事。文中把北京諺語所說“皇上是傻子，王爺是架子，官是搜子，兵是苦子”的話加以闡釋；文章并附和了康有為的政見：“康主政有為膠州疏內‘蔽于耳目，狃于旧說’諸語，實今日之頂門針、對症藥，痛快切當，言人之不敢言。”頂到這年九月“戊戌政變”，慈禧再出訓政，光緒被囚，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康有為逃亡，英斂之恐被株連，也逃至天津，搭太古“重慶”號輪船去上海。他在船上遇到康有為，彼此交談，不知姓名。這可見當時他和康梁維新派還沒有聯繫。據現在的英斂之的日記，他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得到了一個職業，充當法國駐蒙自領事館的館員。蒙自縣在雲南南部，滇越鐵路經行其地，一八八七年依據《中法續議商務專條》，辟為商埠。英斂之於一九〇〇年二月初偕法國領事從天津啟程，經過上海、香港、海防、老街至蒙自。英斂之到蒙自的時候，法國正在籌劃建築滇越鐵路，他在蒙自幫助法領事購買民間土地。在蒙自地方，法國和天主教的勢力已深深侵入，在英斂之等到來之前，蒙自曾經發生過燒教堂打神甫的反教事件；英等到後，又傳當地人民將繼續起來鬧事。因此法領事要求中國地

② 據英斂之《雜存稿》中《曾侯日記書后》一文中說：「予自二十二歲信教以來，至今已近五載。」一八九二年壬辰年作。據此知英氏生於一八六六年，并自二十二歲信奉天主教。

方当局允許他們調法国兵来保护領事館，中国未允。随后听到义和团在北方起义以及八国联軍攻入天津北京的消息，英斂之感到心神不安，想辞职北返，另寻职业。法領事也担心地方不靖，决定离开蒙自。在七月中旬，英斂之随法領事离开蒙自，經越南、香港、上海，于八月下旬回到一片殘破的天津。到九月中旬法領事准英辞职，給他最后的一次薪水五十元完事。英在天津勾留了一个多月，因大乱之后，津京交通多阻，未能去北京，在天津也寻不到职业，乃于十月中旬借法国“白神父”南行之便，同船到上海。英到上海后，也找不到职业，妻儿相随，开销不小。他先給一个名叫“温伯彦”的英国人教“官話”，以后又給华俄道胜銀行的一个比利时人“欧某”教話，又給荣华洋行一个名叫“翁德林”的德国人教話。每天早午晚分三次到三处各教話一小时，翁德林月送“束修”十元，其他二人的学費大概也是这个数目。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无聊的。在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英斂之又从上海回到天津。

这次回到天津，情况不同了。一个天主教徒資本家柴天宠提議集股开办一个报館，由英主持。此事极为順利，經過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到轉年（一九〇二）夏就創刊了《大公报》。一九〇五年夏英斂之应日人之邀，游历过日本。英斂之主持大公报十年，到一九一二年，“大清”皇朝倒了，民国成立，他就沒有办报的兴趣了，从此退休，移居北京香山靜宜园。至一九一六年将大公报出兌給安福系資本家王郅隆。（英斂之創辦大公报，由提議到办成的具体經過，詳述于下节。）

英斂之退居北京香山靜宜园后，专心钻研天主教义。因所居靜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論文，出版了一本《也是

集》。英因主持大公报而馳名，退休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首領，当时有“南馬北英”之說。南馬是馬良，字相伯。英、馬二人有几十年的交情。英和熊希齡的关系也好。一九一七年华北大水災，熊任賑災督辦，在北京設慈幼局，聘英为局长。一九二〇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为香山慈幼院，英不久即辞职。英在香山設立“靜宜女学”，又設立“輔仁社”，教学生“学文”，宣传天主教。英斂之又以美国的关系，在北京設立“公教大学”，后改为“輔仁大学”，自任第一任校长。英晚年在北平办教育，办慈善；每年冬天募賑款，在香山开粥厂，賑济貧民，所以在地方上頗得附近居民的好感。英斂之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在北京病逝，年六十岁。

### 当时这个报的階級背景

报纸从来就是階級斗争的工具。旧大公报創刊于一九〇二年的天津，其时其地，都是极不平常的。那末，它的階級背景是什么呢？研究了有关的历史資料，我們弄清了旧大公报的階級背景。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是由一个受天主教教养的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滿洲旗人，利用天主教和法帝国主义的势力和一部分金錢，以及买办資產階級等的投資办起来的一家报館；这可說是一个以滿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結合法帝国主义、买办資產階級等的混合物。

英斂之夫妇都是清皇朝的本族，出身于天主教徒，深受天主教的影响。英又結交了許多买办資產階級分子，他个人也变成一个帶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英斂之一身表現着两个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另一个是階級矛盾。在民族矛盾方面，他坚决站在滿族保皇的立場；在階級矛盾方面，他一般地是跟着买办



資產階級走。英斂之最初的一个职业(駐蒙古法國領事館館員)就来自天主教的关系，所往来接触的尽是中、法、比各国的天主教人物；当时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思潮的影响，头脑里搞成一套君主立宪的思想体系，以为救国之道只有保皇立宪以永保“大清天下”的一条路。英斂之的言論主张，主要在于保皇立宪。他呼吁慈禧太后撤帘归政，拥护光緒皇帝亲政；在保皇的条件下贊成維新，坚决反对共和革命。他是个滿族保皇派，他的保皇主张，比康梁还坚决得多。为了实现保皇立宪的理想，为了达到永保“大清天下”的目的，他就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投靠洋人。英斂之头脑里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保皇与崇洋。他保皇保到辛亥革命以后，“大清”皇朝完了，就洗手不办报了；崇洋崇到滿脑子的“二毛子”思想。

我們研究旧大公报的历史，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它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旧大公报在一九〇二年創刊于天津，館址在法国租界，报头上加刊一个法文名字“L'Impartial”(无私的意思)，决非偶然的事情。我們最初总以为英斂之是天主教徒，主要的股东也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所以旧大公报就沾染上亲法的色彩。現在明白了問題真相并不这么简单，而是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在政治上托庇于法国的势力，在經濟上也摻入了法国的金錢。据英斂之的辛丑日記，他在一九〇一年春天由上海回到天津，环境是国破家亡，个人情况也极其无聊。他回天津的第三天(四月二十六日，旧历三月初八日)，首先去看柴天宠，并送了一些礼物給柴，柴約他到家里吃午飯。日記上即說：“柴先生等愿設报館，約予主持其事，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賠垫云云。”柴天宠，字數霖，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总管。柴是个天主教資本家。他最

初經營一个“天和号”，专售建筑材料，并承包各种建筑工程，由于承包天主教堂及教堂房产的工程发了財。紫竹林教堂的产业和外交事务皆由他負責，并兼管教务，总管一切。由于有錢，他还投資經營各种工商企业。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郅隆，字祝三，天津东大沽人。他的先人是代粮商掌管运粮船的，他本人作粮食和木厂的捐客，又經營元庆木号兼包工，因此与柴天宠有联系。王好賭博，会“吃腥”（賭博作弊騙人），在賭場上贏了很多錢。他就因为賭博的关系，联系上北洋軍閥，特別勾結上倪嗣冲。倪嗣冲任安徽督軍时，委任王郅隆在天津設安武軍后路局，以王为总办。王以整列火車运大米到天津，不出運費，把米卖給日本，大賺其錢，成为安福系的官僚資本家，是个亲日派。英斂之于一九一六年把大公报卖給了王郅隆。据說王郅隆购买大公报館，錢也不是他自己出的，而是安福系几个大头目在天津安徽会馆賭博抽的“头錢”。天津方面拿錢入股的重要人物，还有张連璧，字少秋。他和他父张丹秋两代經營德商荣华洋行买办事务。荣华洋行經銷德国五金顏料杂货，所以张氏父子又先后開設恆义号洋广杂货店、万聚恆洋广顏料店、瑞記布庄等，接售荣华洋行的来貨。张連璧很有錢，現在天津承德道上的“連璧里”，就是张所建造，并以他的名字名此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股东名李敬字，天主教徒，是天津法国領事館的高級翻譯，此人后来入了法国籍。柴天宠一面在天津募股，英斂之一面到北京按照天主教的教規向法国主教“請示定夺”。法国“樊主教”（华名樊国樑）贊成办报，并入十股。一九〇一年八月四日（旧历六月二十日）日記云：“进堂望弥撒訖，遇樊主教云：……法欽使亦愿入报館股，但愿开于京中。予思有法欽使，規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但天津諸友必以为不便設于京中，恐多不愿入股者，俟后

商之可耳。”<sup>①</sup>这里所記的法欽使，就是  
 签字于辛丑条約之上的法国公使鮑渥。  
 (樊主教所入的十股是多少錢，以及法国  
 公使入了多少股和多少錢，現尚无从查  
 考；英斂之对法公使的入股是很重視的，  
 他的日記說“予思有法欽使，規模固可扩  
 大”，可見一斑。)英即函詢天津柴天宠，  
 柴复函云：“設館無論京津，津友皆愿，但  
 求勿拒我等入股本，为幸。”这說明柴等  
 是愿意同法国公使合伙开这个报館的。  
 事情还有曲折，八月十七日(旧历七月初  
 四日)日記云：“由津至京，进堂見樊主教  
 云：当速办，現已令人画房样。始知欲設  
 堂中，大不便，然未遽駁，俟商之津友。”  
 法国人同中国人合伙办报，要把报館設  
 在北京天主教堂里，的确太笨了，而英斂  
 之却“未遽駁”。他写信問天津，柴天宠  
 李敬字来函，皆不贊成設于教堂中。八  
 月二十七日(旧历七月十四日)日記云：  
 “复見主教，蒙示以現与欽使商妥，立于  
 津上为便。予即云：此事已定，愈速愈  
 妙。”这可見公使比主教高明。大局既  
 定，英即回天津，携带款項到上海訂購机

二十日  
 星期進中堂  
 使六股入報館股但願開於京中予思有法欽使同  
 可大  
 消息之  
 但天津諸友必以為不便設於京中  
 恐多不願入股者俟後商之可耳

(英斂之日記)

① 有照相鋅版为証。

器聘請主筆去了。

英斂之九月二十一日到上海，二十四日即至中外日報館訪汪穰卿，請汪代荐一位主筆。汪穰卿名康年，是上海当时的名士。<sup>①</sup>在英請汪荐主筆的一段交涉中，証实旧大公报接受了洋款，因此使汪穰卿等羞与为伍。此事值得一記。汪穰卿推荐了一位姓蔣名智由字心斋的堪为主筆。<sup>②</sup>十月五日(旧历八月二十三日)晚，汪穰卿在四馬路万年春設宴介紹英、蔣見面。同席者还有：杭辛斋、廉惠卿(此二人正筹备在北京办报，到上海购机器)、汪建斋(名立元，是汪穰卿的族弟)、梁幼海、史子岩、朱志尧<sup>③</sup>。英的日記說：“穰推予首座，予未肯，飯时极久，旋陸續去。穰及建斋与蔣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sup>④</sup>这是汪蔣三人劝英勿用外国人的錢办报。轉天，十月六日(旧历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說：“书致穰卿一函，告其不能却洋款情由。”<sup>⑤</sup>这是說他办报不能不接受外国人的錢，而且是法国公使的錢。从此聘請主筆的事就发生了波折。据英斂

二十四日  
早九點進中法大藥房  
與山西田治直話  
長發棧與史子岩約  
年以晴明可同  
建斋与蔣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  
日已十點  
歸  
海陝籍生京中  
蔣智由心斋即汪荐予主筆者  
史子岩致  
堯及予穰推予首座予未肯飯时极久旋陸續去穰及  
建斋与蔣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  
日已十點  
歸  
海陝籍生京中  
蔣智由心斋即汪荐予主筆者  
史子岩致

(英斂之日記)

之的日記，十月八日（旧历八月二十六日）：“晤蔣心齋，詢其愿否北上？答云：恐难得昌言之权，故不愿去。予乃告以論說准各具名，不相混淆。俟后再議。”十月十日（旧历八月二十八日）晚，英在江南春宴客，主要的客人是汪穰卿和蔣心齋。“蔣告現同赵祖德开办《选报》，不能北去。”蔣心齋謝絕了英斂之的邀請。英此夜“臥不成寐”。此事原可至此而止，忽然异峰突起，十月十三日（旧历九月初二日）的日記說：“是日得志尧函云，汪穰卿毛遂自荐，愿去本館，

- 
- ① 汪康年，字穰卿，是《时务报》的中心人物。《时务报》创刊于一八九六年，梁启超任主笔，汪任經理。一八九八年汪另出《时务日报》，后改为《中外日报》。英斂之到上海聘主笔时，汪正办《中外日报》。汪以后又在北京办《芻言报》。汪属于强学会系统，是保皇派。
- ② 蔣智由，字心齋，别号观云，他的儿子蔣尊簋在民初做过浙江都督。蔣智由是上海文化教育界有名人物，他曾同蔡元培、林少泉等发起中国教育会，借此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工作。中国教育会分子开办爱国女学，蔣被推为經理（当时无校长名称）。蔣智由当时被目为新党，他当然不肯帮助英斂之去办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报了。
- ③ 朱志尧这个人很重要，是英斂之在上海的几十年好友，与旧大公报有密切关系，是旧大公报的股东。朱志尧（名开甲），是馬相伯的外甥，生长于累代天主教徒的家庭中，他本人也是天主教徒。在旧大公报创刊时期，他已在法国东方汇理銀行中服务，以后在这个代表法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銀行做了几十年的买办。他是个买办資本家，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是他投資創办的，以后又陆續搞別的企业，他曾投資开办上海南市华商電車公司，因此上海南市的電車大部分是由求新机器造船厂制造的。这个人是上海天主教徒中典型的买办資本家。現在見到朱志尧的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下列的十項职銜：“教皇欽賜圣西尔物斯德賓騎尉助位；三等嘉禾章；上海总商会費城賽会代表；上海公教进行会副会长；上海华商电气公司董事；上海大通輪船公司董事；上海求新机器造船厂董事；安徽宝兴鉄鑛公司董事；上海新祥制造机器厂主任；上海同昌紡紗榨油公司主任”。其中单单未列东方汇理銀行華經理的职銜，大概是有所諱吧。

④⑤ 同見一張照相鐸版。

明日可将合同眎予。予得信甚为詫异，意其别有隐衷。日前力阻予，万不可入洋股，謂定遭压制，今反欲就何也？然予以为苟有益于报事，不妨曲从之。因其交游博，声誉隆，既消息灵通，复銷售寬广，虽月出百金以上，犹为得也。岂不較碌碌凡庸远过十倍哉？”十月十六日（旧历九月初五日）日記云：“汪穰卿寄所訂（拟）合同来，見其欲独攬大权，薪水但索五十元。”英是夜又“臥不成寐”，“挑灯作复穰卿信，并酌改合同。但其与設报宗旨不背，一切小节，予頗可曲从，因开創需人，伊又为老手故也。”十月二十三日（旧历九月十二日）的日記云：朱志尧轉到汪穰卿函云：“所議不符初約，深恐不易措手，只得敬謝不敏”云云。汪已明白謝絕了，但英仍不死心，日記續云：“予見其前日晤商情形，似有成議，意其今故作波瀾，以要挾大权独握也。”二十六日（旧历十五日）日記云：“予意如无合适主笔，可姑允穰卿襄办一年，彼时再作打算。”二十八日又到汪穰卿处面商，“以索薪水太昂，故不能延至。”这是汪穰卿以索高薪的办法打断了这段交涉。英斂之欲聘蔣汪二人，先后失敗，求計于馬相伯，馬建議商之张元济（字菊生），另荐他人。英曾几次訪张，张不肯荐人。十月三十一日（旧历九月二十二日）日記云：“馬公（相伯）東云：得张菊生函云，报出自旗人，尤难。自当尽力襄助，主笔任重，未敢輕举，好在尙有时可商，当加意为之訪詢云云。”这是說，张菊生不愿意給滿洲旗人办的报推荐主笔。英斂之这次上海之行，訂购了机器和鉛字，請主笔的事失敗了。他于十一月三日登上回津的輪船，在船上悶讀《天演論》。五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日記云：“竟日臥，头悶，大不快，甚悔此次之行为大寻苦恼。”

英斂之回天津后，往来津京，筹备报事。十二月初又到上海，仍求汪穰卿介紹主笔，汪这次推荐了一位方守六，条件談妥了，訂

了合同，于一九〇二年四月上旬同船到了天津。方守六是帮助英斂之创刊大公报的第一位主笔。

鑼鼓漸漸紧了，大公报館要开张了，英斂之于五月三日（旧历三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天主教堂訪樊主教，此日的日記云：“晤樊主教云：法欽使已应保护之事。”这是法国公使鮑渥正式应允保护大公报了。‘距离大公报出版第一号报的前七天（一九〇二年六月十日，旧历五月初五日），天津法国領事館的高級翻譯李敬宇，“以工部局告示囑印，旋印成送去。”（据英的日記）大公报的新印刷厂还未印报，先給法国工部局印了告示，可見英斂之的大公报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了。

从这段办报緣起看，英斂之原无办报之意。他于一九〇一年春天，在上海穷极无聊，回到一片殘破的天津，他所汲汲以求的，只是要謀得“一枝有托”，以解决职业和生活問題。是柴天宠提議办报館，并愿“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賠垫”。据英斂之日記，在柴天宠提議办报的一个多月以后，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五日（旧历四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云：“张寿峰来，告以刘鐸来，遂至堂，候有时，晤，刘鐸聞主教等議，令予至北堂办理要紧文件，薪水从丰云云。予謂此間报館事已有头緒，中輟頗为可惜。”这是說假使不是柴天宠提議办报在先，英斂之的职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天主教堂为主教办理要紧文件了。按照历史規律，象旧大公报这样一张为某个帝国主义和买办資产阶级以至为传播洋教的利益而服务的报纸，在华北是終究要出現的（以后的天津益世报就是一个），但办报的人就不一定是英斂之了。是柴天宠独具只眼，看出英斂之有办报的才干；他当然不是简单地为了給英斂之解决职业問題，更主要的是“柴先生等”为了他們的阶级利益有办报的需要。柴天宠等需要英斂之办报作

天主教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法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也愿意有这样一张崇洋抑华为帝国主义利益说话的报纸供它利用。英敏之崇教崇洋，胆大能文，有办报的能力；有报在手，职业问题解决了；用这张报，为了天主教买办资产阶级和法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他还有一个也很根本的想法，就是为了满洲人的利益以永保“大清天下”而服务。所以一拍即合，大公报就呱呱出世了。

大公报的最初馆址设在天津法国租界狄总领事路(Rue Dillon, 一名六号路乙,即现在天津哈尔滨道四十二号),对门就是法国工部局,隔一条街就是法国领事馆,当时八国“都统”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国 General Jefeve。大公报就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旧历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受着法帝国主义的直接保护而诞生了。第一号大公报印了三千八百份。

英敏之是旧大公报的主要创办人,他自任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英本人是满族保皇派,又是天主教徒。倡议办大公报和最初的投资人多数是天主教人物,如同柴天宠是天主教资本家,张少秋、朱志尧是买办资本家,王邺隆是投机商人官僚资本家,李敬宇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樊主教、雷鸣远等是外国神甫;更突出而也特别隐蔽的是法国公使鲍渥也投资为股东,这是正式的帝国主义。此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翻译《天演论》也主张君主立宪的严复就入了一千元的股。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的大公报登有通知股东“改用新票……分派红利”的广告,可见还有若干小股东,大概都是天主教徒和资产阶级分子。从阶级关系来看,英敏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乃是一个以满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结合法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混合物。旧大公报既是这样的阶级产物,它就为这样的阶级利益服务,这就规定了旧大公



報言論編輯的方針和內容。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旧大公报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

近代的中国新聞事业,在初期比較站得住脚的報館,几乎都同帝国主义有关系。上海申報开办于一八七二年,是英国人美查办的;上海新聞報开办于一八九三年,是英国人丹福士办的,以后于一八九九年为美国人福开森接盘。后起的天津大公报,表面上是中国人办的,而骨子里是法国人同中国人合办的。不把外国資本表露出来,这是英斂之比較高明的地方。这几家報館,都設在上海或天津的外国租界里,已非中国行政权所能管轄,而且还有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更有恃无恐。这几家報,若是沒有帝国主义的勢力撐腰,它們是很难持續存在下去的。以大公报而言,它一創刊,就放言要慈禧太后撤帘归政,若不是在八国联軍占領下的天津,英斂之是首領难保的。以祖帝者反对媚后者的关系,英斂之的大公报一貫反对袁世凱。一世之雄的袁世凱,直隶总督的交椅摆在天津,他对英斂之无可奈何,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大公报;英斂之和大公报却以此得“敢言”之名。以后楊士驤任直隶总督,那就更不足畏了。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九日(旧历九月二十五日)英斂之的日記說:“方蕝雨<sup>①</sup>来言:吳錢孙向彼言,楊督謂我報譏彼,大怒。本欲交涉,因不便,遂止。托嘱此后务留情面云云。并訂游孙家花园。”两天后(旧历九月二十七日)日記云:“晡,孙仲英以馬車来迎予至彼花园。时以昏黑,引观各处訖,方蕝雨亦至,二人同劝慰,此后淡視国事,随时游戏,为佳。留彼飯,意甚殷殷。”这可算得一幅官場現形

① 方若,字蕝雨,是一个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文人,是日本在天津开办的《日日新聞》報的社长兼主笔。一九〇五年英斂之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就是經過方若的牽纏。此人后来在抗日戰爭中在天津当了汉奸。

图,上面画着倚仗洋势的大主笔和帮闲的政客豪绅,背后站着帝国主义洋大人和中国大官僚。“淡视国事,随时游戏”,确是帮闲的妙语。

英斂之和旧大公报最初是亲法的,后来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关系,转而亲日。一九〇五年夏初,那时日俄战争尚在进行,日本为了拉拢大公报作它的宣传工具,曾经邀请英斂之到日本游历了两个多月,从此旧大公报上就大量出现了亲日的言论和报道。特别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小村寿太郎到北京同清政府会议东三省条约的时候,旧大公报大卖力气,替日本帝国主义作虚伪宣传,欺骗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英斂之的日记上记载同日本方面的交际特别多,往来京津,奔走于日本使馆、六国饭店和日本领事馆之间,经常同日本领事馆两个高级官员高尾亨和小村俊三郎往来,给伊集院总领事夫人送礼,为神尾提督写大字,以至同日本人一起吃花酒,叫姑娘,等等。就在英斂之和日本帝国主义交情浓厚的時候,一九〇六年三月初,法国方面忽然通知馆房转了主,法国领事馆高级翻译李敬宇也要求撤股。英斂之和柴天宠王郅隆三人商定将报馆迁到日本租界,借款建房,于这年的九月五日迁至日本租界新址出版。从此旧大公报就完全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庇护。旧大公报以后转入亲日的安福系官僚资本之手,已在这时奠定了基础。英斂之和旧大公报由亲法到亲日,以及大公报馆的搬家,必有政治原因,我们在下文《由亲法到亲日》一节有些分析,请参阅。

英斂之经营旧大公报,实际只有十年时间(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二年,“大清”皇朝倒了,“民国”成立,英斂之这个坚主君主立宪的满族保皇派没有心思再办报了。一九一二年二月二

十三日旧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館总理英斂之外出，凡賜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他从此隱居于北京香山。至一九一六年九月，英斂之将大公报盘售与安福系財閥王郅隆。

王郅隆购得大公报，自任总董，聘胡政之为經理兼总編輯，以后变成了安福系的机关报，言論編輯表現浓厚的亲日卖国色彩。这样的报，当然为讀者所厌弃，銷数惨跌，最后弄到沒有人看了，每天只印几十份，貼貼报館門前的閱报牌和送給有关的人看。王郅隆于一九二三年去日本，死于关东大地震。这个报又拖了两年，实在沒法再办下去了，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

### 旧大公报宣传些什么？

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既然是一个以滿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結合法帝国主义、买办資产階級等的混合物，它的階級属性就規定了它要为这一特定的階級利益服务，它就为这一特定的階級利益而宣传，而斗争。

英斂之和他所經營的大公报，斗争性是很强的，他和它的階級利益所在，无不大胆昌言，坚持到底，甚至超越常識地強詞夺理。我們翻閱了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經常接触到的是这几种东西：①英斂之的基本政治思想——保皇立宪；②英斂之和他周围一羣人所依靠的——天主教；③他們假借洋勢，所以大胆替帝国主义講話；④英斂之的旧大公报，在初期依靠法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后又倒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所以是先亲法后亲日；⑤強烈的崇洋抑华；⑥也反映新兴資产階級的一些进步意識。分別述之如后：

## 一、保皇立宪

因为英敏之是满洲旗人，他的第一条政治思想是大清帝国的天下千秋万世。怎么办？因为是在二十世纪的开头，他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些启蒙知识，时在戊戌政变之后，他接受了康梁一派的保皇立宪的思想，又当庚子事变的冲激，所以坚决保皇立宪是唯一的办法。他主张慈禧撤帘归政，光绪皇帝亲政，实行立宪。他始终坚持这个政治主张，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倒了，英敏之也就退隐不再办报了。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大公报创刊第一号，登载英敏之署名的《大公报序》，开头说：“岁辛丑，同人拟创大公报于津门，至壬寅夏五而经营始成，推都门英华氏董其事。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开宗明义，只标出介绍西洋学术思想一点。正式发表政治主张是六月二十一日第五号报上发表的长篇“论说”<sup>①</sup>：《论归政之利》。英敏之在这篇文章里劝告慈禧归政，发挥了他的保皇思想。他说利有八点：“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闈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主要论点在盛称“皇上有德”，太后至归政，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就一切都好了。他大事宣传“皇上有德”，同时拉住帝国主义作保镖：“庚子联军入京，郊庙陵寝多为外人驻兵，太庙神主以致转徙海外，宗社复矣。问中国何以不亡？莫不曰以皇上故。问各国何以不瓜分？亦莫不曰以皇上故。皇上之有德于中外，至矣！饮水思源，中国遽忍一日忘皇上哉！谢罪璽书无不归过于己，罪己之诏至再至三，令人流涕，不忍卒读。至各国君相亦相

<sup>①</sup> 旧大公报的“论说”，一九〇五年八月下旬改为“言论”，等于现今报上的“社论”，不署名，多为英敏之所写。

戒其师徒曰：此非清国皇帝之过也，开衅者僉人也。尔輩慎体此意，并保大清皇帝，无負天下万世之恶名也。”然后他罵刚毅，罵义和团，罵旧党，罵宮禁左右，罵李蓮英，对慈禧不作正面攻击，把責任都推在别人身上。这在当时是一篇名文，文章的想法和技巧如此。

英斂之和旧大公报要求慈禧归政，和康梁的变法維新見解相同，主张效法英日，君主立宪。一面保皇，一面要求立宪。每年旧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緒皇帝的生日，旧大公报必有庆賀的表示。一九〇三年八月十八日（旧历六月二十六日）的大公报，报头旁登載庆賀广告：“恭賀大清国大皇帝万寿圣节：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綿长。本館敬祝。”同时发表題为《本日庆賀万寿之感情》的“論說”，极尽善頌善禱之能事。文章問了“途人”，問了“儒子”，皆称頌“皇上”。“又尝見东人而問之曰：我皇上何如也？曰：中国之明治也。又尝見西人而問之曰：我皇上何如也？曰：中国之大彼得也。我皇上之声名为外人所推重有如是者。而当世維新諸少年往往本其褊浅之見，逞其驕矜之气，以发为危险怪僻之詞，污蔑今上，扰乱和平，其无乃大不敬乎！而况筹国事者宜順民情，今国民所公認者为君主，而吾独号于众曰共和。共和不但有拂乎民情之公，而且徒逞空言，决不能見諸实事。”此文毫无根据地借外人以推崇載灃，又假托民情大罵維新共和。而且說：“中国之政体不改良則已，欲改良惟有立宪。吾甘与維新諸少年作反对，偏尊崇我皇上，偏屬望我皇上，我皇上将来必可以立宪法，以救我国民四百兆生灵之众，以奠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他就这样毫无凭据地給光緒皇帝写了保票。不仅如此，英斂之的旧大公报一心一意要永保“大清天下”，反对共和革命，而清朝政府又是那样的腐敗无能，以至最

后的一条希望是希望帝国主义列强出来干涉汉人革命。一九〇六年六月五日大公报发表题为《論革命軍必不能达其目的于二十世紀之支那》的“言論”說：“今日之論支那者，莫不以革命軍为最危最險最凶最惡最可惊最可怖之重大問題；而吾謂革命軍之在今世紀，必不能达其希望之目的于支那。請以时局論之，請以情勢斷之，內觀其國權之陵替，外察其敵氛之憤張，虽在未来时代，而已如悬明鏡于日光綫中，了然可睹其狀態，昭然可決其成敗也。”理由极簡單，就是外国的干涉。“試問革命兵起，能保外人不干預乎？試問革命兵力，能保外人不破坏乎？試問革命排滿，即使排尽滿族，所謂支那者果能入汉人之手乎？不能入汉人之手，而使支那淪亡于白种人之掌中，則所謂排滿者乃自排，所謂革命者乃革汉命也。嗚呼！革命排滿之目的在保全支那之主权，乃夺之于黄种人之手，而納之于白种人囊橐之中。其主义，其宗旨，其意識，其希望，不亦千悖万謬而无絲毫紆微之当哉！”請看英斂之这种論調，不是同那拉老太婆“宁贈邻人，不与家奴”的話一个鼻孔出气嗎？

英斂之和旧大公报主张保皇立宪，簡直到了迷信的程度，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日的“論說”，题为《論立宪之要素》，文云：“世界无开通而不成立之国，世界亦即无不开通而可成立之国。无他，开通不开通之征，一視諸宪法成立不成立，而即以覘国家之成立不成立也。宪法不立，則虽其国强盛，終滋危殆之忧，如今日之俄土是；宪法苟立，則虽其国狹小，已固雄富之基，如今日之德日是。若是者，知宪法之与国家誠所謂不可一日或离者。”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三日，大公报出至一千号，出题征文，获得一等奖的两篇文章都是《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署名“效灵”的一篇說：“宪法者何？欲启国民爱国之心而保民之参政权也。世界之政体有三大別，……然

則君主立憲者政體之完全無缺者也。”這樣的論點，當然為英斂之所選中了。一九〇八年二月十日大公报二千號，征文的題目是：“實行立憲之政體如何？”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大公报三千號，征文的題目是：《立憲國之要素，一曰國會，一曰憲法，然當預備立憲之時，究應先開國會而後定憲法歟？抑應先頒憲法而後開國會歟？》在大公报三千號有一篇署名“無妄”的《閑評》，文云：“本報一千號出版，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之年；二千號出版，正頒發籌辦憲政清單之年；今當三千號出版，又值縮短國會期限之年；將來四千號出版，適值實行開設國會之年，前後十年間，皆得附國家特別之大典，以作為紀念，伸其祝賀。而本報與憲政之開始，憲政之成立，宛若有固結之緣。吾既竊為國家前途頌，且私為本報榮遇幸！”等不到大公报出到四千號，辛亥革命就爆發了，“大清”皇朝倒了，英斂之這個滿族保皇派也就沒有繼續辦報的興趣，退隱於北京香山靜宜園了。

在這裡應該答復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英斂之和舊大公报如此忠心於“大清”皇朝，而清朝政府為什麼不對英斂之和舊大公报加以利用？這因為英斂之和舊大公报是反對慈禧訓政，主張保皇立憲的，所以在慈禧掌權的時期清政府是把英斂之和舊大公报視同“寇仇”的。儘管如此，英斂之也有一條內綫通向宮廷，這就是肅親王善耆。善耆能替英斂之向帝、后兩方說“好話”。據舊大公报一位老工人說，善耆也是舊大公报的股東。善耆是傾向維新的。頂到慈禧死了，光緒也同時死了，溥儀幼童“登極”，“大清”皇朝已經皇皇不可終日了。英斂之以辦舊大公报而赫赫有名，他抗大官而自己不作官，為人所稱頌。嚴復贈給英斂之一幅對聯云：“能使荊棘化堂宇，下視官爵如泥沙。”就是讚揚他不作官的。但，這也不是絕

对的。假使慈禧被迫撤帘归政,或者她死而载湉不死,光绪皇帝亲政了,善耆等人向载湉举荐英斂之一贯保皇鼓吹立宪有功,皇帝下詔征召英斂之入京任議宪大臣一类的显职,英斂之是会感激应召的。第二个问题是英斂之同袁世凯的关系。帝后之爭,是清朝末季的一大矛盾。英斂之主张保皇立宪,公开响应了康有为的“政見,他是袒帝者。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搞出戊戌政变,譚嗣同等“六君子”流血,英斂之惧而逃亡。以袒帝者反媚后者,英斂之是深恨袁世凯的。袁世凯在天津作直隶总督,英斂之在天津办旧大公报,英藐视袁,以至譏罵袁,袁当然讨厌英。袁世凯要对付英斂之,不外两个办法:威胁和利誘。一九〇五年八月,袁世凯曾經为抵制美货运动下令封閉大公报,因为有法国帝国主义的保护,袁的命令未能贯彻,威胁无效。袁世凯曾几次想收买英斂之,均被拒絕;袁派馬車去接英斂之,英不上車。一九〇五年袁世凯封閉大公报未遂,却将英斂之的助手大公报主笔刘孟揚收买去了。刘孟揚弃报作官,在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赵秉鈞手下做值日所課长兼警讞局書記官。象这一类的官固然不放在英斂之的眼里,就是再大得多的官,以当时英斂之的声名地位,也不屑在袁世凯的手下为官。英斂之同袁世凯的关系如此,而在背后也有人在袁面前讲“好話”,这人就是蔡儒楷。蔡当时任北洋大学堂监督,袁世凯做总统时,任蔡为山东省长。蔡儒楷与英斂之友好,蔡的女儿蔡葆真嫁与英的儿子英千里为妻,他們是儿女亲家。因有蔡儒楷从中週旋,所以袁世凯对于英斂之也未尝下辣手。

## 二、宣传天主教

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經常使用三个武器:传教、武力和資本輸



出。外国传教士无一个不是間諜特务，中国教徒受其“教化”，很多人成了崇洋蔑华的“二毛子”。英斂之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所经营的旧大公报又植根于天主教，主要依靠天主教的力量。这张报虽然没有打出天主教机关报的旗号，也可说是“准天主教机关报”。每年“复活节”和“耶誕节”，旧大公报都要休刊放假一天，以从教俗。英斂之的旧大公报的言論，首先宣传保皇立宪，其次就是宣传天主教。茲摘述一些有关的言論，以見一斑。

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七日“論說”《以宗教救中国說》，文云：“中国之衰弱如斯，究而論之，是无中国也。何以无中国？中国国魂散失也。国魂胡以散失？民羣无爱国思想也。民羣胡以无爱国思想？自錮其灵魂未尝释放也。灵魂何以不能释放？无文明教化也。何謂文明教化？宗教是也。”这才到題，紧接着就宣传洋人：“外人之来我中国宣布教宗者，所在多有，文明曷尝不及于中华？曰教士之力有限，不能普及于国民，是以能得其释放者只有此数耳。”怎么办？于是鼓吹大办洋教。“莫如我全国国民同畝文明教化为一己应有之教化，全国大立教会，各省遍立教堂。”

一九〇三年四月七日“論說”題为《中国图治之三要素》，其中之一就是“自开教会”。文云：“西人来华传教，不惟无害，且有大益。何則？宗教者所以养人德性，束入身心；国政之所不及者，宗教可以隱济之于无形也。”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日，旧历癸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附件”<sup>①</sup>栏发表了一篇白話文，題为《年終贈言》，文章把中国的糟糕情景大事渲染一番，然后說：第一不能怪朝廷；第二不能怪官长，第三也不

<sup>①</sup> 旧大公报的“附件”栏，用白話文演說政治主張，在当时是很新穎的形式，这种文体很受讀者欢迎。凡不署名的文章，多数是英斂之所写。

能怪黎民百姓。却对黎民百姓大作文章。文章說：“这黎民百姓，自幼就沒受过教化，长大了又沒有一定的职业，耳所听的，眼所見的，沒有真理正道，他怎么能好的了呢？”文章作者如此看不起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作結論了：“总而言之，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的恶俗，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能敗坏到这个样儿。这总根源是沒有真正的宗教，沒有純善的教化，沒有完全的律法。”怎么办？文章作者虽然沒有明白說出，他既然讲了那样的“总根源”，他的药方必然是传洋教，立宪法。

这时，天主教的势力遍布于全中国。外国传教士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鋒，許多中国教徒又假借洋势，欺压人民。人民羣众恨洋教士，連帶地也恨中国教徒。虽在庚子事变以后，中国各地仍不断发生打教堂打教士的所謂“教案”。每遇教案发生，大公报的言論記載必袒教詆华。一九〇六年的南昌教案，大公报的片面宣传，就是典型（見以下“亲法”节內）。

旧大公报的天主教色彩越来越浓，一九一五年六月十日起重刊湯若望著的《主制羣征》；十一月二十五日起連續刊載《天学初函》中的《辯学遺牋》；十二月四日起刊登英斂之的《万松野人言善录》；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起又刊登《大西利先生寶瑪传》。这些书还发行了单行本。

### 三、帝国主义代言人

英斂之的旧大公报，既与帝国主义有直接的組織关系，它就公然充当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奋斗。

英斂之的基本政治思想是保皇立宪，以永保“大清天下”；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想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帝国主义也就利用他作

为侵略中国的代言人。大公报在一九〇二年六月三十日，以“論說”的地位，譯載上海字林西報《論中國之機勢》一文，就是英斂之利用英帝國主義之口來表達他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一個範例。譯文說：“拳匪之亂，各國待中國之政策若是其和平，許其自新，誘其變法，以為中國必能改弦更張矣。詎料時至今日，蔽塞守舊如故也，太后之握權如故也，榮祿及滿洲諸頑固大臣安享利位莫不如故也。且太后之權反較未亂之先更有甚焉者。……各國恪守和平宗旨，為保守全球和局起見，極力保全中國。但中國萬不可以為得計，苟且偷安，中國之內政泄沓如舊，其亦知外人之保護決不足恃乎？土耳其之復轍不遠，可為殷鑒矣。漫假中國果至土耳其之地位，吾知無恥之華人方將揚眉吐氣，以作各國之順民，必不知有羞辱也。但華人當知前年聯軍之來，其責任在保教保商，平定亂事。彼時若干預中國內政，其勢甚易；然各國文明政策，向不肯出此也。倘此後中國仍復酣睡，不能變法，不能自立，則各國惟有狠心辣手，以治土耳其方法治之矣。”大公报譯載了這篇面目猙獰的文章，後邊還加了“本館附注”，說什麼“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大公报譯載這樣的惡文，豈非喪心病狂？然而這正是英斂之在利用英帝國主義的凶惡嘴臉，來恫吓那拉老太婆。

舊大公报誕生於天津，當時天津全部為八國聯軍所佔領，直接由聯軍“都統衙門”所統治。這時天津已被八國聯軍佔領二年之久，中國政府派員交涉交還天津，舊大公报竟著論反對，一九〇二年七月十五日發表“論說”，題為《天津交還後問題》，說：“中國政府日日求交還天津，……夫以各國轉戰苦得之天津，而我處極貧極弱之時，欲以口舌爭之。”這簡直不象中國人講的話。舊大公报為了反對交還天津，這篇“論說”提出十二個“當問”，以問交還後中國政府怎麼

办：一問海河如何疏浚？二問將如何遵守条約以藩篱北京？三問大沽炮台已毀，收回天津將如何守？四問天津不許駐兵，袁宮保（世凱）將何以自衛？五問小民困苦何以撫恤？六問“各國設都署以來，孜孜求治，竟使一破烂之天津，成一完美之天津”，天津交還后是否又復旧觀？七問外國銀元流通已久，怎么办？八問天津鐵路怎么收回？九問鹽坨生產之鹽仍否儲存于租界？十問北洋學堂是否恢復？十一問天津還能設兵工廠否？十二問南漕禁運，津民無食，怎么办？提這些問題以反對從八國聯軍手中收回天津，既不倫不類，尤其荒謬絕倫。中國政府已與各國議定于八月十五日交還天津，大公报又于八月七日發表題為《論天津善后事宜為各國所最注意者》的“論說”，頌揚八國聯軍統治的天津：“一切善政善法，筆難殫書。居其地者一變昔日種種野蠻之自由，而為今日種種文明之自由。故能雞犬無驚，安之若素。茲者津郡還矣，都署撤矣，而士有惴然忧之，隱然慮之者。……”對於洋人統治那樣恭維，對於本國收回如此忧虑，這是什麼精神狀態！

英斂之是天主教徒，又有法帝国主义的背景，所以特別仇恨义和团，旧大公报上經常發表毒罵义和团的言論。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日大公报發表一篇題為《論賠款為义和拳之記念》的“論說”，這題目就很刁钻古怪，文章更加刁钻古怪。文云：“今外人本無索賠款之機，而义和拳實启之；外人本無索賠款之勢，而义和拳實張之。嗚呼！何义和拳之不忠于吾國而忠于外人乃尔也？”他仇恨义和团到這樣的程度：“虽取义和拳寸磔而櫛食之，豈足蔽其辜哉！”大公报又于一九〇二年八月七日、八日“附件”栏連載一篇白話文，題為《成全义和拳的四派人》把义和团仇視洋人比作狗，說：“這和那狗看見生人就咬，是一個理。”把反帝愛國的人民此如糟蹋，文

章作者真是下流极了。是标准的“二毛子”。

更荒唐的是公然鼓吹把西藏拍卖给英国。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旧大公报发表“論說”，題为《拍卖西藏議》，說什麼“朝廷有西藏之地，本无所裨益；即失一西藏之地，亦不見亏损。”又罵藏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不如趁此为我属地时，仿西国亚拉斯加之例，向各国拍卖之为善也。”并且說：“中国地，不卖則割，終且为人所占据。今日之东三省，昔日之台湾，中国人試一比較，当与卖地孰优？”这是什么話？这种亡国奴敗家子的議論，公然作为一个大报的主张。看今天全中国解放，西藏同胞在全国同胞的帮助之下，获得彻底的解放，解脫了农奴的枷鎖，走上社会主义的幸福道路，这是英斂之和旧大公报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旧大公报開門揖洋，无所不可。一九〇二年夏傳說英国派議商約大臣馬凱建議开北京为商埠。它即于八月五日发表“論說”，題为《开北京为商埠論》，列举四項理由，以为可允；并且說：“若我力拒此議，則坐失一輸入文明之机会，且以阻全国之进步矣。”其实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講話。

#### 四、由亲法到亲日

英斂之的旧大公报对国际列强的态度是崇慕英日；因为英国和日本都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合于英斂之的政治理想。英斂之和旧大公报一貫反俄。这从清朝宮廷的国际关系来看，也是符合的。因为慈禧太后亲俄，光緒皇帝則比較亲英日。英斂之是滿族保皇派，則反映于旧大公报的态度，也應該是亲英日而反俄的。

問題在于对法国的关系。英斂之是天主教徒，旧大公报設在天津法国租界，有法国公使和法国主教的投資，依靠法帝国主义的

保护,英斂之的旧大公报首先是应该亲法的。但是,法国与帝俄有同盟关系,俄法两国当时都是支持慈禧训政的;作为满族保皇派的英斂之,他反后反俄,这在对法国的关系上可能隐藏着矛盾。讀英斂之的日記和旧大公报,英斂之和旧大公报是先亲法后亲日的。

旧大公报创刊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当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日,那一天的大公报在第一版头条的地位登载花边广告:“恭賀大法国改立民主記念令节:十八周伟功,亿万民幸福!本館敬祝。”同日发表題为《述本日法国庆賀之緣起》的“論說”,对法国极尽恭維之能事。說什麼:“津沽一隅法租界,三色旗飘颺半空,云日爭輝,陆离耀目,过其下者,昂首徘徊,称叹不置。”一九〇三、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七月十四日皆刊登“恭賀大法民主国令节,本館敬祝”的广告,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四日还发表庆賀法国大革命的“論說”;至一九〇六年七月十四日,大公报館不久就要迁到日本租界去了,大公报上就沒有庆賀法国国庆的表示了。

一九〇六年发生南昌教案,南昌知县江召棠于二月二十二日在法国天主教堂内刺喉而死,法国和天主教堂方面說是自刎,中国方面說是被法国教士所害,引起当地人民的公憤,于二月二十五日焚毀天主教堂,打死法国教士。法国派兵艦到南昌恫吓,法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巨額賠償的要求。大公报对于这件事情,始終站在法国人和天主教的立場,发表片面消息,一口咬定是江知县自刎。讀者投函向大公报抗議,他报也有讀者指摘大公报“偏袒教士,污我官民”。大公报于四月十八日发表題为《答来函》的“代論”,以无賴的腔調說:“嗚呼!中外报纸多矣,其說久不一矣,何独于敝报侃侃而辯,刺刺不休,岂报界亦有幸有不幸耶?抑只許他报言之,而不許敝报言之耶?”这件教案,清政府終于在法帝国主义的威逼

之下，承認江知縣是自刎而死，賠銀二十五萬兩了事。大公报于六月二十二日以“代論”的形式登載《南昌教案中法簽押合同原稿》，以宣揚法帝國主義和天主教的勝利。

英斂之和舊大公报的亲日，時間比較靠后些。在一九〇二年八月五日發表那篇題為《開北京為商埠論》的“論說”時，舊大公报還是譏諷日本的。那篇文章附和英國人的提議，贊成把北京開為商埠，並且說“各國皆以為然，某國獨否。”說“某國人不助此議，蓋亦有故。”說“某國人性情狀貌，頗近華人”，賃屋設肆，甚為方便。這所謂“某國”，顯然指的是日本。英斂之同日本帝國主義親近的關係，始于一九〇五年四月。這時日俄戰爭尚在進行，而日方勝利的局面已定。據英斂之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二月二十八日（一九〇五年四月二日）：“聞是日高尾亨及小村俊三郎（天津日本總領事館的兩個高級官員）連訪二次，且邀神戶館晚餐，七點至彼，……席間高尾、小村力勸予游日本，并言內田公使、伊集院總領事為予作函介紹。十二點散歸。”宴會五小時之久。三月初一日（四月五日）日記云：“昨午后至日本領事館，晤高尾、小村，仍力勸予必須于月中去彼國一考查。政界意旨，日俄戰后，中東必須聯盟，整頓東三省事宜。予系北方清議之望，較他報不同。此行于兩國實有所關云云。”英斂之受到日本人這樣恭維，就在今年的四月拿着日本公使內田康哉和日本總領事伊集院彥吉的介紹信到日本游歷去了。英斂之的《也是集》內載有《西京游記》和《日光游記》二文，就是此行的產物。英斂之游歷日本，是于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離津東渡，七月二日回到天津的，往返兩個多月。英斂之經過日本人這一番拉攏，回國之后，果然大為日本帝國主義吹噓，成了大賣力氣的亲日派。關鍵在日俄戰爭結束，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在美國與帝俄簽

訂朴資茅斯和約以後，又到中國北京與清廷會議東三省事宜，以繼承帝俄在我東三省的權利。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同帝俄打仗而到中國來攫取勝利的果實。英斂之的舊大公报在這段交涉時期大為日本帝國主義幫忙。這段交涉是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開議的，十一月二十日大公报“要聞”欄头条新聞說：“京友函云，此次小村男爵到京，開議滿約問題，甚為和平。且云中日本唇齒之邦，以後甚愿兩國聯盟，以維持東亞之大局云云。大約定議後即可實行聯盟之約云。”這裡所謂“京友函云”、“兩國聯盟”等等，實即半年前高尾亨和小村俊三郎在天津日本領事館對英斂之所說的“日俄戰後中東必須聯盟”的話，日本人的迷魂藥這時發作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条“要聞”又說：“京中傳出消息云，此次小村大使會議滿約問題，以保全中國利權為宗旨，絕不干涉他事。並對中國政府云，嗣後中日兩國當永固邦交，同恤患難，惟中國之幸，亦日本之福也。語次，篤睦之情溢于言表。”用這樣的甜言蜜語替日本帝國主義欺騙中國讀者。從此，大公报天天宣傳鼓吹日方的提案內容和平，外間謠傳均屬向壁虛造。十一月二十九日并特別發表一篇題為《論中國人心浮動之可忧》的“論說”，替日本辟謠，說什麼：“中國之人，風氣未開，無識者多，最易起謠，亦最易信謠。故謠言之多，莫過於中國。”又說什麼：“此次日本之與俄戰，本為中國東三省之事而起。而興師之始，日本天皇即先行聲明，謂將來戰事告終，必以東三省還諸中國。斯言既出，皎如天日：仁聲義聞，播于寰區。……光明磊落，軒天動地；環球各國，莫不欽服；矧在中國，親蒙其惠。”這篇肉麻文章，想必出于英斂之之手。《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及《附約》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簽訂了，於一九〇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批准互換了，二月二日及三日的大公报登載了這個條約



及附約的全文，內容大白了，中國的東北利權從此為日本帝國主義所囊括，大公報對這項重大的條約，却一直沒有發表一個字的評論。英斂之和舊大公報在這件事上大大欺騙了中國人民。

英斂之自從游日歸來，往來京津，同日本公使館和天津日本領事館交際繁多，英斂之日記上逐條記載，反比對法國的關係還親密得多。在這段時期的英斂之日記上，有幾件可注意的事情。一件是舊曆十月初三日（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記云：“午後正金兌洋，寫予添入股票。”這是在這一天的午後，英斂之曾經到天津日本正金銀行兌了一筆錢，回到大公報館就寫股票，為他自己增加入股。這筆錢有多少數目，以及它的來路都不可知，而這筆錢卻在日本正金銀行打了一個滾。另一件事是轉年舊曆二月十二日（一九〇六年三月六日）日記云：“柴先生遣人來喚，晤，告以館房轉主事，李敬字撤股事；王祝三在座，遂商訂移居建房事。”這是說，正當英斂之同日本的關係打得火熱，大公報正為日本出力宣傳的時候，由柴天寵告訴英斂之：法國人要收回大公報館使用的房子，請大公報搬家。當時英斂之、柴天寵、王邛隆三人就商定自建館房，把大公報遷到日本租界去。此事就由王邛隆經手，租了日本租界四面鐘對過的地皮，由日本建物株式會社承辦建築，於這年九月五日遷至日租界新址（即現在和平路二四一號）出版。大公報由此就更加親日了。

英斂之的舊大公報由天津法國租界遷移到日本租界，原因所在，恐怕絕不止於“館房轉主”四個字。舊大公報擁有法國公使和法國教士的投資，法帝國主義承擔着保護大公報的諾言，怎會僅僅因為“館房轉主”就把它請出法國租界呢？想必還有政治上的原因。英斂之的基本立場是滿族保皇，反後反俄；法國與帝俄同盟，

俄法都支持慈禧，英斂之同法国的关系隐藏着这个矛盾。在开头几年，还没什么；頂到日俄开战了，英斂之被日本拉过去，大作亲日宣传，法国难免要吃醋，帝俄也会向法国方面說大公报的閑話。一个結果，就是諸大公报离开法国租界。看英斂之日記，柴天宠告訴英斂之“館房轉主”，同时告訴他“李敬字撤股”。李敬字是天津法国領事館的高級翻譯，是英斂之同法国总領事关系的中間人。李敬字是善觀法国主人的气色的，法国主人不喜欢英斂之和旧大公报了，李敬字也就撤股不再做大公报的股东了。至于法国人的股款是否也撤退了，現无資料可查。英斂之和法国駐华公使鮑渥发生关系的中間人是北京法国教士樊主教，而这个樊主教在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死了，以后法国公使也換了人。这些人事关系虽然不是决定因素，总也不无关系吧。

在英斂之日記中还查到一件小事：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五至十七日三天的大公报上登有一則王品斋揭露天津汇丰銀行买办吳調卿帮同騙款的广告，其中涉及专售英法机器的謙順洋行的“洋东”希士。这个希士大为恼怒，因此英斂之受到法国工部局的气。一月十七日（光緒三十年甲辰十二月十二日）英斂之日記云：“早巡捕头来，为登希士告白事，势甚汹汹，予以硬語却之。”轉天，再次派人尋王品斋，要他出具甘結，仍不肯。英斂之乃亲自率人到王品斋的店舖中，候过半夜十二时，王不出見；英又率人到王家中，和王的儿子辯論不休，直到过夜三点鐘，王品斋才作为由外回家，“初晤，略談，几决裂，相搏后，复緩緩开导，伊始肯給写字条，告白有其承担，与館无涉，并加鋪中图記。別归，至館已四时矣。”天亮后，巡捕来找，英斂之乃随同到法国工部局，晤見李敬字，将王品斋的字据交与洋捕头，洋捕头云：“領事亦无他事，不过囑以后多加小心，不可登

此等告白而已。”英斂之当时是报界重要人物，纵笔骂人，敢抗大官袁世凯；但是，他的大公报无意中登了一则广告，碰着了买办和洋人，就受到法国人的气，并且闹得如此紧张狠狠，可见帝国主义洋大人是不好伺候的。这件事的结果，还是英斂之逼迫中国人（王品斋），与之“相搏后”，强迫写字据，加铺保，依然是倚洋压华。

我们搜访英斂之的遗事，他晚年同法国和北京天主教堂的关系都很不好。兹记数事如下：

（一）一九一六、一七年间，马相伯到北京，运动北京政府与罗马教廷建交，马本人愿任中国第一任驻罗马教廷公使，英斂之支持马相伯。因为中国与罗马教廷未建交，中国教区系由法国管理和保护。马相伯英斂之运动与罗马教廷建交，是想摆脱法国对中国天主教的控制。这件事，由于法国的阻挠，未曾实现。

（二）法国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味增爵会”，专向中国下层社会传教。英斂之和马相伯反对。英斂之拉到美国的关系，组织了一个“本篤会”，在北京开办公教大学，后改为辅仁大学，英斂之为校长。法国方面更为着恼，法国味增爵会在北京筹办一个“道明大学”，以抵制辅仁大学。这个倒置大学（道明大学的叶音）在招生时因索费过高就垮了。法国教会因英斂之办辅仁大学，向罗马教廷控告英斂之。罗马教廷因辅仁大学是美国出钱办的，不敢得罪美国，因此批示：味增爵会传教，辅仁大学办教育，各不相涉。这场官司是味增爵会输了；但只许辅仁大学办学，不许向校外传教，英斂之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写了一篇《劝学罪言》，就是反对北京主教专向“愚鲁之夫”传教，主张“以文学为第一要务”，“谆谆以读书尚学为劝”。《劝学罪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再以身所亲经者言之，如某会欲于某处立一高等学堂，某处乃以我之权力所在，遂力加阻

遇，恐他会于此伸张势力，此外无他原因也。”这就指的是本篇会要在北京設立輔仁大学，而为北京教会所反对。英斂之的胞妹英秋以后在翻印《劝学罪言》时附有跋語說：英斂之“从事著作，以显揚圣教，乃著《劝学罪言》，上之教宗，教宗深为嘉許，故派員巡視各省，調查教育，于是有輔仁大学之設。”这是說羅馬教廷曾經派人到中国来調查英斂之同北京教会的爭執。結果因为英斂之的本篇会有美国的支持，英胜利了。这件事証明英斂之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搞坏了，却又拉上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說明英斂之总要一个帝国主义作靠山，同时也象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了。

(三)英斂之又影印传布故宮档案中的《康熙与羅馬使节关系文书》，内有康熙的硃批，咒罵天主教士，禁止在中国传教。北堂(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大生气。英斂之原得助于北堂，至此罰英斂之不准到北堂望弥撒。

(四)一九一六年秋冬間，发生天津老西开交涉，英斂之反对法国扩充租界。

这几件事，都說明英斂之后来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起了变化。由亲法到亲日，最后亲美，这是英斂之的国际路綫。

## 五、崇洋抑华

讀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滿紙崇洋抑华的气氛，感到一股令人不可忍耐的奴气。这在甲午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的时代，是中国买办資产阶级知識分子所同具的一种阶级意識。英斂之博讀中外书籍，身为滿洲旗人，少年境遇坎坷，一生倚靠天主教，崇拜西洋，深受赫胥黎的《天演論》的影响，信奉“物竞天择，优胜劣敗”为真理公理，因此中国之必亡，中国人之必奴，成为他的当然的

結論了。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公报“論說”題為《茶余閑話》，發表了揚外抑中的論點之後，自行加以反問：“子何揚外抑中之甚耶？予曰：吾非有所抑揚于其間，蓋據理勢以斷也。據理言之，劣者必敗，弱者必亡；優者必勝，強者必存。劣者變為優也必勝，優者變為劣也必敗；弱者變為強也必存，強者變為弱也必亡。以優者與優者較，極優者長勝；以強者與強者較，極強者久存。此天演之公例，即進化之公理也。”一九〇三年三月一日“論說”《國民文明野蠻之界說》云：“自五洲盡辟，寰宇一新。強者存，弱者亡；優者勝，劣者敗。天演之公例，即為世界之公理，于是有文明野蠻之判焉。文明者何？順乎公理而日益進化之謂也。野蠻者何？悖乎公理而不能進化之謂也。”英斂之和舊大公报所信奉的真理公理，就是如此簡單的《天演論》，于是崇拜強權，崇拜洋人。

英斂之和舊大公报，崇洋抑華，搞出一片亡國哀音。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論說”《悲中國之前途》說：“嗚呼悲哉！吾中國人乎，即謂不如英美之犬亦無不可。何則？英美之犬尚得博人之怜愛，為人所寶貴，我中國人則無論對於外界，對於內界，其為人之資格甚不完全，為外界所不齒，為內界所難容，而欲起而與人民自由之英吉利比肩，與民權極盛之美利堅并駕，吾恐夢境雖幻，也不能一遇其會也。”文章緊接著就特罵“維新諸志士”。五月五日“論說”《未來之中國》說：“嗚呼悲哉！我中國已矣！據現在以斷定未來，我中國必為萬國之屬地，我中國人必為萬國之馬牛。不但比之印度莫能及，即比之猶太波蘭，其悲痛恐猶或過之。”請听這是什麼腔調？

讀英斂之和舊大公报，有時令人產生一種不能抑制的憤怒情

緒。他崇洋抑華，悲觀灰氣，以至把全中國人看成奴隸。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論說”《說自立》說：“夫世界上最下賤最卑鄙不顧名譽不顧廉恥者，非奴隸哉！……蓋奴隸者，具有一種天然服從性質，且具有一種天然驕縱性質，此奴隸之特性，實亦我中國四萬萬人之特性，我中國人所以能自立者少也。”同年八月十二日附張的“附件”欄，開始連載一篇題為《說中國風俗之壞》，它所列举的壞風俗，“第一樣是奴性”。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論說”欄開始連載署名“安全鉄次郎”一篇題為《大同進化無種類之爭說》的長文，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續完，在文末有“本館附志”說：“大同世界，為文明進步之極點。……吾非故短黃人之氣，以作灰心之談。吾敢謂世界或可有大同，我黃人恐無能統一世界之一日。蓋嘗熟察夫我黃種人之性質之資格，實不足以當‘主人翁’三字之稱號，此則執筆人所為和泪名山，洒血太空，悲鳴而不自己者乎？”“二毛子”是徹底看不起中國人的，並且自恨生就一張黃臉皮，英斂之的旧大公报就深具這種精神狀態！

## 六、一些進步意識

旧大公报也反映了一些進步意識，特別是反映了資產階級意識。時代在二十世紀初叶，中國的資產階級業已初步形成。总的說來，初期的資產階級是有進步性的。這時期的大資產階級分子，有的與買辦資本有關，有的與官僚資本有關，所以在初期也是反動的。大公报的投資人，主要是買辦資產階級，民族性是很稀薄的。當然也反映一些民族資產階級意識。主張開工廠，興實業，辦學校，立憲法，這都屬於進步方面的。

一九〇三年一月三日大公报的“論說”題為《書顏觀察世清請

設勸工場稟后》，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国家者大資本家也，政府者資本家之总理也，官吏者資本家之代表也。”可謂直截了当。同年九月十三日“論說”《中国宜广設工艺厂說》，就說“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作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这发展起来就是“实业救国論”。

旧大公报也朦朧地接触到社会主义。一九〇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論說”《二十世紀之新主义》，文章說：“于二十世紀之天地，歐羅巴之中心，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則社会主义是也。”講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資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資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則欲变少数(人)之国家为多数(人)之国家，变海陆軍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貴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資本家橫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軍国主义也，以布拉沙呼德之世界主义而扫蕩刈除其侵略的帝国主义也。”它介紹了这样的“社会主义”，其結論是：“然則社会主义者，亦烏托邦之主义焉耳。”如此而已。

旧大公报从第一号起，在特辟的“附件”栏，用白話文发表《戒纏足說》，十几年如一日，一貫地宣传禁止妇女纏足，并設立天足会，是一件进步的事。

英敏之以袒帝者反对媚后者的关系，始終反对袁世凱。袁为直隶总督，英在天津法租界里办大公报，袁世凱对英敏之无所施其威，几度企图进行拉攏收买，均为英所拒絕。至一九〇五年五月，上海民族資产阶级曾少卿等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虐待华工发起抵制美貨运动，蔓延到天津，旧大公报响应了这一爱国正义斗争。这

时,英斂之恰巧不在天津,到日本游历去了,大公报的編輯业务由主笔刘孟揚代为主持。大公报于五月二十三日登載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貨的通电,从五月三十日起特辟“抵制美約要聞”专栏,六月十一日登載“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七月二日英斂之从日本回到天津,抵制美貨运动已經风靡全国,大公报仍繼續参加这一运动。八月間,袁世凱用“有碍邦交,妨害和平”八个字罪名,下令封閉大公报。大公报設在法租界,有法国帝国主义的保护,袁的命令不能貫徹,所以只能禁邮禁閱。八月十七日大公报上登出大公报总理英斂之、主笔刘孟揚的联名启事,說:“抵制美約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无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耻?故随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誠以此举关系中国前途者既远且大也。今不幸敝报独触当局之怒,严禁士人购閱,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同日发表英斂之署名的“論說”,題为《說官》,譏罵高官。袁世凱把英斂之和旧大公报莫可奈何,却将刘孟揚收买了。刘孟揚辞掉大公报主笔作官去了<sup>①</sup>,袁世凱对大公报也只得开禁,英斂之和旧大公报博得“敢言”之名。这件事,是旧大公报的一段光荣史,也有双重矛盾的背景。以法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旧大公报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运动,象征着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以保皇的英斂之反对媚后的袁世凱,又象征着帝后两党的矛盾。

一九一二年英斂之退隱后,旧大公报的笔政由樊子鎔、唐梦幻等人維持。一九一五年发生二十一条交涉,旧大公报随众反对。这

---

① 刘孟揚辞职后,英斂之以王瀛孙(字葵若)代理主笔职务。在英斂之主持旧大公报的十年期間,先后任主笔的人,現所知者有:方守六、刘孟揚(字伯年)、王瀛孙(字葵若)、黃与之、郭定森(字宝书)、樊子鎔等六人之多,变动是相当頻繁的。



时报館已迁至日租界，言論的鋒芒只針對着袁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則避开不提。至一九一五年末袁世凱称帝，大公报繼續反袁，对“洪宪皇帝”作嬉笑怒罵的抨击。

### 七、何以見重于时？

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揭开內容，如此如此，何以能够見重于当时呢？例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就說：“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論，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級。”旧大公报主张君主立宪，大体上贊同維新，重視西洋科学知識，这些都和《新民丛报》气味相投。本文前节所分析的旧大公报所反映的一些进步意識，都可為讀者所喜。另外还有几个原因：（一）旧大公报背后有势有錢，站得住，倒不了，报能够連續办下去，日积月累，影响就大了。（二）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以至敢于乱說乱登。在那专制时代，一般人是喜听风聞傳說的。旧大公报設在天津法租界，有法帝国主义保护，英斂之本人不作官，这个报就可以“有聞必录”，“風聞議事”，甚至不負責任地乱說乱道。在那个时代，这种报纸是会有市場的。旧大公报的“时事要聞”栏，很受讀者重視，就由于这种緣故。例如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时事要聞”栏載：“傳聞上月二十六日（旧历）英国皇帝有上中国皇帝表文一通，显揭瓜分中国之意，将实見之施行。两宮（慈禧和光緒）覽表，相对痛哭，政府諸公亦一筹莫展。此說盖得自軍机处供事云。按上表之說恐不确，其倡議瓜分則事非无因也。”有“聞”有“按”，登在报上，故聳听闻。旧大公报还常常登載慈禧太后召見王公大臣，怎么講話，怎么罵人，用京話描写，传神繪声。又如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时事要聞”栏載：“駐日楊欽使枢初四日又来电云，日本政府确有倡瓜分中

国之意。……按日本政府向来主持保全东亚，何以忽倡瓜分中国？其已改变方针乎？抑传闻失实乎？姑援有闻必录之例登之，以质诸国民。“又是有‘闻’有‘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并且公然援引不负责任的‘有闻必录’；但是有些读者是喜欢看这种‘新闻’的。（三）也还登载一些引人义愤的新闻，例如维新党人沈蕙，于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在北京被捕，七月三十一日杖毙于刑部，大公报连续登载，因用刑特惨，引起中外人士的愤慨。九月四日大公报“时事要闻”栏载：“拿交刑部之沈蕙，于（六月）初八日被刑，已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光绪帝生日），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不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那拉老太婆这样残酷地杀人，真是吓人听闻。大公报上还登载沈蕙的绝命词四章，其末章云：“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沈蕙死后，大公报上还陆续登载中外各方的反响，在当时是很引人注意的。（四）旧大公报笼统地笑骂官吏，它能抗大官袁世凯，也经常嬉笑怒骂一切作官的，这在当时是受人民欢迎的。英斂之以满洲旗人遍骂大小官吏，另有一种政治含意。在逻辑上，这可解释为：中国的糟糕，并不是清朝皇帝和满族人搞坏的，其过在大小官吏，特别是汉人官吏占绝对多数，因此罪在汉人。（五）旧大公报也参加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如一九〇七年广东水灾，大公报发起募捐，英斂之搞书画慈善会，他个人也参加写字义卖，赈济灾民。旧大公报对于这一类的事，大概常有参加。

## 結 語

我們在整理了旧大公报的历史資料并写成《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以后，不禁发生了很深的感慨和許多的感想。

首先，我們两人在旧大公报服务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曹谷冰二十三年，王芸生近二十年），从来没有考察过旧大公报的历史。我們在旧中国从事新聞工作，除了为了維持生活之外，总还多少有些抱負，想給国家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我們选择了新聞工作，而且一直在旧大公报工作了二十年左右，一是貪图这工作可以安身立命，再也主觀地认为自己是在做着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工作。从来就不懂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旧大公报的阶级底細，和我們个人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場，更没有究問过自己是在为谁服务？

我們两人是在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人主持的旧大公报服务了二十年左右，这是旧大公报的后段，我們还要繼續清算它的历史。談到前段的旧大公报，我們总以为英斂之这个人是中国新聞界的前輩，能文敢言，有胆識，有成就。如此而已，向未深究，甚至連現成摆在資料室里的旧大公报也没有多翻閱过。最近决定由我們两人来整理旧大公报的历史了，才寻师訪友，搜集資料。已經开始动手了，存在我們脑子里的概念，还以为大公报创办人的英斂之是一个富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在政治主张方面是康梁改良主义之流亚吧。我們先存了这个成見，可是經過比較系統地閱讀了旧大公报，特別是对照着英斂之自己的亲笔日記，显露了真相，事实駁倒了我們的成見。再用我們在解放以后十年来所学得的一些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知識，初步懂得了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我們才比較深入地認識了这个大公报创办人是个

什么样的人，也才能判断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是一个以滿族保皇派和天主教为主体，結合法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混合物，英斂之本人是这个混合物的代表。

其次，我們整理英斂之时代旧大公报历史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这个报同法国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国主义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通常使用三种武器——传教、武力和資本輸出。英斂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是沒有明显挂出招牌的天主教机关报<sup>①</sup>。以美帝国主义为例，据有人統計，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資，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費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費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sup>②</sup>。在一九〇二年开始的年代，英斂之用天主教和法国帝国主义的錢在天津創辦大公报，这已先天地注定他和它将要为谁服务了。看看那时期的旧大公报，果然是明目张胆地充当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多方多面地宣传洋教。应该承认：旧大公报曾經充当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爪牙。

第三，英斂之的旧大公报，在对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先亲法，后亲日。原来是受法帝国主义支持利用的，頂到报办得有些声光了，日本帝国主义前来勾誘，英斂之上了日本的釣鉤，轉而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这表現着半殖民地的特色。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交錯着各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間，它們有一致的利益，也有更多的矛盾。法国人把旧大公报从法租界赶到日本租界，这暴露了法日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在英斂之要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办报，靠法与靠日，其性質是完全相同的。旧大公报，在

<sup>①</sup> 后来的天津益世报就是明挂招牌的天主教机关报。

<sup>②</sup> 見《“友誼”，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五一〇頁。

英斂之时代已經亲日了；到王郅隆手里，更加亲日了；到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时代，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基本上也是亲日的。旧大公报和日本的关系是很有渊源的。

第四，使我們感慨更深的是旧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态問題。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說：“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給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給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sup>①</sup>旧大公报的背后有买办資本，有官僚資本，英斂之恰恰是帝国主义給中国造成的少微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知識分子的初期典型之一。美国侵略家艾奇逊在他臭名远揚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分析中国問題，提出一个“西方的影响”。正如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觀的破产》一文所說：“艾奇逊所說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sup>②</sup>英斂之在当时就担任了帝国主义所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文化买办和奴才，而且还干得很出色。

第五，談到这里，我們两人的心情很沉重。这不仅因为我們折騰了大公报的骯髒家底，还因为英斂之这面鏡子也多少照見自己的影子。我們两人虽然階級出身不完全相同，而半生的主要精力是做着一項工作；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不完全相同，而同是半旧半“新”的知識分子，同是“从帝国主义的老窝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时

① 見《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八——一四八九頁。

② 見《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五一七頁。

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sup>①</sup> 這些東西都在舊中國的實際政治經歷中一個個地破產了。因此，反想自己，在過去舊中國的二十多年新聞工作中，曾經販賣過多少西方資產階級的貨色，甚至也多少曾經為帝國的侵略思想充當過義務宣傳員。至於頭腦里裝滿資產階級思想，在實際工作中一直為資產階級服務，那就更不待言了。想到這裡，內心不禁感到震動，為之慚汗交并！我們現在是在新中國為人民的新聞事業服務，雖然經過十年的學習改造，舊的思想意識並未鏟除淨盡，距離世界觀的完全改造還差得多。因此痛感象我們這樣的舊知識分子非認真加緊思想改造不可；不然，就必然要跟不上時代的躍進步伐而落伍了。我們兩人對此真有切膚之痛！

---

<sup>①</sup> 見《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五一七頁。

## “宁粤合作”亲历記

陈 銘 樞

自蔣介石公开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后，国民党已走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絕路，致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愈益无所顧忌。迨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惊醒了中国人民，喚起了大众的民族意識的觉醒，同时也震撼了国民党統治集团内部。在此内忧外患的严重情况下，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及其内部派系——蔣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間的矛盾和冲突，不能不发生一些变化。这一事件，曾迫使蔣介石宣告下野，孙科上台又下台，蔣、汪合作，胡汉民一去不返。接着发生了十九路軍的淞沪抗战。

“宁粤合作”之前，有一段分裂过程。这一分裂与我在广东有关，故先从我在广东說起。

### 我 在 广 东

一九二九年春，我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軍总指揮，分掌广东軍政。自打退张(发奎)、桂联軍进犯后，統一了广东全省，并占据了梧州，扼制着广西唯一通向海口的咽喉。陈济棠在最短的时期內，随着軍事胜利的进展，把兵力由原有一个师(第十一师)迅速扩充为五个师，并控制了駐广东的空軍和海軍陆战队。

我于一九二八年由閩回粵時，所屬的第十一軍有蔡廷鍔的第十師、黃質勝的第二十四師，后又恢復第二十六師，戴戟任師長；蔣光鼐仍任副軍長。

先是，北伐軍攻克平、津，全國除東北外，形式上已具統一雛形。其時我駐防廣東南路，于琮州軍次通電全國軍人，倡議裁軍，擁護統一，力主軍權歸還中央。后又北上，在香港與胡漢民（胡方自歐洲回）同赴滬，企圖以裁軍主張游說各方。抵上海與李濟深同住諸昌年家，晤李宗仁，他譏謂我是傻子，并鄭重地對我說：“當今治天下非我們軍人不可，‘長衫客’（指文人）是不行的。”到南京見蔣介石，他對我的主張當然很喜歡。到北平晤白崇禧，見其氣焰之盛，使我对裁軍問題不能開口。盤桓几天后，又在天津與傅作義見面。后取道武漢返南京，復與李宗仁見面。我已知李、白同一鼻孔出氣，無必要再同他們談裁軍問題了。但我并不因游說無成，放棄自己原來的倡議，故在南京編遣會議前夕，即致電陳濟棠、蔣光鼐，囑他們擁護裁軍方案，并自動將所屬第十一軍的三個師，縮編為一個師、一個獨立旅。蔣光鼐任廣東編遣區第三師師長，戴戟任副師長，蔡廷鍔任獨立第二旅旅長，裁去戴戟之第二十六師。半年后，蔡旅改編為第六十師，蔣師改編為第六十一師，因歷史關係，名義上兩師雖不相隸屬，但實際上仍由蔣光鼐統率，教育作戰，未常稍事分離。我自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后，第十一軍軍部即撤消，蔣、蔡兩部歸陳濟棠節制。省政府有保安隊四團，分駐各縣，負地方綏靖之責。

我同陳濟棠在廣東，雖然是軍政分治，但因陳是我早年在“陽江起義”時的舊部，共事有年，故他對於重要的軍事問題，不僅要依靠我替他策劃，并且要我為他部署作戰。中間有幾次較大的戰



役，如一九二九年冬，在花县与张、桂军作战，就由我计划，并亲到前线布置。这一战役的胜败关头，决定于前十天的攻势防御阵地的布置，由正面向左延伸到芦包西江边沿作防守地带，并于事前一星期筑好一条由广州到花县的公路一条，以利运输和为出击地带展开强大的纵深配备。战斗结果，张军被击溃，桂军亦撤围逃逸。从此结束了广东境内的粤桂战争。

其时，我因鉴于广东富庶之区，军队驻防过久，容易腐化堕落；且两个自成系统的队伍（我部与陈济棠部）同在一起，日久必会发生摩擦，甚至引起权利之争。况蒋、蔡两师将士，正锐气方刚，大足有为，自应面向全局，不宜安于现状，留恋桑梓。故当省内战争结束后，我即将此意向蒋、蔡说明，要他们愷切转告全体将士，作好精神准备，随时候命出发。又因陈济棠是有名的败兵之将，如一九二七年冬，我军由闽回粤与张发奎军大战于东江，陈时任左翼，与敌一触即溃，并将军队撤向后方远颺，至陷我军于败绩。因此全军上下，对陈极为不满。此役结束后，白崇禧在南京以总参谋长名义致电李济深，主按军法惩办陈济棠；但事平之后，陈不仅未受处分，且升为军长，军队且驻在广州附近的好地方。现陈既总揽军权，且不断扩充实力，野心勃勃，因此更加不满其所为，故亦愿外调，不与共处。

当一九三零年夏，蒋与冯、阎大战于中原，战事剧烈；我电蒋说：“蒋、蔡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军乘机再起，直入湖南，图出武汉与冯、阎相策应。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急调蒋、蔡两师出韶关入湘，以逼张、桂军之后。时张军已占领长沙，桂军（由黄绍竑、白崇禧率领）已抵浏阳，闻我军讯，忽变更计划，回师应战，且有夺取广东意图。我闻讯，即与陈济棠会商，任

命蔣光鼐为前敌总指揮，以陈部李揚敬师归蔣指揮，馳往接应；并决定由陈亲率余汉謀、香翰屏两师为后續部队。时蔣、蔡軍次未阳，白部前鋒已抵茶陵，預計兩日內，双方即將遭遇。因敌我众寡悬殊，而李揚敬师刚越过大庾岭，此正軍事机动关头，我正筹算未决，忽接蔣光鼐电称：“拟将兵力移向左侧方，扼守衡阳，撤去后方，使敌扑个空，然后与后續部队夹击敌人。”我心所躊躇者，至此始得解决，立即找陈济棠商量。殊他不同意蔣光鼐的計劃，定要将部队撤回大庾岭，在九峯、坪石一带布防，凭险固守。我再三解释无效，乃即直电蔣光鼐說：“你的計劃好极！我軍撤移衡阳，拊敌前进側背，如猛虎在山，虽属险着，的是妙算。陈总指揮要你退回，是行不得的！万勿变更原計劃。”我电未到，蔣光鼐已先接陈电，即电我說：“陈总指揮来电，真使人头痛，我不能接受。”我再复电說：“前电此时諒已收到，兄此着誠妙，歼敌必矣！謹先預賀，靜候捷音。”結果张軍慘敗，几于全軍复沒，黃、白所率桂軍，亦狼狽退回广西老巢。战事剛結束，蔣、蔡两师即被調到津浦綫与閻軍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正式改編为第十九路軍，蔣光鼐任总指揮。后蔣光鼐又亲率两师突出平汉綫，与馮軍作战，大胜；战事結束，又被調到江西与紅軍作战。至我到江西就任“剿赤”右翼集团軍总司令官时，始重領該軍。回溯过去种种，都成罪过，十九路軍之轉战南北，只有大造于蔣介石的独裁統治。

已如上述，广东为富庶之区，稅源甚富，蔣为籠絡陈济棠，并使粵軍替他看守桂系，故指定以中央在粵稅收，全部撥給陈作軍費，連同省收入項下撥給的一部分，每月共达四百三十万，加上广西梧州稅款，共达五百万以上。按当时中央規定，每师軍費为三十万，陈只五师，加上每月对出省部队（蔣、蔡部）最小部分的协餉，超領

經費极为庞大。因此为中央規定,我亦不甚注意。同时,我亦曾利用职权,弄了一批錢来做我个人想做的事,如以巨資接办上海神州国光社,筹办广东艺术学院和大剧院等等。陈在我职权范围内的政务从未干涉,因而我同陈根本不存在經濟利益上的矛盾。

其时,最使我伤脑筋的倒是留在广东的胡派人物。自张发奎、黄琪翔在广东失势后,汪派在粵已无立足余地。胡派在粵势力最雄厚,党政軍学各界都有。其代表性人物为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隐、胡毅生(胡之胞弟)等人,都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奉胡汉民为正統。按当时臧否人物之說,这些人亦有清浊之分,清者如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隐等人,尚有刚劲之气,且能廉洁自守。浊者如古应芬之流,常凭借資格,利用政治背景来朋比营私,甚至胡夫人陈淑子,亦公然出面向財政厅长范其务介紹极不体面的包賭包烟。我同范都极尊重胡,并爱护胡的声誉,故不徇所求;又因蔣、胡两次合作,都曾由我主动斡旋,故深愿由此提高胡的威望,以利国民党的統一和巩固,自信动机純正,故亦不以此介意。不料竟因此而开罪了胡家,并遭到大部分胡派的嫉視,因而他們捧“扮猪吃老虎”(广东土語)的陈济棠同我对立。后来又引进了他們过去的“眼中釘”汪精卫,終于酿成宁粵分裂的局面。

### 宁粵分裂前后

一九三一年二月,蔣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湯山。消息传到广州,軍政各界都极震動,且大惑不解。一时謠譟繁兴,紛紛揣測不一。不几天蔣由南京来一通“解释誤会”的电文,說:“胡展堂先生对国民會議,坚持主张不得議及約法,恐因此引起党内无穷糾紛,儉(二十八)晚特与詳細討論,胡先生以政見不合,欲辭本兼各

取，并欲择地静居，謝見宾客，故于本日往湯山暫住。乃聞謠傳扣留，殊覺失實。”此電文欲蓋彌彰，反証實了胡確已遭遇和李濟深相同的命運，在湯山被囚了。大家相對時，無不怒形于色，都以行政院長（時蔣兼行政院長）扣留立法院長，毀法亂紀，中外所無，紛紛表示憤慨。

胡與李濟深本有師生之誼，而我及粵軍將領又多李之舊屬，感情自然容易沖動。加以胡派首腦古應芬之流，又到處點火，不久就掀起了反蔣高潮。當時我對蔣獨裁之不滿，以及對胡李之愛重，并下于其他軍政人員，但以中央扣留一二大員，就要興師動眾、分裂對立，這種想法在我腦子里是不存在的。如上年李濟深被扣時，粵軍將領亦紛主用兵，胡同我均不同意此舉。我曾公開對他們說：“你們如果因李總長（李時任參謀總長）被扣而用兵，對他并無絲毫好處，反而坐實了他勾結桂系、擁兵自衛（蔣扣李時所加的罪名）的罪名。”几經疏解，始免了那場干戈。

在此局勢動蕩不安之際，我曾電在江西的蔣光鼐、蔡廷鍔，征詢他們對於反蔣的意見。他們復電表示：“擁護統一，反對內戰”，這就堅定了我的主張。為了緩和空氣，我借故出巡各县，擬俟諸人情緒平復後，再從長計議。不料在我出巡期間，陳濟棠信使四出，古應芬又同我的朋友黃居素勾搭起來，黃公然說：“對陳真如暫不必征其同意，等我們醞釀成熟，布置好了，他就會跟着走。”我聞訊，極為激憤，心想這不是要做成圈套來套我嗎？我立即回廣州，開始仍圖挽回局勢，但古、陳等已與汪精衛拉攏，情況極為複雜，且已到箭在弦上、有不得不發之勢。這與我初衷不合，故即悄然離開了廣州。

我到香港後，廣州局勢突變，不幾天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

四月三十日，四监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时林、萧两人尚在国外）以通电形式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五月三日，陈济棠发表响应通电，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亦发出响应通电。先是，孙科曾以调解宁粤争端为名南下，到港后突与汪精卫合流，并相继进了广州。二十七日，广州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邓泽如、孙科、邹鲁、许崇智、林森、古应芬、李宗仁、陈济棠、陈友仁、李烈钧、熊克武、唐生智、蒋尊簋等十六人为国府委员，成立国民政府。二十八日，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告，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即行引退。

五月初，我尚在香港，住九龙半岛饭店，省保安队第四团团长翁照垣来见，他激动地说：“只要主席点头，我回去把陈济棠干了！”我说：“这使不得！我之离粤是为了避免纠纷，并不是对陈济棠有什么私人仇恨，过去同张发奎自相残杀的历史，万不能重演。”他又说：“如陈要来打我，就要同他拼到底，即使只剩一枪一弹，我也不屈服。”我说：“你回去看情形再说吧。”其时我对粤局深感不安，恐他们因我在港未远离，容易发生误解，故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本人对职务毫无留恋，此后欲赴日本、印度及南洋群岛考察经济、政治。”九日我就到上海，原来尚拟到南京一行，后因得朋友之约，即变更计划，提前赴日本旅行。在日期间，迭接广东方面消息，知陈济棠曾使用武力解决省保安队，缴了琼州黄固团的械，继又使用陆海空军与顽强抵抗的翁照垣团激战于黄埔，翁弹尽时始泅水搭轮赴港。我即致电责陈说：“粤省保安队数千人，保卫地方，无关权位得失，竟欲灭之，毁民保障。若以枢去国为未足，为此而泄愤，则非枢所敢闻也。”陈自解决省保安队后，亦自相惊扰，一面给我复电，

解釋“誤會”；一面又派他的師長香翰屏到贛州游說蔣、蔡，請守“中立”。蔣、蔡答以擁護中央解決粵局的方案。陳見計不得逞，乃調李揚敬、余漢謀兩師開往韶關，在南雄、仁化一帶，布成三道防綫；又調香翰屏師扼守惠州、河源一帶，實行軍事戒備，以防十九路軍的回粵。

### 我與蔣介石的勾當

我在日本住了二十幾天，即取道長崎回國。因上船時避過日警探注意，行踪甚秘，故回上海後，蔣介石才知道我已回國，立電邀見。時我已得贛州消息，知十九路軍全體，在此局勢混沌時，有徬徨無主狀況，急圖回入軍隊，故即應蔣召入京，初並無任何打算。抵南京後，蔣見我歡喜異常，當天即將他愚而待決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領十九路軍，將部隊集中吉安，並要我擔任“剿赤”右翼軍總司令官。他並對我說：“‘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滅的，到進剿到一定階段時，就要你擔負起打回廣東的任務。”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還在於圖粵。我明知十九路軍將士不願內戰，而我自己也無染指廣東的意圖，但因急于回軍，故只得姑且應允，俟時機成熟，再作良圖。這是我當時打定的主意。計議既定，我就準備到江西去指揮軍事了。

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突接到蔣的電話，要我前往晤談。時蔣住在中山陵園“官邸”，我去時，他從草坪上走來迎接，親切對我說：“你明天就要出發了，我們隨便談吧！”其時院內和坪地四周，靜悄悄地看不見一個人影，只有他同我兩人坐在草坪的藤椅上。我初尚不介意，事後才明白，這是他事先作好的密談安排。

兩人入座後，蔣先開口了，他帶着幾分喟嘆的口吻說：“革命大

业的創造，还很艰难，北洋軍閥虽然被打倒，‘赤禍’又来，而我們党内各地同志，又各怀异心，隱患重重，現在又临到多难的时候了。”談至此，他加強語調說：“今日必須仗忠义之士，精誠團結，作为中央骨干，同心协力，生死以之，才能奠定国家，巩固統一。”他稍停頓了一下，我立即发现其用意所在。果然，他并不轉弯抹角，直接了当地說：“国家前途的担子，已經落在我們的肩膀上了，我們又不容辞，要負担起来，就必须合为一个整体，成为不可分的巨大力量。”他望着我又說：“我想到此，我两人可以效法刘、关、张桃园結义的故事，你以为如何？”他把話說完，就倒在椅上靜待我的回答。我听了这一席話，頓时想到：——你早几年（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时）由徐州敗退下来，我同你在一列火車并同在一个車廂，你对我殷勤备至，你草拟下野通电，表示引咎。我趁你失意时，进行忠告，很委婉地提出：你在上海拜青帮头子黄金榮为师，同杜月笙、张嘯林等拜兄弟（后又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結拜金兰），这些作风同时代并不适合。你現在又用这手法来套我，我怎能受你的套呢？——旧的回忆和新的感受，一齐涌上心头，不到一分鐘，我立即用严肃的口吻对他說：“桃园結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結果。总司令！你現在是国家元首（国府主席），又是軍隊的最高統帥（陆海空軍总司令），只要你能开誠心、布公道，政策方針昭示得正确，自然四海归心，一切忠义才智之士，都会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結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賢路。因为現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我的話不啻泼了一盆冷水，他听了气氛頓改，沉靜了許久，找不出一句話来对我表示。我呆了半晌，觉得彼此都很窘，乃即告退。第二天，我乘飞机到了江西。

七月十一日，我到贛州后，即同蔣光鼐（时他已到沪养病）、蔡廷鍇、戴戟等联名发出通电，拥护中央統一，同时就任“剿赤”右翼集团軍总司令官职。十四日，我致电陈济棠，提出三点：（一）請古应芬交出政权，迅即离开广州；（二）恢复以前之省保安队；（三）省通运公司及禁烟局維持四月前現狀，以維持保安队原来經費。在此期間，我同汪精卫文电来往，互相責难，我的主要精神不外：反对內战，拥护国民党中央統一；力求党内团結，一致对外；特別对于反共之坚决，跃然紙上，如我的电文中有“誓与共党决最后之命运”等句。汪的回电，則以“剿共必倒蔣，倒蔣必剿共”立說，但又有“蔣之揚言剿共，果能实行，則此間決不以一矢相加遺”等語，足見国民党內部，虽然有种种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在反共問題上，仍屬“一丘之貉”。自我到贛州后，粵方深感不安，他們亦料到蔣將利用我图粵，故汪致我的电中又說：“若借‘剿共’之名，入寇广东革命根据地，則此間武装同志，固已严陣以待矣。”当然这是一种姿态。

七月中旬，我将十九路軍集中吉安，总司令部又将右翼各軍如陈誠、卫立煌、上官云相、郝梦齡、赵观涛等部，拨归我节制，統率部队虽多，能战者甚少；且蔣本人常直接下命令給各軍、师长，名虽归我节制，实际不归我指揮（例如韓德勤一师，未通知我被調往进攻紅軍，至被消灭时始接到該师的“呼救号”，尚不知其陷在何处）。只有十九路軍所轄的三师（原有第六十、六十一两师，后又扩編第七十八师）在我掌握，且較有战斗能力。

我入贛后不久，已深深感到：对紅軍作战不易；十九路軍长期轉战，兵力漸感疲敝；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日軍蠢蠢欲动，強邻压境，东陲堪虞；蔣对軍事指揮，亦复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賞罰不明，如他的嫡系蔣鼎文，屢吃敗仗，不惟不受处分，且不次擢升，漸



躋方面。环顾内外形势，使我不能不重新考虑问题——主要是怎样使十九路军摆脱目前处境，并怎样避免对广东的军事冲突。

我与邓泽生(演达)是同学、同事，向来交谊甚笃，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同甘共苦，关系尤为密切。虽然他早已同蒋对立，势如水火，但他同我仍保持旧交，且经常密切联系。我在江西时，他曾来信同我交换对时局的意见，我即以个人所见相告，希望彼此能进一步合作，共筹应付时局办法。经密函来往，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待江西军事告一段落，乘蒋调我攻粤机会，俟军队进入粤北，即急转潮、梅，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泽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邓并通知我说：“陈诚是他的人”。我同邓计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他并派其秘书杨銓(杏佛)到吉安我军中密商。决定后，我又将全部计划通知蔡廷锴，并预先约定好通讯“暗语”。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泽生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这一密计的时间，大约是在八月上旬，距我到江西时还不到一个月。

九月中旬，十九路军在高兴圩与红军决战，战事告一段落。时蒋急于图粤，要我领十九路军打前锋，并派蒋鼎文部为后续部队（名为策应，实欲待广东平定之后，坐享其成，他以前之被蒋不次擢升，至此我方明白其用意所在）。我即下令将十九路军集中赣州，并另给蔡廷锴密令，说我三日内即来赣州，一切照“计划”行事（即我同蔡元培、邓演达合作的计划）。接着我又乘飞机到南昌见蒋介石，向他报告说：“我的部队已作好准备，即将回粤讨伐陈济棠，特来请示。”蒋很高兴地回答说：“你就照前定计划行事（蒋同我先商

定好的图粤计划),先回赣州吧!”

### “九一八”事变后

当我到南昌向蒋“请示”的那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次日早饭后十时,我正要上车赴飞机场时(到赣州),突接参谋长熊式辉的电话,说有紧急事讲,蒋要我到总司令部去。我前去,直入蒋的办公室,见蒋及何应钦、熊式辉三人,呆坐一室,神气颓丧,面面相觑,形同木偶,我入内也没有人招呼。我很纳闷,心想出了什么奇祸吗?半晌,他们才拿出一通电报给我看,原来是张学良报告日军侵占沈阳的急电。我阅毕,极感震动,觉得形势极端严重,立即想到我同蔡元培、邓演达三人的合作计划,现应根本打销。我随即对蒋说:“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强敌入侵,应当举国一致,共御外侮;而团结全国,首先要求全党团结;目前同西南对立的局面,必须由中央主动解除,争取他们言归于好,非常必要。”大家听了我的话,都默相首肯。蒋考虑了一下,随即问:“谁能去呢?”我立即答:“我是从广东出来的,当然我去。”态度十分坚定。蒋听了完全首肯,连说:“好,好!就这样办。我们就准备回京吧!”决定后,我同蒋及何应钦三人,于当日下午,搭上专机,飞到了南京。

当晚,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派代表去广东的问题。会议由蒋主持,首先由他提出我的建议,全体一致赞成。接着有人提出说:“陈真如去是再好不过了,但还要派一二元老同去才好。”又有人提议:“请李石曾、张溥泉两先生同去吧(宁粤分裂初期,李石曾到粤进行疏解,但无结果)!”我因一向深恶李之为人,故立即起来反对说:“如要派李先生去,我就不去。”大家问:“再派谁呢?”我说:“蔡子民先生最好。”有人又说:

“蔡子民先生固然好，但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呢（时蔡因不满蒋之所为，早携眷离京赴沪）？”因我同蔡曾有过一段秘密合作历史，心想由我邀他，断定其必来，故说：“国难当头，如中央推定了他，我相信他是会来的。”大家完全同意。会散后，我立即致杨杏佛一电，请他同蔡明早一定来京。次日蔡果然来了，我即陪他去见蒋，经过几度会商。其时，因粤府（广东国民政府）发出马（二十一日）电，提出解决时局三个办法：“（一）蒋中正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因此蒋亦提出解决粤局的三个原则：“（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中央同志，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地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切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此其一也；（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此其二也；（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京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此其三也。”蒋另又写一亲笔函交我直交汪精卫、孙科等人，函中有：“弟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弟愿一人承乏，谴责之加，何心复求推卸，……毋使五千年神明之胄，自我而斩；毋使亡国之惨史，将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之所致”等语。二十四日，我同蔡、张抵沪，并致粤方诸人一电，告知南下日期，要他们“命驾来港，共同‘商榷救国大计’。”我们一行于二十五日乘荷兰船由沪赴港。

## 南 下 議 和

我同蔡元培、张继等三人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香港，粤方派傅秉常（孙派）到码头迎接。粤非常会议正式派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同日到港，住九龙半岛饭店，我们立即前往会晤。我除当面递交

蔣的亲笔函外,并把蔣的三个原則(詳前)提出,汪等亦提出他們的馬电三办法(詳前),隨即广泛交換意見,并詳細討論具体办法,惟未作出決定。次日,他們复到我們住的麦斯林飯店會談,新由歐洲回國的伍朝樞(伍廷芳養子,胡派骨干,接近孫科)亦应邀參加,共同議妥办法兩條,由蔡、張同我以艳(二十九日)電向蔣報告,其要點為:“(一)鈞座(指蔣)發一通電,為時局危急引咎,并聲明議定統一政府办法時,立即下野。粵亦發一通電,向國民引咎,并說非統一不能救國,赴京開會,取消國民政府(即廣東新成立的政府),并不以鈞座下野為條件,兩電須同時發表,電稿均在草擬,容即電聞。目前兩方均訓令各級黨部及報紙,停止兩方互相攻訐之言論。(二)須立即變更京滬衛戍警備組織,俾粵方諸同志可以安心來京,在總理靈前,宣誓開會,決議統一政府办法。”三十日,我們同汪、孫等人入廣州,同古應芬、陳濟棠、李宗仁等多人晤面,隨即至退思園與粵方全體舉行會談。同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我為京滬衛戍司令長官兼淞滬警備司令,此為蔣得我們的艳電后,接受粵方變更京滬衛戍警備組織條件的表示。后粵方又要求調十九路軍入京衛戍,作粵代表北來的安全保證,經電蔣后,亦得同意。此時雙方表示尚好,和議頗有進展。后粵又提出蔣發表下野通電的日期,因而激起蔣之沖動,他給我們的電,重提他的所謂三個原則,并帶着埋怨的口吻說:“兄等竟忘此三個原則和无條件三字,而來此絕無磋商余地之東電,未知何意?誠令人不解!且中正接兄等艳電提議后,故立任真兄為衛戍總司令官,此亦不愿有條件,渴望竭誠合作之意也。”事情發展至十月五日,粵方決不讓步,非常會議決議:“(一)最低限度先釋放胡漢民;(二)全體聯名請胡复出,函交陳銘樞代表帶往;(三)本決議案由京代表電蔣。”同時廣東國民政府亦作出決議:

“(一)由蔣決定發表下野通電日期；(二)十九路軍調寧後，粵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滬商有頭緒，粵委始赴京。”

後得蔣復電，表示：“對通電原則（即蔣下野的通電），前已贊同，且早願早發，無所猶豫，惟當此外交緊急，存亡呼吸之秋，不可一日無政府，此電文雖發，電後即未下野，中外心理與事實，實已入無政府狀態，……如粵中同志能早到滬，或精衛、哲生、湘芹（古應芬）、君佩（李文范）諸兄先來亦可。諸兄朝到滬，此電夕發出。”此電為粵方最初允派代表赴滬和談的根據。六日廣東非常會議發表麻（六日）電，強調“民主政治之先決條件，在使武力受政治支配”；又提出四項辦法：“（一）廢除陸海空軍總司令；（二）設軍區，軍區之劃分，不同於行政區域之劃分；（三）軍需之獨立，革除以個人支配軍隊、以軍隊長官支配軍餉之惡習；（四）國防統一於中央，保安屬於地方”等等。至此，雙方談判告一段落。

接着，決定我先行回京，蔡、張暫行留粵，候胡漢民釋放、得我復電後，粵代表始北上。我於十月十一日返滬，與顧孟余（汪派）、黃華表（桂系）同行。抵上海後，我對記者說：“本人至京復命後，蔣、胡當定期約粵方同志來滬會商，蔡、張兩先生回來時，和平統一，即可實現。”其時，我對和談甚感樂觀，以為只要粵方能派代表來會談，統一局面，不難立致，團結御侮，大有可為，故繼又對記者表示：“本人就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時，即將辭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及國府委員，以免以軍問政。”這是我當時主觀的想法。

以上是我南下議和的簡單過程。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對和談最感興趣，古應芬、陳濟棠最冷淡，孫科和桂系是中間偏向汪之主張；而非常會議領銜的唐紹儀，僅備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談有初步進展，汪賣氣力最大。

### 蔣汪胡會見後的波折

此次寧粵分裂，是以蔣扣留胡為導火綫，我在南下議和中，粵方以最低限度須先釋放胡為先決條件。十月十二日，我到南京，向蔣報告了議和經過後，立即提出釋放胡的問題，蔣亦明知此點如做不到，粵方代表是不會來的，故被迫答應。次日下午我即去見胡（時胡已由湯山遷回雙龍巷住宅，有軍警看守），遞交了汪、孫等人的聯名信，並詳述粵中情況，同時勸他捐棄前嫌，以國事為重，胡表示首肯。我隨即勸他先去見蔣，他亦同意。我即陪同他前去，他們見面時，表現尚覺融洽，胡對東北問題發言甚多。當即由蔣決定，推我及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吳鐵城等同胡一起赴滬，候晤汪、孫等人，並歡迎他們入京，開和平統一會議。十四日晨，蔣又親往胡宅拜訪，下午我們陪同胡赴滬。此為胡自一九二八年入京後第一次離開南京。當時南京高級官員，每周末都要乘專車到上海租界去度紙醉金迷的荒淫生活，恬不為恥，惟胡能洁身自愛，從不出都門一步（他並對此提出彈劾），一時傳為美談。

胡抵上海後，即致電唐紹儀、汪精衛、孫科等人，說：“弟亦容或為過誤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檢，担負以往過誤則較輕，而今日盼望吾輩糾正過去錯誤之心最切。”最後請粵方推代表來滬，進行和議。至此，粵非常會議乃正式決定派汪精衛、孫科、李文范、伍朝樞為代表（後加派鄒魯、陳友仁二人）同蔡元培、張繼來滬，進行和談。

十月二十一日，上海黃埔江中停泊了一艘外國郵船，載來了汪精衛、孫科等粵方代表，同行有京方的蔡元培、張繼外，尚有張發奎、唐生智等多人，連同隨員共達一百餘人。據當時上海報載，當天自晨六時起，江海關碼頭聚集歡迎者達數千人，反映了當時上海

各界对于和平御侮的渴望。南京中央派来以于右任为首的欢迎人员甚多，并以贺耀组任招待。船驶入吴淞口时，我同上海市长张羣等人乘小輪直到楊树浦登輪迎接。汪、孙等登岸后，立即到胡寓与胡汉民会商。后蔡、张約我同到孙寓，詳細安排蔣、汪、胡的会見。汪、胡、孙等住所，門庭如市，一时上海頓成政治中心。

二十二日，蔣介石乘飞机抵沪，立即同宋子文会商，然后才約于右任、蔡元培、张繼和我晤談。是日下午一时，蔣到孙科寓所与汪、胡等人会見，彼此握手后，互道契闊，旋即正式举行会談。出席者为：蔣中正、汪兆銘、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繼、陈銘枢、李文范、邹魯、伍朝枢、张人傑(靜江)、李煜瀛(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十六人。众人入座后，由胡請汪先发言，汪起立說：“同志們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粵方同志，解决一切，共赴国难。”同时并提出粵方三項主张：“(一)国府組織宜如德、法总统制，由行政院負政治責任；(二)废除总司令职；(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同时对蔣所拟关于他个人进退的电稿，表示贊同。蔣繼起发言，先贊成汪发言，并說：“本人亦如是，公而忘私。”又說：“諸同志皆党中前輩，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輩。此次諸同志議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責。”言毕，李石曾发言，先述及国难和团结的必要，主张大家馬上入京，已无须在沪会議。蔡元培、张繼等即表同意。孙科立即起来反对說：“我們此来系代表粵府，須照預定程序，議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則須电粵府請示。”汪隨即說：“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現下若入京，則協議签諾之事，各方将誤会吾人为自由意志，反为不佳。”蔣对汪言，表示諒解，贊成即在沪会議，并說：“胡先生可代表本人。”繼又叮嚀地說：“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无不照

办。”在会談中并正式決議两点：“（一）彼此須求得外交一致，共赴国难；（二）关于党政軍問題，由京派代表与粵方代表在沪詳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會議，謀彻底办法。”談毕，蔣即逕赴龙华机場，乘飞机回南京去了。此次会談共历三小时。

此次蔣、汪、胡三人的会見，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又一次的动荡。自一九二六年秋，胡因廖仲愷被刺案涉嫌赴苏联时起，他們就开始参商。汪自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悄然离粵，中間經過宁汉分裂、扩大会議、非常會議三个阶段，与蔣对抗；胡自宁汉分裂起，至他被蔣扣留止，中間与蔣两次合作。此次三人会見以后，蔣、汪曾有两次合作，在抗战中汪出走作了汉奸；胡在此次和談中赴粵，一去不返，繼續凭借陈济棠以抗蔣，以終其身。这短短三小时的会見，是他們在此六年間仅有的一次，也是他們毕生的最后一次。

根据此次会談决定，在上海召开宁粵統一會議（即上海會議），粵方代表为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邹魯、陈友仁；京方代表为李石曾、张繼、蔡元培、张靜江、陈銘枢、吳鉄城。會議在二十年前南北議和（即唐紹仪、伍廷芳各代表民国、清廷在沪議和）的伍宅（伍廷芳私邸，为伍朝枢繼承所有）举行，共开了七次會議。會議前和會議中发生許多波折，粵方坚持中央政制改革和一、二、三届中委决定党事两提案，京方則坚持政治主张必須根据建国大綱及約法，并強調党的法統，不容紊乱，以与粵方提案針鋒相对。就是說，粵方一定要蔣下台，京方一定要蔣呆下去，双方勾心斗角，极尽詭譎之能事。自粵方提出党政改革提案后，蔣公开翻脸，繼則因京方“某中委”（吳稚暉化名）发表諷刺粵方談話，因而引起蔣、胡交謫，舌戟唇枪，互不相让，至开第五次會議时，和談遂告中断。后經张繼等人的斡旋，繼續开了第六、第七两次會議，最后决定京粵双方



同时召开四全大会，草草结束了这次会议。

双方分别召开四全大会，已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粤方召开的四全大会，竟在会上大演“全武行”，部分代表宣告退席，粤方内部再告分裂。后来汪派代表又在上海“大世界”开会，选出中委十人。广东选出中委二十二人之后，大会即行结束。

先是，上海会议决定京粤分别召开四全大会时，曾推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粤报告，后因粤方内部分裂，孙科负气赴港转澳门，汪、胡等乃在上海集议，决定推胡回粤解释。胡行前对人說：“此行责任重大，决只到港，不进广州，若两派不能一致，本人决不返沪，就将赴欧养病。”胡之缺乏政治担当，由此可见一斑，他之一去不返，促使了蒋、汪的合流。

### 蒋介石被迫下野

四全会结束后，主要议程就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仍不愿入京开会。自胡南下后，广东方面的态度更转强硬，粤曾用中常会名义作出决议：“至二十日（十一月）若蒋下野事未办到，即在粤召开一中全会。”至此，蒋方表示愿意立即下野，并同意粤方提出的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其时，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全国学生的抗日运动，波澜壮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巨流。首先是北平九大学的学生二千多人，发起赴京请愿，要求搭车南下，路局拒不开车。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說：“宁可停車，不许通行（可见蒋是何等的怕学生请愿）。”僵持达数日，平、津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后张再与蒋电商，始行掛車运送，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的学生，胜利地到了南京。不久南京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九个大专学校的学生，共达一万多人。他们到国民政

府請愿，逼着蔣硬着头皮出来接見，后又到中央党部請愿，值中央常会开会，大家推蔡元培同我去接見，在羣情激昂中，蔡同我均被毆。

在学生到中央党部請愿前，蔣已决定辞职，他曾約于右任談話，并派我同何应欽赴沪，促粵中委入京主持一切。

十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临时常会，在京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主席，決議案：

“（一）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蔣中正呈請辞职案，決議准蔣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銘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

（二）考試院长戴传賢、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請辞职案，決議慰留。”

会后蔣发表辞职通电，略謂：“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的精神，接納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粵同志迄未能实践諾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五）日通电，且有必須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語。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統一方能实现。权衡輕重，不容稍緩須臾，再四思維，惟有悬請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

同日，林森同我联名发表就职通电，大意为：“对于施政大端，一切維持现状，无所更张。即望第四届第一次全会早日开会；政府正式改組，俾完成党国大計。”

我之被推为代理行政院长，全属于粵方的主张，而蔣亦要我来緩和双方的爭議，且早已說明是过渡时期的“看守政府”性質。此种趋势，客观上早已形成，无可紀述者。惟林森之代理国府主席，且由此一直蟬联到他的死，为时竟达十二年之久。在他被推选时，是出人意外的，因林与蔣本不甚密切，在宁粤分裂时，他还是弹劾

蔣的四监委之一。因其中尚有一段史話，外間尚鮮有知者，特在此紀述之。

当第二次討袁(世凱)失敗，我同林森相識于上海，他同我的几位朋友都很相契，我很喜欢其恬退淡泊及其山林隱逸的风貌。我以后無論在南京或上海，总喜欢同他清談，有时同逛夫子庙（南京）、城隍庙（上海），看他蒐集了許多假古董。宁粤分裂时，他本在海外，被列名参加弹劾蔣的提案。上海和談时他始归国，隨即到南京，不預聞宁粤任何一方的爭議，表現了他的超然地位，但并未被蔣重視。当蔣決定下野时，曾約我到他的书斋密談，他向我提出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初并未察覺他早已屬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論及，故說：“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沒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沒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粵所提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蔣急問：“是誰？”我答：“林子超（林森字）。”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說：“林一向愛清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說：“我可以劝薦。”蔣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遞。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顧慮，經我劝說，他答应了。事后我才知道，蔣早已屬意于右任，且有种种迹象，如汪、孙初到沪时，蔣即派于为欢迎的首要人員；蔣、汪、胡在上海会見时，参加者名单，于名列前茅；蔣辞职前夕，特約于密談，等等。因我心粗，且因和談事双方奔走，故未暇注意及此。后来聞于因未登上主席“宝座”，还流了老泪，我感到有些歉然。林自正式任主席后，參軍长呂超是由我推荐的，侍卫长由我的侍从副官充任。

蔣被迫下野前，早有卷土重来的打算，故設下重重陷阱，使后来者难乎为繼。就在他辞职那天，他还主持了行政院国务會議，決議改組苏、浙、贛、甘四省省政府，以他的亲信軍人願祝同任江苏省

政府主席，魯滌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輝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以邵力子任甘肅省政府主席（時因孫蔚如部入甘，孫兼任甘肅省府主席，楊虎城因某種原因，覺得困難，故電蔣荐邵為甘省主席，此時乃一併發表），賀耀組任甘寧青宣慰使。

最陰險毒辣的是他還槍殺了第三黨領袖鄧演達。鄧在上海被捕時，我正在江西指揮軍事，距離我同他密謀合作的時間甚近，但他的被捕消息，是我到了京滬後才知道的。其兄演存累向我探訊消息，我還說：“照目前蔣的情況（逼着他要下台了）看來，他還不敢下毒手。”且我十分相信擇生對我說的，“陳誠是他的人”，以為陳總會暗中維護，故很放心。同時我又深知蔣之殘忍成性，凡被他扣押的人，若有人出面營救，只會促其早死（實例甚多）。有人曾這樣設想：在和談中若果由粵方代表出面營救，蔣會被迫接受。但應知粵方諸人，特別是汪精衛恨鄧之深，並不下于蔣（鄧曾公開罵汪，說汪除“倒蔣拥蔣之外無主張”），他們不送“催命符”已算好了，遑言營救？我事後得知，蔣殺鄧時，曾組臨時軍事法庭，由恨鄧最深的吳稚暉、戴季陶、何應欽審訊。我聞擇生凶訊後，驚悼異常，只得給資交其兄演存，收殮遺骸葬于南京麒麟門外，並親書“故友鄧擇生之墓”，豎碑志之。

我代理行政院長職務，為時甚短，約有數事可紀：

行政院各部部長及重要司長，莫不紛紛辭職，無論是否批准，是否有人接收，都先一走了事。外交部長顧維鈞，留下辭呈逕赴上海去了。財政部長宋子文向我提出辭呈，聲明只負責到一中全會開會時為止。財政部科長以上人員，都同時總辭職，各署長已不到機關辦公，紛紛作鳥獸散。

在此期間（或以前），行政院曾接到溥儀自天津來電一通，表

示內向，并請示行止。我記得在行政院国务會議（或中政會議）討論過。記得當時大家都以溥儀為一“皇室”，“扈從”人員必多，政府很窮，沒有這筆錢來做接待費，竟擱置起來，并不答复。最近我曾托載濤委員詢問溥儀對此事的回憶，据复，溥本人對此已記憶不起。又查“中外歷史年表”載明：“日本特務拥清廢帝溥儀至東北”，為十一月間事。此事如不在我代理行政院長期中，則當在以前，因為我為中政會議委員及國府委員，重要會議我均參加，至今對此事記憶猶新。這是國民黨對人民的一大罪行，也反映了當時南京政府的腐朽以及當權者之昏庸誤國。

#### 四 屆 一 中 全 會

自蔣介石下野後，各地中委紛紛入京，孫科偕粵方中委同日到中山陵謁陵後，并與蔣晤談，惟汪、胡均稱病不來。十二月十二日，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開幕，到有中委九十人。蔣出席了當天的開幕式以後，就帶着宋美齡偷偷地乘飛機到了寧波，隨即回他的老家奉化去了。蔣行前曾約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談話，說：“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鉅。前在滬時，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氣，希望三位再代轉達。中興本黨，非汪先生莫屬。”此為蔣、汪後來在煙霞洞會議的伏筆。同時蔣又留函致于右任、何應欽、孫科等人，說：“全會既開，弟責即完，故須還鄉歸田，還我自由。”并說：“此去須入山靜養，請勿有函電來往，即有函電，弟亦不拆閱也。”次日，蔣果然登上了溪口妙高台。蔣走後，一部分中委力主蔣回京，有主以大會名義“速駕”者；惟另有一部分中委認為可遵蔣意，予以“休養”機會。

在首次大會那天，有名在案的“某中委”吳稚暉又大放厥詞，他

說：“蔣一再聲明親自北上，收復失地，而北上種種亦有相當布置，今被辭職還鄉，個人認為實不該准其辭、訖其走，今日上了他的當”云云。在討論東北事件時，吳又說：“東北事件非張學良釀成，系由於國內有賣國賊，此賊即在眼前。”粵委認為吳是指摘粵委中人，又因吳曾電張學良為蔣打“抱不平”，中有“外不見容於強盜倭寇，內不見容於賣國之賊”等語，故認為吳語言閃爍，用意奸險，顯然別有用心，因而羣起表示不滿。孫科于散会后，憤然乘車赴滬，隨即發表談話，說吳“含血噴人，蓄意中傷”，并表示如蔣、汪、胡不入京，“只有暫不問黨事。”

自蔣離京，汪、胡又裹足不前，孫科已成了南京唯一重心人物，且寧粵雙方早已協議由孫組“統一政府”。現孫拂袖而去，京方中委亦感不安，故即派于右任、何應欽、蔣作賓等人赴滬勸孫回京；一面又派人勸吳稚暉不要再隨便發言，一場意氣之爭，始告平息。

二十六日開第三次大會，決議要案：“（一）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案；（二）通過國民政府主席選舉標準，以年高德劭者選之。”

二十八日舉行末次大會，通過決議案如下：

“（一）推舉胡漢民、汪兆銘、蔣中正、于右任、叶楚傖、顧孟余、居正、孫科、陳果夫等九人為中執會常委，并以叶楚傖為秘書長。

（二）選任國府主席、委員及五院院長案，主席團對於國府人選，提出聲明兩點：（1）五院院長及所屬各部長、委員長不兼國委；（2）現任軍人不兼國委。眾無異議。

（三）選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

（四）選任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唐紹儀、張人傑、蕭佛成、鄧澤如、謝持、許崇智、王法勤、李烈鈞、鄒魯、邵元冲、陳果夫、叶楚傖、宋子文、王柏齡、方振武、熊克武、閻錫山、馮玉祥、趙戴文、王樹

翰、刘尚清、薛篤弼、柏文蔚、程潛、經亨頤、孔祥熙、恩克巴图、楊庶堪、馬福祥等三十三人为国府委員。

(五) 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銘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张繼为立法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試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

(六) 通过中央政治會議組織原則：(1)中央政治會議以中执监委組織之；(2)中政會議設常务委員三人，开会时輪流主席；(3)中央候补执监委得列席中政會議。

(七) 选举蔣中正、汪兆銘、胡汉民为中政會議常务委員。

(八) 关于国难會議、国民會議及国民代表大会等之組織及縮短訓政实行宪政各案，決議：(1)国难會議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內召集，討論御侮、救災、綏靖各事宜；(2)国民救国会會議之組織及召集，由中常会籌議办理；(3)应从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筹备召集国民代表机关，交中常会遵照建国大綱妥速議定办法。”

一中全会閉幕时，馮玉祥始到京，当天他着青布短棉袄进入会场，其朴素作风便引起了全場的注意。他在会上发表演說，說：“只有自己到总理陵前痛哭流涕，責罵自己对不起国家，痛自忏悔。党中先进同志，汪先生学識宏富，胡先生是总理信徒，玉祥自己是混賬。蔣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郑州同我結金兰时，有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結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盼同志用手用嘴将此三人拉在一起，到总理陵前认罪忏悔。”这种坦率的語言，为全会带来了新的气氛，引起了我对他的好感。

会后，第一次中常会決議：新任国府主席、委員及五院院长、副院长定于次年(一九三二年)元旦举行宣誓就职。接着，中政会决

議行政院各部人選如下：

內政李文范、外交陳友仁、軍政何應欽、財政黃漢梁署理、教育朱家驊、實業陳公博、交通陳銘樞、鐵道叶恭綽、司法行政羅文幹、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參謀總長朱培德、訓練總監李濟深、軍事參議院長唐生智、禁煙委員會委員長劉瑞恆。

所謂“統一合作”政府，至此始正式成立。

### 孫科政府種種

四屆一中全會推舉蔣、汪、胡為中政會議常委，又為中常會、國府委員，形式上表現了他們的“合作”，但蔣對於軍政大權，仍處於絕對支配地位。更由於蔣赴奉化，汪病上海，胡滯香港，他們三人之間，神既分離，貌又不合，以至孫科組織的號稱“合作政府”，實際是合而不作。茲將這一階段的情形，簡述如下。

孫科政府既組成，蔣、汪、胡仍天各一方，且互相牽制。時林森曾致電胡漢民說：“哲生為總理單傳之子，素為公所愛護者，今既然不避艱險，肯犧牲一切，公而忘私，我輩深嘉其志，尤表同情，似不忍袖手旁觀，任其焦頭爛額，而不加以援助。”以“焦頭爛額”來形容當時孫科的情景，確屬事實。其時，我曾致電蔣、汪、胡，其中有：“政府雖告成立，而我重要領袖，猶天各一方，未能薈萃，致使黨政最高機關，提挈無人，失其重心，一切安撫大計，何所秉承？”又有：“銘樞負調護使命，從斯即以不加入政府自誓，和平觀成之日，即役人卸責之時。嗣因我重要領袖謙訥不過，哲生同志受各方敦促，出膺艱鉅，以共同負擔相要，京方同志亦以此相督責”等語。表明我之參加政府，“乃臨時迫于牽率”，且已明知：“以個人利害言，不免徒作犧牲，以時論是非言，豈能盡求諒解。”故在單獨致



胡的信函中說：“銘樞為求領袖團結而來，非至團結果真絕望時，不敢言去，殆至力盡能竭，貢獻無路，然後奉此待罪之身以退，付諸國人論制。”

其時使我感到差強人意的，就是慨然南下的馮玉祥，與我的意見頗為接近。馮自參加一中全會閉幕會以後，旋即到滬晤汪。馮對人說：“此次南來目的，完全想團結同志，以謀抵制暴日，故望各領袖能在一塊負起救國責任。”又說：“若汪于最近期內痊可，當勸其速入京；對胡亦同樣希望，必要時擬到香港一行；對蔣亦望其能盡其責，共赴國難。”馮在此期間，對團結合作，極為努力。

在一片勸駕聲中，蔣、汪、胡仍無入京表示，孫科于一月八日晚中委談話會中說：“願回粵一行，促胡北來。”于右任等力阻，以孫負行政責任甚重，不能離開。孫說：“蔣短期離京，到奉化請蔣，到上海請汪。”各方仍多方劝阻。散會後，孫即同財政部長黃漢梁乘車赴滬。事為居正得知，立即趕到車站，時車已開動，居即囑站員搖鈴停車，旋登車劝阻。孫堅決表示：“本人定將胡、汪、蔣一齊拉到南京，以求達到真正團結之目的。”孫到滬後，即電胡速駕，又準備到奉化勸蔣，因未得蔣肯與接見的復電，故未便成行，乃改派何應欽、居正前往。此時的孫科真是旁皇失措，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一月十一日，我在中央黨部紀念周報告，先敘述近日奔走情形，並說：“看現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漸至山窮水盡，如革命重心不能建立，听其沉頓下去，即將無聲無臭地完了。我們必要挽回逆流，重新激起，否則便無法挽救。”其時我對蔣、汪、胡的袖手旁觀，已大感憤慨，故又說：“萬一三領袖不來，或遲遲其來，重心不立，政府不固，我們也不能等死。無論如何要撐起來向前拼命，為黨國爭人格，為民族爭生存，成敗利鈍，生死存亡，在所不計。如不

能复活民国十四、五年的革命激情，这个退潮，就挽不起了。大祸临头，迫不及待，大家要一齐振作起来，去求我们的生路。”当时我已意识到中政会之常委如再不来，只有重建政治重心，此为后来与馮玉祥、李宗仁等合作，組織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张本。

第二天，孙科同我便在沪約集了邹魯、李文范、陈友仁、馬超俊、馮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吳鉄城等人会商，决定蔣、汪、胡不能入京时，設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会談后即一同入京，召开第二次中常会，決議：

“（一）通过中央政治會議特务委员会組織大綱；（二）推于右任、张人傑、张繼、居正、孙科、陈銘枢、朱培德、何应欽、馮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顧孟余为中央政治會議特务委员会委員。”

特务委员会組織大綱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會議常务委員未实行責任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政务起見，于中央政治會議設特务委员会，負其責任。但关于重要方針，仍由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之。”其中“但书”是于、张（靜江）等人的意見。至此孙科政府虽有較能自由处理政务的可能，但仍有种种限制。

孙科向来是沒有肩膀的，他早年在广东时，就有人叫他是“阿斗官”（比于三国时刘备的阿斗）。在四届一中全会前夕，京方中委会商，討論接受粵方条件——以孙科繼任行政院长的問題时，担任南京市长的石瑛，就挺身出来反对；終因是粵方提出，仍得多数通过。石为同盟会會員、老留英学生，以剛劲不阿称于世，我素視為畏友。故会后我即前往拜訪，意在疏解。石見我时，声色俱厉地責备我說：“真如先生！行政院长由你来担任就好。孙科是总理不肖之子，其为人好色好貨，且不負責任，怎能担任非常时期的大事，这岂不是儿戏嗎？”我只好以“委曲求全，力謀團結，共赴国难”应之。

我又說：“孫是粵方提出來的，不答應不行。我本想新政府成立時，即擺脫政務，專任軍職，才合我保證人的地位，但孫堅要拉我參加政府，否則就不干，我為了貫徹初衷，故只得硬著頭皮同孫合作。”石聽完了我的話，喟然嘆了一口氣，默爾而已。

### 財政外交逼孫科下台

根據上述種種，孫科政府之難乎其難，早已在意料中。若果孫稍為有一點兒擔當，情況並不是不可改變的，最低限度也不會那樣短促，即告夭折。茲將當時最感棘手的財政、外交兩方的情況，分別概述如下。

當時的財政，正如孫科所說：“以言財政，幾年來債台高築，羅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萬萬，但除還債外，能用之款不及一萬萬。欲再發債則抵押已盡，且市面債券價格，不過二三成，即強發債，于事何補？最近財政、稅收，每月不過六百萬，而支出方面，只軍費一項，照前月財委會核減之數，每月仍須一千八百萬。”其時，廣東自扣留稅收後，舊扣未還，新稅仍繼續扣留；自東北失陷後，東北軍經費完全取之於華北，且每月不敷甚鉅；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漢關稅；山東韓復榘截用國稅；福建地方截用統稅，……稅收情況，極為混亂。

自朱子文下台時，黃漢梁派員接收國庫，未得分文現金，而宋還拖欠了銀行界一千萬。因蔣、宋事先各種布置，銀行界人物又多老奸巨滑，拒不與政府合作。黃本人為財政界後進，資望甚淺，唯一希望是新任財次林康侯為之策劃；但林本人並無特定銀行做背景，故亦孤軍無援。黃第一次到滬，曾想籌款一千萬，經多方設法，只得三百萬，照中央軍政費二千二百萬計算，僅夠四天開銷。加以各軍

代表四十多人，齊集軍政部索發欠餉。種種情勢，使孫科和我不能不採取新的措施。

當我們在上海討論設立特務委員會時，曾擬議提用公債基金，暫行停付內債本息。當日參加會議的人不多，除粵方中委外，另有馮玉祥、李濟深、李宗仁等人，京方僅我同吳鐵城兩人。不料上午剛有此動議，下午就有銀行界代表向孫科質詢，孫未作正面答復，隨即返京。第二天，上海銀行、錢業兩公會發出通電反對，北平、天津銀、錢業亦通電反對。同時，上海證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證券商人公然提出維持內債信用辦法三項：“（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債券抵押各稅之稅收機關；（二）對於現在經收稅收之中央銀行及保管內債基金委員會之負責人，責成負責遵守政府從前法令；（三）破壞公債信用及截留稅收之政府官員，社會上應嚴重反抗之。”這是上海商人对政府提出的哀的美敦書。事後得知，上海銀行界的消息有這樣靈通，是因有吳鐵城在替他們當坐探。

黃漢梁、林康侯均懼于上海商人的恫吓，當日提出辭呈，孫科也跟着不辭而跑到上海去了（孫象這樣不辭而去，先後共有幾次）。我聞訊，即乘飛機到滬找孫，見面後，我問：“你怎麼又走了呢？”他說：“上海銀行界不支持，財政無辦法，黃漢梁又辭職了，沒有人肯來當財政部長，我沒有辦法。”我說：“笑話！政權在我們手裡，操刀必割，你还怕商人不就范嗎？”他又說：“誰來當財政部長呢？”我說：“我早同你說過，我既被拉入了政府，你縱有任何苦難，我都願意替你承當！財政部長沒人當，就讓我來好了。”孫听了如釋重負地說：“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我們這席談話，仍然象上次會談一樣，消息象風一樣傳出去，真是“不脛而走”，立刻傳遍了全上海和全國重要城市，乃至港、澳地區。當天下午我就接到在香港作

腐公已久的梁士詒(交通系領袖)來電，大意是：“陳將軍！你是軍人，千萬不要在中國財政界開這一惡例（意思是軍人不能作財政部長）。”這種半是忠告、半是恫吓的電文，我並沒有理會。第二天早上，吳鐵城在他家中約集各方面的代表同我見面，到有：銀行界代表張嘉璈、錢業代表秦潤卿、市商會代表王曉籟、債券管理委員會代表李銘、持券人代表杜月笙、張嘯林及報界代表史量才等十餘人，都是當時上海租界的所謂“大亨”，也就是“地頭蛇”。我到後剛坐下，他們先向我表明態度，說話的內容，大体同梁士詒的電文相似。我說：“問題很簡單，這件事是起於你們，不是起於政府，政府為了維持國家政權，不能因為你們不合作而垮台。我們是革命政府，事情辦不通，只有採取非常手段來處理。如果你們願意同政府合作，我還有什麼話說呢？諸位想想：我是當財政部長的人嗎？解鈴還是系鈴人，現在政府是否收回成命，全在於你們。”這班人聽了我的話以後，紛紛起來表示：“願意同政府合作，並歡迎黃部長復職。”我答復說：“那就好辦。”

此後，張靜江又托張羣、吳鐵城同各方代表會商，最後決定每月由上海銀行界與證券交易所共同負擔九百萬，加上政府每月可收入的國稅（關稅、鹽稅）有七百萬，共有一千六百萬。照當時軍政費預算，雖然還是不夠，若再裁減一些軍政費，也儘可維持。

當時，立法院副院長覃振曾就此事對銀行界表示不滿。他說：“當宋子文任財政部長時，一年間發行公債三萬萬供軍費，當局不顧國庫損失，以半價抵銷，上海銀行界利用機會，重利盤剝，對政府視同愚主，數年獲利，已甚可觀。”又說：“中國資產階級，平時為政府承銷公債，重利盤剝，亂時為私利反對政府，將款存入外國銀行（時上海財團將現款存入外國銀行達二萬萬），真象猶太人，國可

亡，私利不可不爭。”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其次，关于外交方面：自东北事变后十日，南京学生請愿团因激于爱国热忱，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毆伤。王辞职后由施肇基繼任，时因施尚在国外，蔣即以顧維鈞署理外长，留施在日内瓦与国联交涉。当时政府的对外政策，簡言之，就是“不抵抗”三字，开始时就完全依賴国联，以为国联万能，可以主张公道，进而裁制日本，竟向国联提出：“日本不撤兵，决不直接交涉，”以示依賴国联之专。后顧又公然自动提請，将錦州划为“中立区”，置东北广大淪陷区于不顧。为了要叙述孙科政府的外交政策，故必須进一步将蔣、汪、胡三人的对日主张，加以概括的說明。

顧維鈞就任外长时，蔣介石曾亲书訓詞，大意为：“今日之对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非先求国内統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須先求国内之統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統一决不能求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統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这就是蔣后来的“攘外必先安內”与“安內重于攘外”的“理論”根据，也就是他后来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針。汪精卫在上海會議时常說：“余前曾反对南京政府，但是因民主政治而反对，非因外而反对（意为非对外問題而反蔣）。自他公开与蔣合流后，即高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与蔣的“三日亡国論”相呼应。在他破坏了十九路軍的淞沪抗战后，又亲自进行了許多投降外交，最后終於公开投日，落得个遺臭万年的下場。胡汉民的对日态度，虽貌似強硬，如他說：“应先确定堅定原則，即絕對不屈服于任何暴力”与“不能不有拼命之决心与准备。”后来他在香港曾发表过一些抗日言論，以及譴責蔣、汪的媚日政策，但都是隔岸观火的空談。他还有一套理論——三民主义之鏈鎖，即：“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反蔣不

能实现民权主义，非剿共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可见他们在对日问题上，表现上虽各有不同，而究其实际，则全属一致，即“对外不抵抗，对内不妥协”，集中到一点，就是决不放弃那面早为人民所唾弃的“反共”的黑旗。

孙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是孙科手中的一张王牌。陈在北伐前任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同英帝国主义办理过沙基惨案的外交。后北伐军攻下武汉，他在收回汉、蕲英租界的交涉中，由于有广大人民做后盾，北伐军的先声夺人，获得了外交上的胜利。据当时报纸记载，陈与英代办阿马利谈判时情景，说陈“胆壮气盛，使英人神为之摇”。可以看出，陈在外交手腕上的运用，确有其独到之处。由于我国近一百年的外交史，实际是辱国史，陈当时有此成就，时论推他为革命外交家，人们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陈于宁粤分裂前数月回国，曾携其新夫人张荔英（张静江之女）到上海、南京一行，意在探亲，旋即入粤，参加非常会议，并任粤府外交部长。后陈曾被派赴日，到东京后，日政府表示，南京抗议已到，故未便正式接待。陈与日外相币原私人接触，已感觉日对华已有决心，不愿与中国谈问题，故匆匆回国。当“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陈致电币原说：“前游日本时，在东京面谈，执事谓满、蒙为中国领土，日本当尊重中华领土之主权。今突然派兵占领东三省，此种举动，是否与执事前言相矛盾。”后南京吴稚晖之流，曾借此攻讦粤方，说陈之赴日是出卖东北；后又把陈所坚持的对日政策，说成是陈有意洗刷个人名誉，这是怪诞不经之谈。查币原本日政府的“文治派”，其对华政策虽同以侵略为目的，但在具体措施上与军阀是有出入的。当日军占领东北时，币原曾说：“日本吞并东北，等于吞了一枚炸弹。”后币原为日本军人毒死。

在陈友仁就任孙科政府的外交部长前夕，曾发表談話說：“錦州事件在今日以前，尙为过渡政府之責，本人不負任何責任，必自明日起，方为新政府責任。但本所知可得言者，过渡政府对錦州曾迭令张学良坚守，昨日仍有电令张，無論如何牺牲，必須坚守。新政府成立，亦必須繼續令张坚守。”陈正式就任外长职后，即发表宣言，仍重申政府决令张学良坚守錦州。后因日軍节节进逼，錦州失守，张学良軍全部撤入关内；益以日本发动其侨居上海的浪人，烧毁代表我国民族工业的三友实业社，直接威胁东南沿海各地。于是陈友仁建議政府采取对日絕交方針。此一方針提出时，蔣、汪已在杭州会談，后即相繼入京。

一月二十四日，南京召开中政會議特务委员会，蔣、汪同时出席，討論对日問題，其他各委均未发表任何意見。惟蔣、汪二人发言最多，論調完全一致，都認為：“已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計打算。”并說：“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之一擲。”繼又表示：“决将以忍辱負重、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此种論調与曾國藩、李鴻章当时之言論相同，因他們都是勇于私斗，怯于对外的“异代同工”。

同日，陈以他的外交方針未被采納，故即憤然辞职，与孙科一同赴沪。陈至沪即发表声明說：“过去蔣介石对东三省事件，原是一貫主张其消极不抵抗政策之故，以致錦州失陷，而中国軍隊且全部撤退于关内，外交問題至是乃愈陷于困难。……余經两星期之考虑，以为贯彻和会所决定之政策，則对日絕交之事，实为必要而不可避免之方法。惟此外交政策，为蔣历来所反对，其最近发表对日問題之講演，以对日絕交为中国之絕路，其論断之坚决，且无磋商之余地，使余对外方針之进行，受严重之打击。余敢警告国人，蔣



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对于全国人民为日人暴行引起之抗日救国运动，加以武力之压迫。蒋氏至今实力犹存，而其反对余之外交主张，又若是其坚决，此余所以不能不辞职以谢国人也。”同时，孙科亦向国府辞职，其致蒋、汪电中有：“溯自受事至今，已将一月，而最关重要之外交方针，迄未能有所决定。该部长陈友仁亦以贡献之对日政策，未蒙中央诸同志采纳，今已提出辞职，虽科再三挽留，而去志弥坚，未可相强”等语。

孙辞职后，所谓“统一合作”政府，即宣告垮台。

### 烟霞洞会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在杭州西湖风景幽美的烟霞洞举行会议。蒋、汪合作，孙科政府的垮台，以及此后蒋、汪在内政、外交上的种种措施，均以此次会议为起点。其中内幕，我虽然微有所闻（如蒋在此发表“三日亡国论”），但其究竟，惜未亲自参加，故难臆测。兹将所搜集的当时报刊记载，加上个人回忆和最近朋友们补充的材料，略加整理，简述如下。

一月十二日，孙科同我在上海会商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之次日，蒋就由奉化到了杭州。十五日我得蒋电召，即同范其务（前广东财政厅，后任十九路军上海办事处处长）由京飞杭。其时到杭州的人甚多，有顾祝同、贺耀组多人。我见蒋后，将京中情况向他报告，并说明特委会之设，仅在中政会三常委不到京的情况下，便于迅速处理政务。我记得很清楚，蒋对我的谈话，并没有不同意见的表示。当夜十时，我同张羣乘火车返沪。车抵笕桥，蒋来电令折回，即下火车改乘蒋派来的汽车回杭，重到澄庐晤蒋，他书亲笔函一封，交我携沪转汪。十六日晨至沪，即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我

隨即回了南京。

汪得蔣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行前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和我，說他已应蔣邀赴杭，当晚蔣、汪晤面。次日蔣、汪合电致孙科，說他們將候胡来后，即联袂入京，并要孙电胡速駕。同时，蔣汪又合电致胡，請他北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諸同志。”十七日胡复汪电，除称病謂“非长期休养不可”外，并謂：“只須中央行責任內閣之职权，必能发展开一新局。”

十七日，张繼、张靜江由京乘汽車赴杭，当晚与蔣、宋(子文)密談。次日上午，蔣派毛邦初亲駕蔣自备飞机到京，直入国民政府找孙科，說蔣、汪有要事相商，須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欽、吳鉄城同去(事后我始知悉)，当日下午一时許抵杭，即赴烟霞洞。其时正为张繼、张靜江宴在杭各中委，蔣、汪均在座。宴毕即在別室密談，参加者有蔣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繼、张靜江五人。此即后来所謂的“烟霞洞會議”。

會議內容，秘而不宣。会后記者問孙科會談結果，孙答：“圓滿，圓滿。”又問：“何時回京？”，孙答：“就去。”孙在杭呆了两天，二十日同汪一起由沪入京，二十一日蔣直接由杭入京。此时蔣、汪分別发表談話，論調完全一致，一拍一合，儼似表演双簧(最近賀貴严委員提供一段当时的秘聞：汪先曾派其妻陈璧君出面同蔣密談，提出蔣、汪的上台，应出于互相推重，以坚蔣之信任，汪曾表示：“誓不一人单独入京”)。原来蔣、汪之間，在此以前已在暗中勾搭。

自蔣、汪先后入京，二十二日在京中委齐集励志社会談，开始时由何应欽报告关于接到朱紹良、熊式輝电报前方“剿赤”軍事及軍实問題，次由吳鉄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次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状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鐘后，蔣起立发

言，說：“关于对日問題，無論和与战两办法，惟須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甌不能有一点缺損，否則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計劃。”二十三日蔣、汪、孙等在宋子文家密談，达三小时，聞对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絕交方針，反对者居多。二十四日开特务委员会，蔣、汪二人发言最多，其余中委未发表任何意見，会上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針。当日陈提出辞呈，与孙科一同赴沪，旋孙亦辞职。以后中执会、中常会均有电致孙，請打銷辞意，并派居正、张繼、张靜江赴沪挽留。后又派何应欽、吳鉄城前往，以孙行踪秘密，終日寻找不获。

二十七日中政會議开会，到会委員六十人，汪精卫主席，決議要案：

“（一）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會議常务委員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

（二）成立外交委员会，选出委員人选，蔣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員，顧孟余、顧維鈞、王正廷、罗文幹为常务委員。”

二十八日开中常会，对陈友仁在上海所发表的談話，以其忘却黨員立場，外长非責任內閣比，外部以上尚有中政会决定方針，不能以政策不行而走；以黨員論，为干犯党紀，以国民論，为丧心病狂，决交监察委员会惩戒。

同日，又开中常会，蔣中正主席，決議：

“（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銘为行政院长；

（二）立法院长张繼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

就在当天晚上开会后的数小时以后，卫戍京沪的十九路軍，在全体人民的推动下，在淞沪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于北京

## “非常會議”前後

周一志

一九二八年八月末，胡漢民從歐洲回國，接着就到上海、南京，倡議試行五院制；十月，把蔣介石捧上了國民政府主席之職。時人譏胡為叔孫通。因為根據孫中山先生手訂的建國大綱，那時就行五院制，是頗為牽強的。南京國民政府真正控制的地方，只是長江下游幾省，不過中國領土的三分之一左右。事實上仍處在軍政時期，硬說是訓政，又來一套憲政的制度，這是胡別有用心的作法。胡之一定要去捧蔣，是為了抵制他的政敵汪精衛，同時也抱著一種政治上的幻想。胡當時幾乎見人就稱贊土耳其總統凱末爾的作風，因為凱末爾在帶兵打敗了希臘以後，經常住在風景地區，醇酒婦人，把國家大政交給一只眼的伊斯默。胡很想蔣也學凱末爾榜樣，帶新妻宋美齡到各地閑游；胡則以伊斯默自居。胡的老友鄧澤如早就看透蔣的流氓根性，胡入寧將來必無好結果。在胡過香港時，鄧以竹籠內裝小黃雀相贈，象征日後胡的下場也會如此。我們在滬辦《再造》的一批朋友，也聯名寫信向胡進言，還是做在野派領袖為好。胡對我們說的話，概不入耳。

胡在寧做立法院長時期，真是幫了蔣的大忙。一九二九年三

月，蔣打敗了武漢的桂系軍隊，把在北方的白崇禧趕回廣西。尤其是將李濟深從廣東騙到南京扣留，這和胡及其密友古應芬大有關係。當時南京開國民黨三全大會，蔣同意對汪精衛予以書面警告，並將顧孟余開除黨籍三年，陳公博、甘乃光永遠開除黨籍（理由是汪等對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張發奎、黃琪翔的廣州事變有責任）。胡竟以為如此就可永絕蔣汪之間的勾搭。李濟深本為捆胡派，胡為自己地位，對李也就不惜犧牲了。蔣同意絕汪，胡幫蔣打桂扣李，等於交換條件。此後，胡又幫蔣打敗了馮玉祥，消滅了河南的唐生智部隊，又打垮了閻錫山、馮玉祥等的聯軍，使北京的改組派同西山會議派合流的擴大會議倒台。當時如無胡在寧替蔣撐腰，蔣一個人是無法在軍事上政治上那樣得心應手的。蔣之獨裁地位，胡是一個主要的幫凶。

⑤ 蔣對閻馮的中原大戰，因東北張學良出兵平津獲得勝利後，蔣志得意滿，決定召集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那就表明蔣想當五院之上的總統了（根據建國大綱“由總統任命五院院長而統率之”那一條）。胡對蔣這一企圖却不同意，見人就大發牢騷（見王昆崙時，胡自比只是一架開會機器）。在兩年多時間中，胡同CC和宋子文都發生了惡感。政學系的楊永泰，那時已參與蔣的機要，因前曾求一立法委員不得（蔣向胡推薦楊，胡不接納，理由是楊當初罵過中山先生）<sup>①</sup>，十分恨胡。捧蔣做總統，楊是主謀。蔣看透

① 楊永泰當初捧回桂系岑春煊、陸榮廷等，作過廣東省長。楊對孫中山先生開口閉口罵為孫大炮。胡漢民不給他作立法委員，特制定“立法委員任用標準”，中有一條是曾反對國民黨或中山先生者不得入選，用以拒絕蔣的推薦。後來汪精衛看到楊任蔣的秘書長成了紅人，寫信給楊，竟稱“暢公賜鑒”（楊字暢卿），簡直是“妓女”式的政客，無怪其終于作漢奸了。

胡反对他做大权独揽的总统，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夜，借故和胡闹翻，当即扣留，第二天把他软禁于汤山。

## 二

在此，应该先把非常会议中心分子古应芬说明一下。古是同盟会会员，同汪、胡资格相同。他在广东一向同胡汉民的兄弟们包揽税捐，是个师爷式人物。李济深主粤时，曾把古的部下包税捐的贪污分子惩治了几个，古因此大为恨李（广东人称古为烂大鼓，因“古”“鼓”同音）。李的部下大将陈济棠（我们背后称他为瘟猪），是古一手扶植的，其情形同张静江扶植蒋介石起来一样。古曾在上海会同所谓国民党四元老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把李骗到南京扣留（古在沪对李下泪），事先蒋默许古任粤省主席。后来蒋食言，叫陈铭枢去做（粤主席是有名的肥缺），古大失所望。古在宁任职国府文官长，是一个闲职。初时，古曾写信给友人，有“以事总理（指中山）者事介公”的话，真是肉麻。在扣胡的三四个星期前，孙科在政府会议上因黄埔开港案骂古以文官长地位舞弊，古一气而出京赴沪。次日，孙派梁寒操赴沪代孙向古道歉（我当时住梁家），古又从沪转赴广州了。此事可能有更深的内幕，我所知道的表面上是如此。

胡被囚消息传到广州，陈铭枢也曾慷慨激昂，大骂蒋不对，颇有跃跃欲试之概。古应芬暗中只同陈济棠商议反蒋，对陈铭枢冷淡。理由是他们深知陈铭枢为人，善于投机取巧，怕他中途出卖，对他实在不能放心。陈从一九二七年后，早就从第四军方面变为拥蒋派，成了蒋系重要分子了。他的军队在打桂、打张、打阎、冯诸战役中，都为蒋出力不小。陈的表现，可说是一个军人政客，野心

頗大。在他周圍，吸收各種人，被人稱為“萬流所宗”。陳銘樞看到古應芬、陳濟棠如此態度，他自知力量沒有陳濟棠的大，在將來反蔣政府中，實力派地位坐不上第一把交椅，於是離粵赴港出國，乘機觀變。

### 三

胡被扣後，孫科即派鐵道部醫官廣東人鄧某替胡看病（血壓突高）。鄧奉孫命秘密詢胡應怎樣辦，胡拜托孫科及王寵惠一定要在兩廣建立反蔣局面救他，甚至不惜與汪派合作。蔣發覺各方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變化，大請立法委員吃飯，疏通感情。蔣又極力拉攏孫科。有一天，請孫去吃飯。宋美齡十分殷勤，替孫不斷地搵菜，並說：“我們是自己人（以親戚口吻），他（指蔣）老了，以後一切，一定要哲生（孫科字）多多幫忙，不可見外”云云，孫不為所動。大約是扣胡後的第四五天，馬超俊、梁寒操、王昆仑、鍾天心、陳劍如、麥朝樞及我共七人奉孫命秘密計議。由馬出面，代孫寫了幾封密函，決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鍾天心回廣州，麥朝樞同我去沈陽見吳鐵城，叫他準備拉張學良反蔣。並且叫我同麥路過天津時會見擴大會議失敗後在津閑住的鄒魯、覃振、傅汝霖等人，告以反蔣時機又到，請他們務必轉達汪派人士，不必再罵胡，以便大家一同反蔣。

中外聞名，以最滑頭、最沒有骨氣著稱的老官僚王寵惠也因胡案而力辭司法院長之職，不再在寧鬼混，去海牙做國際法官。王離京時，蔣特赴車站親送。不久，孫科到上海，派梁寒操赴香港與汪接洽，汪正在無出路中，當然一拍即合，以孫親來一同到廣州下海為條件。蔣看到孫有反蔣活動，又派所謂四元老（蔡在蔣扣李濟深後，大為後悔，此時我推測他是被另外三個老头生拉活扯才勉強跟

着走的)拉孙回宁一行,力說可以从长商量释胡等鬼話。

由于四个老头的力劝,对孙花言巧語地說了許多有感情的話,孙本人有些动摇,有答应回宁一行看蔣是否真有释胡之意。我們一批朋友,加上孙太太,都从旁着急,怕孙上当。最有关键的一天,孙在事先通过麦朝枢約定邓演达在夜間到孙宅秘談。邓聞知孙有去宁一行之意,想不去孙宅了。麦先赴孙宅看动静,住在孙宅的余銘、簡又文力促麦把邓拉去見孙,希望邓对孙最后进言,千万不可上当。因此麦拉邓赴約,他們一見面,邓就力劝孙不可上蔣的圈套。談話間陈友仁也到,同样主张坚决反蔣。这时四个老头又来了,邓、陈、麦等乃上楼,楼下客厅託孙接待四个老头。老头們从九点鐘对孙糾纏到十二点,仍想拉孙入京一行。此时簡又文忽然出了一个主意,請孙太太在楼上装病(她身体也真有些不适),从床上滚到地板上,卜通的声音,楼下客厅也听得到。簡即刻下楼对孙报告太太病得厉害,已从床上滚下地了。孙乃借口太太病重实在不能入京,表示送客态度。四老头于是只得离开孙宅,也感到事情办不成了。老头們走后,孙同邓、陈又談了些时,打消了赴宁之意。那几天我們兴高采烈,因为老头們碰了一鼻子灰。孙一跃而为时局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价,完全是扣胡之后形势造成的。孙五月下旬离沪赴港轉粵,不但自己反蔣,又叫听他話的张惠长带走南京航空处的飞机多架,飞往广州,参加非常會議。蔣当时十分恨孙,但对鐵道部长一职,始終叫孙的亲信次长連声海代理,并不开缺,对孙还留一綫余地。表面上,蔣又叫何应欽在粵府成立后,通电大罵孙,要算鐵道部的貪污賬(后来何对人說該电是蔣代发的)。这些地方,可見蔣的阴狠处。



#### 四

这年四月底，粤方即由国民党四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非法扣胡案为主要理由，公开弹劾蒋介石，并指出他种种独裁的事实。此电是第一炮，接着由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锣鼓一响，汪精卫、孙科从香港一同到广州。五月二十七日，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开张，同时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同宁方对立起来。非常会议开张后，声势的确不小。因为除胡本人以外，国民党汪派、胡派、孙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南北军人，都有代表在广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本同陈济棠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一变而为好友，李、白亲来参加，可谓集全国几年来文武老少的反蒋分子于一堂了。照陈济棠事先的想法，只想开府，不把门开得太大，但由于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等人极力坚持必须广揽一切反蒋派，古应芬、陈济棠对此只得依从。党的方面，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意来反蒋，一律是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国民政府下暂设外交、财政两部，由陈友仁、邓召蔭分任部长。此外设一政务委员会，采委员制，古应芬负实际责任。全国舆论，对扣胡事都不以蒋为然，非常会议的政治攻势很猛，宁方气象立于不利的地位。

非常会议真正主人古应芬、陈济棠对汪精卫本人态度还好，可是对改组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仍算旧账，持一种排拒的态度。如不是孙科、李宗仁、覃振等力劝汪忍耐，以团结为重，汪已有一两次发脾气要走了。我们几个朋友，认为非常会议既以“精诚团结”各方面同志为最大号召，就不应该排斥汪派。王昆仑在他主编的《中

央导报》上，有《招我們的流亡弟兄們》一文，大家認為写得文情俱茂。因此，陈济棠頗不滿意我們，企图撤消我們在非常會議中的职务，分別給資出洋讀書。后因古、陈怕孙科发脾气，加以广州的元老邓泽如也力持反对，此事才作罢。蔣看破粵方内幕，乃派朱子文暗中拉汪說：“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們南京要汪先生是連骨帶皮一起要。”此話对汪派的煽动性很大。顧孟余也說：“我們与其受地方小軍閥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軍閥。”此时蔣、汪再度合作的暗流已經存在，只看日后在什么时机，什么条件下实现而已。（汪以粵方代表身份到上海后，就接受朱子文的錢，乃是公开秘密。）

在軍事上，粵方也积极筹划武力討蔣，內定唐生智为前敌总司令。宁方局面，的确有些动荡不安，北方閥、馮势力犹存，蔣的大部兵力，用于江西与紅軍作战，不惟不得手，且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蔣真到了寢食不安的日子。当时，我同陈剑如（此人在我三年前离港时，知道他在港替蔣帮做不利于我們祖国的特务工作）在上海，受非常會議之命，拉攏反蔣人士。我們曾同邓演达見面，并轉手交邓一笔錢，为策动黃埔軍人之用。（邓不久即被捕，邓說陈誠是拥护他主张的，不过大家看到后来蔣那样重用陈誠，有人怀疑邓被陈所出卖。）吳鐵城看到非常會議气势很好，又不滿蔣沒有給他做大官，暗中同我們不时接头，答应秘密就广东派他的国府委員职，俟軍事行动一起，他就以非常會議代表身份再去东北，拉张学良加入倒蔣。我記得有一天，吳同陈剑如及我見面，他突然郑重表示，取消他所答应的預定計劃。他說，陈銘枢已从日本秘密到京，同蔣秘議多次，两广出兵計劃将遭到很大困难。吳并叫我們密电广州重新考虑，不要自招失敗云云。陈銘枢回国动机，是以十九路軍为其

資本，幫蔣對付非常會議，無怪乎蔣當時要同他結拜為弟兄了。七月二十三日，宋子文在上海車站被刺，宋逃脫，其秘書唐腴生身死。<sup>①</sup>陳劍如同我乃搭日本貨船離滬去廣州。

## 五

不久，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中外震動，政治局面起了根本變化。大家都知道不容許寧粵長期對峙，更不容打內戰了。陳銘樞立即以雙方調人姿態出現，從幫蔣一變而為寧粵間的“調人”（兩面派），他拉出蔡元培、張繼兩人做他的陪襯，以寧方代表身份到廣州謀求和平。他對蔣說些什麼私話，大家不知道，他到廣州在非常會議主要人士的集會上（在退思園），表現出痛哭流涕，十分沉痛的樣子，暗示十九路軍到達京滬以後，同志們如果要他如何對付蔣，他一定忠於老同志們的立場，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在場所有的人都笑他眼淚是假的，沒有一個人相信他的話。不過當時局面，也的確需要有人從中周旋，打開僵局，他首先抓住這個時機，大耍其縱橫捭闔的手段。粵方人們，一致認為駐十九路軍拱衛京滬，總比蔣軍在那里好，蔣也只得答應粵方的要求。後來使蔣光鼐、蔡廷鍇以及十九路全體將士，能夠替中華民族爭一口氣，不管蔣介石暗中的阻撓（可能還有陳銘樞），不顧一切，進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日之戰，造成了這樣一件大大好事。

在上海舉行和會以前，蔣早允下野，胡漢民已被釋到滬，古應芬、陳濟棠替胡報仇的目的已達到了。因此古、陳對和談的態度頗

---

① 後來據我所知，刺宋案是古應芬直接秘密派人到上海下手的。宋是蔣方要角，殺死他可使蔣方政治上受打擊。此外，古已知汪精衛與宋暗中勾結，想拆非常會議的台，刺宋也等於對汪的一種側面嚴重警告。

为冷淡，汪精卫最热心，孙科态度倾向于汪。非常会议推出汪精卫、孙科、邹鲁、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为代表到上海去开和会。古应芬摆出一付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广州后不再回来的神气。十月十八日，上述的六位粤方代表以及宁方代表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已先回，叫蒋先履行释放胡汉民到沪的条件，顾孟余与陈同船北上，代汪同宋子文进一步勾结），加上覃振、张发奎、唐生智、陈璧君、陈公博、黄绍竑、赵丕廉以及各派系上中层分子，文武老少不下二百人，都搭了美国大来公司的麦地臣总统号邮船，由香港浩浩荡荡前往上海。在海上遇到三四级台风，船行误了十几小时。我们后来开玩笑，假定这条船沉没，把这辈牛鬼蛇神一起淹死，中国以后局面必定更太平些。

## 六

在我们将要北上的前夕，王昆仑、钟天心同我一起去汪宅。到时汪同覃振、傅汝霖（他们经过扩大会议的集合感情很好）正在密谈，我们本想就走，但汪、覃不让我们走，叫参加他们谈话。覃振力劝汪到沪后同胡恢复友好，我们乘机更天真地极力向汪进言，希望文人大团结，以后只能让蒋主军，党政方面，必须汪、胡、孙三人合作才能不许蒋独裁。汪口头上说得很好，他说蒋下野后，国府主席应请蔡元培来做。蔡在李济深入京被囚后，颇悔做了帮凶。三全代会胡主持处分汪等党籍时，蔡不赞成。有进步思想的杨铨（后被暗杀）在蔡旁边，对蔡起了些好作用。

粤方代表到沪之初，汪、胡见面表面上颇融洽。覃振同我们年轻人一起，卖尽了气力，对汪说汪、胡、孙合作，对胡说胡、汪、孙合作。不久以后，幼稚的我们，也觉悟这是一场幻想。胡心胸特别褊窄，睚

眦必报，一心想报湯山之仇；見人就罵蔣是流氓，拿广东土話說蔣是“訛”（騙人之意）、“吓”（威胁之意）、“拆”（分化之意）的能手，大家不可再上当。汪十分虛偽，見胡時扮演小兄弟，听胡滔滔不絕地大发議論。上海开和平會議時，胡成为粵方主要后台，內心里想回兩广，并不想共赴國難。因为汪、胡兩人都是粵方立場，他們都能說會写，又抓住大道理，和会上所有提案几乎都出自他們之手。宁方的几个老头，不是汪、胡的对手，所以也不提案，宁方好象处在被告地位的样子。因粵方的要求，蔣又把李濟深、居正、方振武等人从南京放出上海，恢复自由。平情而論，蔣、汪、胡三人，同样是中山先生及廖仲愷先生死后使国民党变质，成为革命对象的罪人，胡当时硬說他个人罪过較少，是主观而不公道的。

蔣方叫吳稚暉出来无理取鬧，不断地冷嘲热罵攻击粵方，蔣系軍人紛紛通电拥护中央，明枪暗箭，吵鬧不休。此时中国南北民众，一致起来要求抗日，取消党治。汪精卫在伍朝枢宅接見民众团体代表刘湛恩等，对沈鈞儒先生大发脾气，表現感情冲动，毫无理智，以蛮橫的态度不承認国民党禍国之罪，反說“你們有本事就出来打倒我們好了”，可謂大大失态。当时确因日本侵略，双方不得不坐下来勉強和談。蔣、汪、胡見面時都說假話，开会時等于上台唱戏，背后各有一套不可告人的自私的打算。后来我看到魯迅全集，才发觉魯迅当时用各种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談”上，不断有小品文或短詩，諷刺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丑态，看了十分痛快。比方魯迅在《二心集》中《沈萍的泛起》一文中說：“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做‘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沈萍，新的沈萍，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轉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

真的,当时政治上不少已經沒落的人,又开始出头露面了①。

## 七

非常會議在七月間就決定在十月間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便同南京的蔣黨正式分家,籌備工作很積極②。南京方面,也不甘落后,決定召開他們的四全大會。九一八事變一起,雙方雖進行和議,但籌備開代表大會一事,並未中斷。上海和平會議席上,除了政治制度吵鬧不休以外,對於黨務問題,总算得了一種妥協方案,決定雙方仍在十一月間各開四全大會(一個黨而分兩處開會,可謂滑稽)。政治改革案遵照上海和會所定的原則,最重要的是新中央委員產生問題,商定一二三屆委員除中共委員外,一律可在四屆被選,雙方再各加同等人數的新的候選中委,分別選出,互相承認,再合起來一同到京開一中全會。

十一月初,上海和會推孫科、李文范、陳友仁三代表回粵報告,同時參加粵方的四全大會。汪精衛不肯回粵,胡漢民想去,但時機尚未成熟。粵方大會將開幕時,古應芬突然因拔牙中毒而死,胡在兩廣的地位更重要了。大會一開,鄧澤如、蕭佛成出面(陳濟棠躲在後面)提案,在政治上及黨務上不受淪原則限制,竟想推翻一切成

---

① 比方甘乃光,前時在廣州張、黃之變時在某機關抓走了十萬元左右的錢,被人指為貪污。事後甘一向在上海某畫報社做編輯。非常會議中,甘不敢到廣州,此時趁國難嚴重,又出頭了。

② 當時廣州到了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物,都說反蔣,對革命如何有功,非當四全大會代表不可。他們說:“我們本不要來,都是王昆侖招我們來的(指《招我們流亡的弟兄們》一文)。”非常會議組織委員會主任秘書吳求哲同我(任非常會議秘書職)幾乎天天被這些好漢們糾纏不清,有一次還幾乎被打。大家說笑,王昆侖害人不淺。

議，目的仍想分家，繼續割據兩廣。汪派代表首先全部退席。孫科看到這樣不識大体，太不成話，他退席，也叫我們退席，他赴港轉澳門省親。李文范是胡派的人，也隨孫退席（不知道是真的生氣，還是假裝的，我們莫測高深）。這樣一來，上海方面乃推胡漢民回粵調解廣州的糾紛。鄧、蕭等看到實在不能硬干，只得收回先前提案。於是孫科、陳友仁、李文范等又出席大會。這一風波鬧了一星期左右。

汪派代表約一百五六十人，到港後奉汪命不再回廣州，全體赴滬。他們竟在上海下流游藝場“大世界”補選汪派中委，又是一幕大滑稽戲。因“大世界”中委問題，又一度成為和談的僵局。最後還是大家分贓解決，承認“大世界”中委，由寧粵雙方各將已落選者增補幾人為中委，以資平衡。這些中委，被稱為“恩科中委”。寧方于右任部下王陸一，是“恩科中委”<sup>\*</sup>之一，他後來到滬每過“大世界”時，必脫帽致敬，表示感謝之忱，時人傳為笑談。

## 八

汪精衛到上海後，常對人表示他們改組派人多，都想一官半取。汪願當行政院長兼一個部，用意是露骨地想當行政院長。陳公博也幾次對我們說，最好叫汪做行政院長，好維持大家反蔣的團結。顧孟余是陰謀家，叫汪不宜在反蔣的局面下上台，不如稍候時機，在蔣、汪合作的形勢下上台。胡對汪無誠意，不願汪抓權，

---

<sup>\*</sup> 編者註：王陸一曾任監察院荐任秘書而受簡任待遇，自稱“簡任秘書”；他在寧方落選委員中補上，頗出意外，因撰一聯云：“豈有秘書稱簡任，居然中委出恩科”。

乃由粵方提孫科為行政院長。<sup>①</sup>

上海和會已決定以後國府主席是不負政治責任的，行政院等於內閣制國家的內閣。汪至此就聽了顧孟余的話，以糖尿病為名，避居醫院，暗中同宋子文一起拆孫內閣的台了。孫的周圍，有些想做官的人，當然希望孫上台。我們在孫旁邊，本是搖旗吶喊的嘍囉，也曾事先大膽向孫進言，行政院最好還是訕汪。孫表示十分為難，說是因為沒有人才答應的。實際上，孫在當時成了蔣、汪、胡之間夾縫中的一個被玩弄者了。

蔣介石在確定孫內閣前，即辭去國府主席職，由林森繼任。<sup>②</sup>一直等到孫入京就職，蔣才先殺了鄧演達，正式下野離京，回轉奉化。<sup>③</sup>

孫內閣中，外交部長陳友仁，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干，財政部長黃漢梁是孫自己提的。內政部長李文范，鐵道部長葉恭綽是胡推荐

---

① 後來蔣、汪合作，胡在香港又說都怪孫要做行政院長，才逼汪如此的。胡在胡、孫、伍三人當初出洋時，他以肯定的語氣說，中國完全是“人”的問題。等到他將入京做立法院長時，又對人說，中國完全是“法”的問題了。他自己可以不顧前言後語的矛盾，我們卻記得很清楚。

② 國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擔任，此四個字是梁寒操想出來的。蔣本屬意於于右任做主席，大家覺得林森更符合四字的條件，於是于右任的目的沒有達到，聽說氣得哭了一場。汪到滬後，看到蔣及胡都不會贊成蔡元培，也就不敢提蔡了。

③ 蔣離京前，也發請帖請我們吃飯，表示拉攏。事先我們也沒有想到不去。當天在蕭同茲及左恭家里談天，到吃飯時忽然有一位朋友說，我們既然反蔣罵蔣幾年，現在他賞飯，何必去領情呢？於是大家也不通知，就都不去了。可能蔣因此而更恨我們。後來在重慶國民黨六全大會（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上，王雲五在軍事質詢中，提出方先覺問題（方在衡陽被日軍俘虜，竟放回重慶，自然有誘和的內幕），陳立夫特去告蔣，蔣立即出席，借題發揮，罵王一場，張治中等人都看不過去。



的，此外有刘芦隐的考试院副院长、陈羣的内政次长兼首都警察厅长、桂崇基的中央大学校长等人都是胡派。宋子文在交代前，把财政部重要档案，统统拿走，部内科长以上人员发薪三月，暂时离职，来一个大拆台。那时空气，谁也不敢做财政部长。孙在无奈中，提出他的留美同学、荷兰背景的海和丰银行买办黄汉梁为财政部长，许多人不知道黄是什么人。一个空财部，还欠了一屁股账，何应钦们又天天向孙逼领军费，黄汉梁在银行界没有地位，真是一筹莫展。汪在医院有一天发表谈话，内容对孙内阁不利，银行界借口汪都那样说，更不愿垫款了。孙为此大发脾气，特出京到沪想找汪质问，汪避不见面。我们一批朋友，当时虽也各人有心里的打算，但看到孙如此处境，真可谓“焦头烂额”，谁也顾不得想做官了。为时只一个月的孙内阁，我们忽而随孙入京，忽而赴沪，不下三四次。孙的脸色十分难看，脾气之大，超过任何时期，可算活受罪。

当时馮玉祥、李宗仁、覃振等人，在上海都大骂宋子文及银行界，主张采取非常手段，把关税盐税统税的拨付公债基金部分，由政府决议收回，公债停付本息。如此政府可过好日子，而银行界十之八九必关门，因为他们吃饱了公债，这一来不啻是致命伤。这个空气浓厚起来，有一天，张嘉璈代表银行界同孙谈话，表示愿意支持政府了。那天下午五时左右，孙把鍾天心找去，交鍾一个谈话稿，囑守秘密，叫他到夜间九时以后，送国闻通讯社发表。此谈话是孙以行政院长地位表示辟谣，政府当维持债信，无意对公债停付本息云云。第二天，公债由跌价而大涨，听说张嘉璈、黄汉梁等人都趁机捞一把。

## 九

蒋介石看到孙内阁在财政上有了办法，同时不放心陈友仁的

外交<sup>①</sup>，又来了新阴谋。蔣竟叫人組織一羣流氓，声称要去燒南京的日本使館，以便引起外交上新問題，逼孫下台。在南京下關的日本兵艦，已將炮口正對首都了。此事真把孫氣極了，又連夜赴滬。只過了一兩天，蔣從奉化，汪從上海，突然相會於杭州<sup>②</sup>，實現蔣、汪合作了。他們雖也請孫去，也假裝電請在港的胡漢民，全是表面文章。

孫知非下台詎汪做行政院長不可，由陳友仁提出對日絕交案，也明知是通不過的。稍有國際常識者，知道絕交以後，同宣戰的距離很近，這件事在當時中日情勢下太嚴重了。但孫內閣在下台之際，也樂得唱高調。吳老狗多次罵陳友仁勾結日本，都是血口噴人之談。陳友仁一向被人目為左派外交家，在大革命時，在武漢簽定收回漢口及九江英租界，就是他主持的。他腦子裡，不忘三大政策，不失為一個有風骨的人。

---

① 當時有一段對日外交秘密。寧粵和談時，日本已是犬養毅做首相了。犬養毅也同市原一樣，想維持政党内閣，派國民黨老友萱野長知秘密到上海，通過居正關係，向蔣、汪、胡、孫各方接洽，企圖解決東北問題。犬養方案大體上是承認中國在東北仍有宗主權，但不再駐軍，只設保安隊（居正竟跃跃欲試，想談成後去做保安司令），並解決中日間許多懸案。日本少壯軍人同政黨人士對於侵略中國的方式及步驟，是有些不同的。這一內幕，我是從居正的親信者口中知道的，據說汪及居正認為犬養案可以考慮，蔣及孫科、陳友仁不贊成。後來萱野從滬回日時，中日報紙，都會刊登一條新聞，說他在神戶（或長崎）被憲兵扣留一個時期。少壯軍人對犬養痛恨萬分，認為他是賣國賊。犬養在首相任內，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被一批軍人殺於官邸。

② 張發奎的第四軍，為汪打了許多仗，張本人那時成了光杆，可謂汪的忠實追隨者。有人告張發奎汪突然赴杭的消息，張堅決地說，他在兩天前提去見汪，汪妻陳璧君描述汪病得如何嚴重，所以不信此訊。言猶未已，當天晚報出版，最大新聞就是蔣、汪在杭會晤的消息。張氣得大呼上当。後來張負責接收廣州，對漢奸陳璧君的家進行搜捕，絲毫不客氣，以報被騙之仇。

孙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那时日军在沪随时挑衅，十九路军蒋、蔡两人，有意开火。孙科、陈友仁以及在沪的所有文武反蒋分子，一致鼓励蒋、蔡下决心为国争光。孙虽已下台，手里还控制了一笔款子，即拨付十九路军费二十几万元（王昆仑经手）。在上海的粤帮银行，也为十九路军筹了一笔钱，孙对此也曾出力。十九路军同日本陆战队一开战，日军败退，乃阴谋暂时停战，以便增兵来沪。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竟上当，会同英国领事弄成一个临时停战三天。日本增兵一到，立即又开战。因为此事孙科在沪中委谈话会上大骂吴卖国，吴越解释，孙骂得越凶，最后竟拿起茶杯要打吴，被多人拉住才罢，吴只得逃走。

蒋、汪后来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至六日）后，陈铭枢竟大言不惭地说，有他陈某在一天，十九路军决不会被人利用，自私之心，情见乎词。一九三三年，福建的人民政府转瞬之间被蒋打垮，原因自然很多，内容也必复杂；不过陈铭枢惯用手段，可能是失败主因之一。把一件大好事情弄糟，又牺牲了威名大振的十九路军，惜哉！

一九三二年二月到十二月，我们追随孙科在上海。孙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王十分努力，每期写文章。此刊内容激烈，鼓吹抗日，反对独裁，高唱民主，把蒋、汪及南京骂得一塌糊涂。那时我们到孙宅，每次见到孙科、陈友仁在看此刊，用英文谈得津津有味，有无官一身轻之概。此刊大约办了半年左右，一则经济有问题，二则蒋不断派人和缓孙的情绪，乃中止出版。

胡汉民有形容孙科的一段话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

时三种一起发。”凡接近过孙的人，认为胡的话虽挖苦，但不假。当孙发革命脾气的时候，也就是政治上表现得最好的时候。最可惜的是他发革命脾气的时候，也同发其他两种脾气一样，时间不长。因此之故，他根本不能坚持政治主张。偶有一些好的表现，可以用只是“曇花一現”四个字来形容他。在重庆有一个很短时期，儼然成为国民党革命派領袖，博得各民主党派及一切开明人士的好感。毕竟因他对权位观念很重，又被蔣所軟化，使得对他寄以希望者，最后紛紛大为失望了。这也可証明资产阶级出身者不经过改造，是談不上革命的。

## 十

在本文結束时，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汪、胡两人的最后下场。

汪在南京做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蔣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何必那样替蔣“背黑鍋”，汪說：“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汪同楊永泰們勾結甚深，走亲日路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汪在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后照象时被刺，身中两枪。<sup>①</sup> 因此他离开南京，赴欧州养病。船过香港时，胡汉民派其女胡木兰到船上見汪問候，汪对胡女說：“当初在九一八以前，你父亲一定要帮蔣独裁。到了国难严重后，他又反蔣了，我去帮蔣。我帮蔣的結果如何呢？請你轉告令尊，不要忘記我身中两枪”云云。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汪尚在歐洲。据說德意两国当局，促

---

① 照相前陈立夫跑上楼去見蔣，說秩序太乱，請蔣不要下去照相。汪妻陈璧君見汪被刺，立即破口大罵，認為此案必有严重背景。此案究竟如何，成为一个謎。

汪立即回国，以便会同何应钦等“讨赤”，使中国更法西斯化。七七事变后，汪力主派陈公博赴意，想请墨索里尼出面调停中日间战事。

一九三八年日寇攻占武汉，蒋、汪退到重庆时，日本首相近卫诱和，汪乃离开重庆过昆明去河内。这一幕戏，似是蒋、汪间各怀鬼态的“双簧”。①汪的亲信曾仲鸣被刺身死，汪即离越南赴香港转回南京，竟下海做汉奸了。汪派做汉奸，真是国民党的奇耻大辱。据传说，北洋派余孽的王揖唐、齐燮元们说：“我们被国民党打垮，现在堕落到做汉奸了，不料国民党又派副总裁汪精卫一批人来抢我们这一碗苦饭，真是岂有此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汪病死在日本（可能又有内幕，因最后日本在太平洋军事节节失败，一心想对蒋诱和，汪反而成为其中阻碍了）。陈公博在日本投降后成了汪的替死鬼，因陈系伪组织代元首，非被正法不可。汪不死于四十多年前刺摄政王一役，当了汉奸才死，可谓遗臭万年了。

胡汉民在南返后的一二年間，頗滿意于做两广的后台老板。胡派人组织新国民党，在港办《三民主义月刊》。不过为时一久，胡也看出“瘟猪式”的陈济棠的不足有为了。后来南京情形也起了变化，政学系在蒋身边逐渐得势。CC系虽抓住空的党部及所谓党权，但实际政治，CC系根本不能参与，蒋只听张羣、杨永泰的话了。为了抵制这种局面，CC系觉得惟有把胡拉回来，企图“重振党权”，利用胡在党内的地位来对付政学系。因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拉拢西山派老头居正、张继、邹鲁等，由他们力劝胡回宁。如果汪精卫不被刺走开，胡是沒有可能回宁的。汪既走了，胡内心里也就动

---

② 当时汪坐飞机离开重庆是一件大事，并非化装私逃，蒋绝对沒有不知之理。况且汪在昆明又过了一夜，如果不让他走，他是走不了的。我以为龙云当能知道这一幕戏的一部分。

了(傅秉常是六分胡派,四分孙派的人,傅告訴我們胡已決定回京再作馮婦),于是又赴欧洲考察政治,以便回国后找新借口北上。

一九三六年一月胡由欧洲回到香港,被陈济棠、李宗仁們热烈欢迎,坚請赴广州一行,胡不好意思拒絕。在广州住了些时,五月十二日,胡同他的亲信陈融下棋,忽然脑溢血而死。<sup>①</sup>

---

① 据参加新国民党的胡派人士告訴我,陈济棠生怕胡入京以后,时局一变,胡又会帮蔣解决他,同当年胡帮蔣解决李济深一样。胡到了广州,陈派了許多兵保护胡宅,胡发觉想走已不可能了。此事并没有表面化,胡、陈两人都装得沒有公开破臉。胡大概越想越气,当初被中央軍閥扣留,現在又被地方軍閥軟禁,气极才脑溢血死的。这位友人对我言之凿凿,我个人是相信此一事实的。

## 关于“非常會議”和“宁粤合作”

孟 曦

### 一、“非常會議”和蔣介石集团之間 是什么性質的矛盾？

从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上层人物除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始終坚持孙中山的进步的資產阶级民主革命路綫，并且不断地前进以外，大多数人先后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一九二七年，代表着大資產阶级和大地主的蔣介石背叛了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在南京建立了反动政权，向人民革命力量大举进攻；但也与此同时，在反动統治阶级陣营中，国民党内当权派与反对派之間、中央与地方軍閥之間不断地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明爭暗斗。当时蔣介石集团虽然掌握着中央大权，可是胡汉民和汪精卫两个派系在政治上比蔣集团的資望高、影响大，桂系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还拥有南方地盘和武装力量，北方馮、閻力量也頗为强大。蔣介石认为如果不逐步地把統治阶级内部完全統一起来，就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达到消灭最后的阶级敌人——中国共产党。这年冬，蔣介石曾被迫于以桂系为主力的反蔣活动而暂时下野，不久就又回到南京，重行上台。一九二九年，他进行了討桂、討馮、討唐的战争，扣留了在国民党内軍事方面資望很高的李济深；一九三〇年又进行了討閻、

馮的戰爭，擊敗了當時在南方和北方的武裝勁敵。一九三一年又拘禁了從一九二七年起就在政治上支持他反共、討桂、討閻、馮的胡漢民。他這樣急躁地在統治階級中誅除異己貫徹獨裁的野心，使得當時國民黨各非蔣派系和地方軍閥都慄慄危懼。於是激起了一九三一年胡漢民、孫科、汪精衛、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白的聯合反蔣運動。他們在廣東建立起一個國民黨中央機構“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和南京的蔣政權對抗，形成了當時寧粵分裂的局面。這個反蔣聯合陣綫打着反對獨裁要求民主的旗子，既反蔣、又反共，他們的政治立場是和蔣政權同樣反動。所以就其性質而言，他們的鬥爭也和以前的桂系反蔣，閻、馮反蔣一樣，只是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以後當寧粵和平會議在上海開會的時候，全國民眾正展開要求抗日的運動，上海各界代表二、三十人到會場去見粵方代表汪精衛等。沈鈞儒發言，斥責他們不顧民族存亡，只顧爭奪政權。他說：“你們那些糾紛以及誰是誰非，我們不想聽，因為都與人民無關，都只有害於國家。”劉湛恩痛哭失聲地說：“你們閥內爭這麼多年了，今天眼看就要國破家亡了，你們難道還不肯拿出一點良心來看看老百姓的痛苦嗎？”這就是當時民眾對於國民黨內部紛爭厭惡怨恨的聲音，也正確地說明了蔣與反蔣閥矛盾的性質，正如當時宋慶齡的宣言所說，寧、粵兩個政權“皆依賴軍閥，諂媚帝國主義，背叛民眾，同為革命罪人”。

## 二、蔣介石胡漢民之間的矛盾 和非常會議成立後的形勢變化

蔣在討伐閻、馮勝利之後，就加強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特務統治集團，以控制國民黨的各級組織，同時又提高黃埔系軍人地位，以控制軍隊。對於擔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胡漢民越來越不



許他問事。胡常當面和蔣爭執，背後發牢騷；他對人說“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機器罷了。”最後，由於胡堅決反對在五院以上還有一個集權的大總統這一種制度的提出，和蔣在會場上公開衝突起來。蔣深怕胡忽然跳出南京去和自己對抗，於是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尾把他扣留，旋即軟禁在南京郊外小湯山溫泉別墅。胡被拘禁後，就通過當時任國民政府文官長的古應芬，先秘密策動陳濟棠、李宗仁，又和孫科秘密聯繫，決定發動反蔣。孫科率領一批幹部潛離南京，五月下旬到廣東，並由他們邀請了汪精衛來參加。既有胡、汪、孫的聯合，又有兩廣的地盤的非常會議成立了，公開宣布蔣的獨裁罪惡，聲言要北伐討蔣。這樣，就突然造成對蔣很不利的形勢，既在一定程度內影響他的國際地位，又影響他集中力量去“剿共”；如果對抗局勢持久，更有使北方、西北、西南各地軍閥發生動搖的可能。以後“九一八”炮聲響了，全國人民的忿怒更首先集中於蔣的專打內戰而不抗日，他成了眾矢之的。由於蔣感覺到他自己的弱點，就不得不再一次採取過去行之有效的假裝讓步甚至一時下野的欺騙手段。於是先派遣吳稚暉、張繼等到香港摸摸底，然後才派比較超然的蔡元培和過去與胡漢民及和兩廣都有些關係的陳銘樞為正式代表，以“國難當頭團結合作”為理由，建議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在反蔣陣綫方面，由於既得不到人民的同情，內部又矛盾重重，也就不能不接受“和平統一”的道路。

### 三、在反蔣聯合陣綫中胡漢民與汪精衛的矛盾

在反蔣聯合陣營中本是充滿了矛盾的。胡與汪是從來勢不兩立的。一九二七年汪精衛在武漢背叛革命，胡已先在南京與蔣合作，使汪不能參加南京政權。後來汪和閻馮在北方擴大會議反蔣，胡

就坚决助蔣。一九二八年胡从欧洲回国,曾提出“成立五院实行法治”的主张,以便再与蔣合作。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进南京去供蔣利用,胡回答說:“自古武人只能馬上得天下,沒有文人就不能馬上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現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約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胡和汪都竞争着作蔣的政治工具是极其明显的。非常會議成立之初,汪到了广东,有人問他,今后是否真能与胡合作。他說:“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当。蔣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們不能团结。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一贯口蜜腹剑的汪精卫又說了这样好听的話。汪精卫拥有由一大批的干部如陈公博、顧孟余等所組成的“改組派”,他們在背叛革命之后,还公然以“左派”自居。这时候蔣虽然拘禁了胡汉民,却又并不找他們去南京。汪正在找不到托身之所的时候,遇到了非常會議的机会,跑来参加,就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再創造自己的政治資本,为以后与蔣合作講价錢作准备。却不想非常會議的武力支持者陈济棠,是亲胡而拒汪的,他只欢迎汪个人带一些中层干部进广东,而坚决排拒汪派的陈公博等加入。汪精卫认为这是“去皮存骨”,对陈济棠非常忿恨。这实质上仍应看作是胡、汪矛盾的繼續。

#### 四、乘机而起介于胡汪之間的孙科

孙科在南京当一个铁道部长,在蔣政权中没有什么发言权。同时,他代表着一小批广东官僚资产阶級,和宋子文、孔祥熙有利害冲突。胡被扣,汪在外,发动一次政治斗争,他就能出头露面,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場中就在

“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孙科没有汪精卫那样一个可以争“党统”的干部集团的改组派。他的基本干部，文人中有梁寒操、马超俊、傅秉常、吴尚鹰等广帮官僚，武人中有陈策、陈庆云、张惠长等花花公子。这回发动反蒋，才由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鍾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比较年轻的干部。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一贯反共，又坚决反蒋。过去和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李济深、李宗仁等都有关系，被压在蒋集团统治之下，苦于没有向上爬的道路。现在遇到国民党内矛盾爆发，他们就活跃起来。孙科所率领的这一批老干部集合在非常会议旗帜之下，形成了当时的“孙派”。孙派在这次反蒋运动的前一阶段中是和汪派及桂系比较接近的，而也为陈济棠系所歧视。同时，因为孙派和汪派接近，胡派就和他们疏远。到了上海和平会议开会时，由于胡的坚决反蒋，汪的暗中勾蒋，孙科就又接近胡而反汪。

## 五、暂时假借非常会议巩固地方统治权的陈济棠

陈济棠在李济深被蒋扣留之后，勾结了蒋，继承了广东地盘，掌握了李的基本部队，即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三个师，扩为三个军（北伐后，李济深的老第四军所部陈铭枢投蒋，张发奎投汪）。但当时陈铭枢是由胡推荐由蒋任命的广东省主席，以后陈济棠排挤陈铭枢离开了广东。陈铭枢的部队虽在江西帮蒋剿共，却有人仍不忘故乡的广东。陈济棠很怕蒋和陈铭枢再来吃掉自己，为了巩固地盘，愿意接受胡汉民的策动而欢迎他们在广东建立反蒋政权。可是他只能允许非常会议放放空炮，给他作政治招牌，绝不肯真地出兵去“北伐讨蒋”，也不肯使汪、孙等分享广东的统治权。因此汪、

孙常发牢骚，說“土軍閥的气更不好受”。陈济棠統治广东，貪污压榨絕不亚于蔣集团。九一八事变发生，广东軍警开枪打死請愿学生，学生羣众抬着血衣到非常會議示威，先是汪精卫出去花言巧語，后来是李揚敬上去胡說八道，被学生哄了下来。从蔣派遣陈銘樞打敗“张桂軍”之后，桂系白崇禧在广西編練民团，力图自保；李宗仁常在广州作客，聯絡陈济棠，以求对他們小有支援，他常感到仰面求人的苦恼，自称“聯絡參謀”，滿腹牢骚。

## 六、陈銘樞究竟支持了誰？

陈銘樞自蔣介石背叛革命就到南京作了蔣的总政治部部主任，大张旗鼓地帮蔣反共。以后既战敗了反蔣的张桂軍，又作了“剿赤軍”右翼集团总司令，一时地位和蔣嫡系何应欽相等（何是左翼总司令）。在政治上他提出加強中央領導、地方裁軍、軍人不干政这一类有利于蔣的主张。非常會議反蔣，他成为蔣最适合的議和代表之一。另一方面，反蔣陣綫想进南京，需要武装保护，就提出“改变京沪一带軍事环境，十九路軍进驻京沪”的要求，于是陈銘樞做了京沪卫戍总司令，和議成功后，又任孙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到了蔣、汪合作拆孙科的台，陈銘樞就又忽然不再是南京政府的武装支持者了。“一二八”十九路軍在淞沪抗战，陈銘樞发表談話，表示十九路軍是他指揮的部队，絕不会被別人利用（指抗战）。他曾电召蔣光鼐去南京，企图制止抗战，为蔣光鼐所拒絕。最后，他亲自跑到真茹鎮发表十九路軍停止抗战、淞沪撤兵的通电。淞沪抗战垮台，蔣把十九路軍調到浙江，以后轉入福建。蔣、汪政权巩固了，陈銘樞也失去了前一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在反动統治陣營中，陈銘樞每当形势变化总是积极活动，出发于他的強烈的政

治慾望，企图以他自己的向背而影响政局。帮了蔣又利用反蔣的力量，利用了反蔣力量又帮了蔣；帮了蔣又被蔣踢开，然后再反蔣。由于他的方向模糊、行动反复而又不断地活动，当时有些人叫他作“軍人政客”。

## 七、宁粤分裂又“合作”，胡汪“合作”又分裂

“九一八”炮声激起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和反对統治阶级內訌的呼声，这既迫使南京蔣介石不能不对广东让步，又迫使广东方面不能不对蔣議和。必須指出，汪、孙等在广东既不能推动陈济棠出兵討蔣，又与陈济棠矛盾重重，这个非常會議本已处于无法下台的地步；就只得喊出“精誠团结共赴国难”好听的口号，接受蔣所提出到上海和平會議的建議，陈济棠也正好就此“送客”。于是汪、孙及粤方代表先后到了上海。胡那时先被释放到上海。胡和汪从一九二六年离开广东以后，一直是遥遥对垒，到这时才因为似乎一致反蔣，才有可能見面。当时国民党中也頗有人以为这回胡、汪两个“領袖”能合作了，国民党可以改变了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当胡、汪第一次在上海伍朝枢住宅見面的时候，汪作出一付謙虛誠懇的鬼样子，对胡說：“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現在經過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訓。”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說了几句批評的話。然后胡、汪、孙三个人同照了一张象，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了。可是事实怎样呢？他們一方面和蔣方代表在和平會議中明爭，一方面又展开内部同牀异梦的暗斗。胡汉民当时对于再返南京，最无指望，因之反蔣情緒最高。他深怕汪与蔣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議代表，只有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这时蔣派宋子文、陈立夫、吳

鐵城、程滄波、吳開先等在上海進行分化陰謀。汪是粵方首席代表，會場上說些官腔，暗中和蔣方講價錢。胡提出主張，如蔣不讓步，就不惜決裂，大家一齊回廣東去開反蔣派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這當然不是已經和蔣勾結的汪所願意的。有一次汪的家里許多高級幹部集會，張發奎發言，主張粵方內部應當團結對蔣，他說：“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們總是擁護的。”於是汪大發雷霆，痛斥了張發奎，說他“這麼多年的軍人還是不懂政治，還要亂說”，這是汪對自己幹部明確表示不再和胡、孫合作反蔣的開始，以後他就稱病入醫院，不參加會議，並拒不見客。當寧粵雙方達成了在南京廣州先各自舉行四全大會、然後共同產生一個統一政府的協議，胡、孫及粵方來滬的代表、幹部們都準備回廣東，臨行的晚上，汪派的代表忽然宣稱得汪指示，不上船了。於是胡、汪裂痕公開暴露出來，寧粵經過分裂又“合作”了，胡、汪經過“合作”又分裂了。至於孫科，看到胡、汪矛盾很深，認為最有希望進南京的是他自己，因而他最情急於和議的成功。

同是一個國民黨，居然能夠同時在南京和廣東兩個地方開起“四全大會”來。京方大會以正統自居，僅僅恢復一批過去曾經開除出去的中委黨籍（不用說，共產黨員當然不在恢復之列），並因為要名額的平衡，加了几个新的“恩科”中委，這樣就算表示團結和寬容。在粵方的會場上，陳濟棠、胡漢民兩系是中心，加上孫派和桂系，展開選舉中委的爭奪戰，丑態畢露。汪既不回去參加粵方的會，又不見容於京方蔣集團的會，於是公然借用當時上海流氓妓女出入場所的“大世界”作他們的會場，按照汪派國民黨“法統”舉行第三個“國民黨四全大會”，選出了十名“大世界中委”，一時臭名遠揚。

## 八、孙科政府的灭亡

国民党同时异地举行三个四全大会的喜剧演完，蒋介石宣布下野，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所谓“责任内阁制”的南京政府的悲剧登场了。孙科一下火车就遇见各地学生到南京的抗日救国大示威，于是南京军警镇压学生，并把他们绑架上火车，押解出境。“新”的南京政权就这样受到了第一次的考验。跟着使它遇到的难关是原财政部长宋子文把库存一起提光带走，次长和司长们也都带了档案账目一走而空。同时，所有在京各军代表一齐伸出手来向政府逼索军费。孙科自掌财权，并由黄汉樑（广帮在上海的一个银行老闆）署理财政部长，多次到上海求援。在宋子文所布置的金融封锁下，南京政府连日常开支都几乎无法维持。这样就使得孙科坐困愁城，难于渡日。这时候“久病”在上海医院里的汪精卫忽然飞到杭州去和蒋见面了，陈铭枢也不辞而行，由南京飞去杭州。蒋、汪计议妥当之后，邀请孙也到杭州去开会，其目的是要孙同意蒋的复辟，汪的进南京，而假装要胡汉民也来参加。到这时候孙已明知大势去矣，但还不甘心放弃。当时胡、孙的政治口号是“抗日剿共”，这与蒋汪只剿共不抗日有所不同。孙科所任命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在就职前后都表示过要固守锦州，警告日本政府，并公开反对过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时来了一种直接对南京最大的威胁，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已决心要在中国东南进行武装进攻，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蒋集团在南京散布谣言，说有人要放火烧日本公使馆，并派一些流氓在下关一带往来滋事。在长江中的日本兵舰就脱卸炮衣，掉转炮口；日本使馆扬言，如果一声有事就向南京城开炮。于是孙科处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危城中了。一天上午，他召集干部会商，所到

不过七、八人,已經得到“部长”、“市长”之类的人們面面相覷,一言不发。孙科滿面愁容,一筹莫展。为了免于当俘虏的危險,只能被迫丢掉这一个号称由“精誠团结共赴国难”所誕生的新生儿——不到一个月的新南京政府,当晚悄悄地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車。孙走了,蔣、汪来了。孙在惨败忿怒之余,抓住了“对日絕交”一条堂皇正大的武器,和陈友仁去到南京参加一次蔣、汪合作下的国民党中央會議,提出这种明知必遭到蔣、汪反对的主张,就此辞职,放了一个起身炮。

## 九、蔣介石又一次統一了反动陣营,繼續向人民进攻

从一九三一年春到一九三二年的国民党内部的联合反蔣运动,在蔣所布置的天罗地网下宣告失敗了,也无非又重复一次过去多少回联合反蔣失敗的經驗。于是国民政府的“蔣主席”变为軍事委员会的“蔣委員長”,行政院“孙院长”变为“汪院长”。通过“宁粤合作”这一个回合,蔣介石胜利地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再接着破坏了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战,进一步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然后,在“攘外必須先安內”无耻的口号下,殘酷地鎮压人民抗日救国运动,調集兵力进行他的“四次围剿”,他明确地本着自己的反动立場,坚决企图消灭他的阶级敌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历史过程說明,中国人民与反动統治势力之間,反对帝国主义和投降帝国主义,革命和反革命,才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一場长期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至于“非常會議”“宁粤合作”等等仍然只是在阶级矛盾中反动統治方面所暴露的内部冲突。因此,他們派系与派系之間,中央与地方之間,照例可以反复地表演着分裂、合作、又分裂、又合作的丑剧。直



到人民革命力量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才把他們一起推下历史舞台，最后結束了他們的命运。我們也并不否認，在他們的陣营中，从出卖祖国利益和鎮压人民革命的角度来看，有的人比較有些正义感，态度比較緩和些，有的就公然为虎作倀，甘心卖国，而对人民的鎮压，更凶狠殘暴。从他們内部矛盾关系上看；当他們斗争剧烈，形成分裂局势的时候，使得反动力量分散，就比較有利于人民革命的发展；当他們中間最反动的統治集团取得压倒优势而中央政权安定的时候，就更能集中力量向人民进攻。然而無論他們是怎樣的离合悲欢，从人民立場看来，除了一小部分人实际上已經脫离了統治階級反动立場，走向人民革命的道路之外，在他們中間，还不都是一丘之貉？那有什么大是大非之可言？

## 蔣介石背叛革命后下台又上台

賀 貴 巖

### 蔣汪桂斗法，蔣介石下台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事變以後，武漢政府即於四月十六日免去了他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七月間，汪精衛提出“在夾攻中奮鬥”的反動口號，一面頑固地反共；一面令張發奎率所部第二方面軍進取南京，武漢政府亦隨軍東遷。因此，南京方面的蔣介石、李宗仁將進占徐海各軍急劇撤回，準備迎擊。當時政治情況非常複雜，汪對蔣、李利害關係既不相同，而蔣、李之間的矛盾尤其尖銳。論他們的處境，蔣介石系罪魁禍首，而且已經失去了軍職；李宗仁、白崇禧則擁有桂系軍事力量，中立於各派之間，舉足輕重，所以他們在蔣、汪之間極盡縱橫捭闔的能事，甚至連何應欽也援引到自己一方面來，借以孤立蔣介石，並促使他下台，以圖竊奪政權。蔣則陳兵津浦路上，抗拒再度南侵的北洋軍，以此來緩和各方面對他的攻擊，達到戀棧的目的。但結果沒有成功，他不得不於八月十三日宣布下野。

在蔣介石垮台之前，李宗仁表示反蔣擁汪，汪精衛很得意，以為這一下他就可以穩坐江山。乃張發奎軍到達江西境內，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了，張率所部匆匆奔回廣東，汪在軍事上的如

意算盡落空了。李宗仁以为时机已至，轉而进行反汪活动，亲自赶到九江（武汉政府要人齐集九江），拉攏非汪系委員如孙科、譚延闓、李烈鈞之流，参加桂系将要組織的所謂特別委员会，并阻止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迁宁。汪精卫的政治阴谋遂告失败，汪系重要囑囉都蟄伏上海租界，汪本人亦以患病为理由拒絕参加特別委员会，回到了广东。

在这一場角逐中，蔣汪两敗俱伤，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势力从此开始抬头。

### 特別委员会的貨色

桂系势力把蔣、汪打下台以后，即在南京組織所謂特別委员会，用以执掌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权。特委会的組成包含着沪、宁、汉三部分委員。所謂沪就是整个西山會議派組織，与桂系勾結較深；宁、汉則是蔣、汪两系人物。当时西山會議派以张繼領先，其主张最反动。他說：蔣、汪都曾与共产党合作过，都是有罪的人，不可能参加特委和政府。由此就可以知道特委会是怎样一种貨色。这个反动派別，为了爭权夺利的目的，主张中央集权，取消中央政治會議和各地的分会，但是后来桂系又利用政治分会的組織来割据地盘，排除异己。

特別委员会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由李宗仁和白崇禧导演而組成的。先后开过四次談話会，在九月十五日最后一次會議上决定：李宗仁、楊树庄、李烈鈞、馮玉祥、謝持、蔡元培、汪兆銘、唐生智、蔣中正、程潛、王伯羣、覃振、何香凝、閻錫山、胡汉民、孙科、朱培德、林森、于右任、戴传賢、张繼、許崇智、伍朝枢、譚延闓、吳敬恆、邹魯、李煜瀛、张人傑、居正、李济深、何应欽、白崇禧等三十二人

为委员，刘积学、顾孟余等九人为候补委员。成立大会系由谭延闿主持，张继作政治报告。跟着任命胡汉民等四十三人为国府政务委员，而以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谭延闿、李烈鈞等为常委；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任命程潜等六十六人为军委会委员，而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

当时桂系大权在握，不可一世，谭延闿、李烈鈞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亦复如此。三个常委虽把程潜排在首位，但因程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他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虽然在蒋下台后拼命扩张实力，如：把第一军改编成第一、第九两军，提拔刘峙、顾祝同二人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实权，以消后患，等等，但何应钦还是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力与桂系抗衡，也就无权过问军委会的事体。所以，无论是特委会也好，军委会也好，都只不过是桂系争夺权利、扩张地盘的御用工具而已。

### 桂系争夺两湖地盘

桂系势力控制两广地盘以后，又进一步搞两湖地盘，于是与唐生智展开了争夺战。唐占据两湖，是汪精卫的有力支持者之一。当特别委员会成立时，唐曾表示坚决反对，为的是支持汪精卫政府迁宁。但闻张发奎军东征失败退回广东以后，汪精卫所控制的党和政府失所凭依，已经四分五裂，原来与汪一起的委员们不东走沪即南走粤，武汉已陷于孤立无依之境。这时唐还不警觉，竟乘桂系第

七軍龙潭苦战之余，以反对特委会为名进兵安徽。而这个省区是桂系久已視為俎上肉的。这样一来，李、白就抓着机会大做文章，借口唐与孙传芳有勾結，发动討唐之战。自一九二七年九月起，李宗仁、白崇禧即联合程潛組織西征，行动极为秘密，以准备北伐名义进行部署，部队都是黑夜渡江，以避偵探耳目。武汉方面因此毫无觉察。迨十月十五、十六等日，西征軍主力——第七軍、第十七軍、第四十四軍等到达滁县和全椒后，突然来一个左旋迴，直扑合肥、安庆。长江南岸，則以程潛所率第六軍等突袭蕪湖，唐軍刘兴部仓卒应战，一击即潰。由此七、六两軍夾长江两岸向西追击，势如破竹，为时不到一月，就攻占武汉。在发动西征軍事的同时，由特別委员会免去了唐生智的本兼各职。唐这时眼見大势已去，便悄悄地乘长江日清公司輪船逃亡日本，唐軍所部亦被迫退回湖南。桂系占領武汉以后，一面休整軍隊，准备略取湖南；一面改組行政机构，布置党羽，控制湖北。經過一个时期的布置，繼續向湖南进兵。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間湘鄂間的战事又爆发了。桂系各軍分成两个纵队，由程潛和白崇禧二人分別率領，程潛还挂着統帅的名义，經鄂南进攻湘北。唐生智所部各軍起初还是秩序整然严陣以待，同时西征軍内叶开鑫部又于中途倒戈以击桂系，形势本来很好。但是竟出人們意料之外，战斗一开始，唐系各軍即由湘北退向湘西，終于向桂系屈服，接受改編。至此，桂系控制两湖地盘的野心果然如愿以偿。

桂系占領两湖以后，初以程潛任湘鄂政务委员会主席兼主湘政，程与桂系一时似乎尚能相安。但是彼此的結合都是互相利用。桂系认为两湖地盘已經到手，程的老招牌已无利用的必要，乃借口程不服从武汉政治分会领导，自搞一套，誘程至汉将其扣留。这时

南京特別委員會中的譚延闓亦圖染指湖南，即派魯滌平繼任湘主席。桂系則認為魯不合自己胃口，又以拙劣的手法，揚言派某部隊取道湖南回廣西，迨抵達長沙車站，突然下車，向湘省政府發動武裝攻擊，把魯趕跑，而以何鍵接任。其目的無非是為了鞏固兩湖的地盤。

### 蔣介石捲土重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正是桂系勢力把持特別委員會積極擴大地盤的時候，也是何應欽率領北伐軍攻占徐州北伐軍事告一段落的時候；汪精衛自廣東來到上海，與新從日本回國的蔣介石作了一系列的會談，討論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的可能性，以圖打破當時桂系勢力專權的局面，使蔣、汪得以捲土重來。蔣、汪等在十二月上旬約集國民黨在滬部分委員開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其中重要的決議有：南京特別委員會決定重大案件時，必須取得預備會議的同意。這明明是對桂系權力的一種限制。李宗仁、白崇禧當然不答應，立即發出通電表示反對，大意說：“四中全會必須到首都召開，在上海租界上所開的預備會議，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價值。”其所以主張要到首都開會，是因當時桂系在南京還駐有少數部隊，而南京戒嚴司令賀耀組正在津浦線上指揮北伐戰爭，但由何應欽派了一個與蔣介石矛盾很大的副司令周鳳岐坐鎮南京，肯定蔣、汪不敢冒險到首都開會，所以桂系將這一軍。賀耀組對桂系執掌大權，擴張地盤，深致不滿，想利用南京戒嚴司令職權，擁護國民黨，抑制桂系勢力，給國民黨開拓一個新的政治局面。正在這個時候，賀突接朱紹良自上海來信，約其赴滬商談。賀同朱紹良、何應欽雖然都是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但平日彼此積不相能。蔣介石下野時，朱

因是蔣的參謀長，也同時下野。他這次來信，賀意識到是為了四中全會到南京召開的事。賀和蔣的關係原不甚深，但後來看到蔣被迫下野，桂系大搞地盤，何應欽也想走孫傳芳五省聯軍的老路，賀覺得蔣、桂雖是一丘之貉，終究“彼善于此”，因此採取了擁蔣抑桂的態度。賀接朱信以後，即分別探詢劉峙、顧祝同二人政治意向。他們表示與賀採取同一態度，並催他迅速行動。賀就率領自己的部隊第四十軍第二師回到南京，部署戡戍事宜，並叫桂系留京少數部隊開赴漢口。賀的這種作法，各方面起初只認為是戰後回京所應有的一般措施，沒有料到其中含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尤其是特別委員會的當權人物，狂妄自大，更不認為賀某敢于行此大事。因此，賀的軍事部署得以順利完成，而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亦出人意外地在南京順利召開。

賀耀祖在南京完成軍事部署後，秘密到上海會見了朱紹良並和朱一道去見了蔣介石，蔣對賀的部署自然表示同意，特別是聽說劉峙、顧祝同等仍願為蔣効忠，認為他的政治資本並沒有完全失掉，感到非常得意。蔣、賀一起對當時國內形勢作了估計，對如何召開四中全會、繼續北伐、阻止桂系地盤主義的發展等等問題，彼此都取得一致的意見。

賀與蔣介石商談以後，跟着返回南京，對國民黨二屆中央委員發表了一個通電，希望他們速來南京開會，保障他們言論行動的自由。賀的這個電報發出後，國民黨散處各地的中委紛紛來京。李宗仁 and 蔣介石因為各有一套打算，到得最早。截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底止，已有二十餘位中委到了南京。在此期間，幾度發生波折，其中比較嚴重的是，桂系借口廣州公社事件，糾集在兩湖作戰的將領彈劾汪精衛、顧孟余、陳公博、甘乃光等九人，不許他們出席全

会，并要开除他們的党籍。这事由委員談話会推于右任等五委員审查，后来决定仅停止其中四人出席，問題才告解决。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二月四日正式开会。这次會議的主要决定是：恢复蔣介石国民革命軍总司令职，改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組国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员会，以蔣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党权、政权、軍权都落到了蔣的手里。这次會議虽然作了繼續北伐的决定，并且以后攻取了华北和平定了东北，但这也总不过是以新軍閥代替旧軍閥而已。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存有好心腸的人，希望通过这次會議为中国开辟新的政治局面，結果适得其反，却为蔣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奠定了基础，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 短 稿 十 篇

### 辛亥馮國璋接統禁衛軍后的活动

恽 宝 惠

辛亥武昌起义，北軍南下，馮國璋、段祺瑞分任第一軍、第二軍總統官。及袁世凱就任內閣总理，馮繼貝勒載涛之后，回京接任禁衛軍總統官；段署湖广总督，並接統第一軍。

禁衛軍的編制，除步队第三标是直隶、河南、山东人外，其他步队三标、馬队三营（內一营是挑的蒙古馬队）、炮标及工程、輜重两营，全系旗人，以京旗及內外火器营、圓明园、健統营（此三处称为三山）为最多。軍官則协統良弼（馮接統后調为軍諮使）、姚宝来，标統忠和、扎拉芬、崇林等，亦皆滿族；队官排长，滿族尤占多数。

馮以汉人而統禁軍，实因曾为陸軍貴胄学堂总办的关系（貴胄学堂有王公誦习班，自醇王載灃以次均到堂听誦，其名为貴胄者，亦以八旗世爵及世家子弟为大多数），及汉阳之役又封二等男爵，王公滿族以其效忠清室，皆信賴之。

当时袁世凱意图推翻清室，篡夺革命成果。当孙、袁条件洽定以后，禁衛軍官兵以为皇室当然灭亡，滿族亦归消灭，无不激昂反对，以致議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虽皇族甘愿退让，隆裕太后已被袁压迫，忍泪屈从，而此万余人者，若变生肘腋，袁固不能調前敌之兵，喋血京师，且亦无以維持北方之威信。馮于此时，一方面感謝

袁氏平素之知遇提拔，不能毅然反对，一方面又愧于已身处境之困难。而其时君主立宪派人物，如阿勒精阿（字青三，舒清阿之兄，驻防荆州）等，日夕包围，激以忠义，馮当时所处地位，岂能反对君宪。于是馮被举为君主立宪会会长，蒙古郡王貢桑諾尔布为副会长，联袂謁袁，表示意見。在袁彼时固有說不出之隱衷，馮处茲两面夹攻，亦深覺进退維谷。及时期已迫，无可推延，馮乃亲赴軍司令处（时称处不称部，在西苑）广場，召集全軍官兵，自登高桌，向众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及优待滿蒙条件，內并有禁卫軍額数俸餉仍如其旧之語，云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并任众发言質問。馮說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詔权不詔位，两宮保全，及禁卫軍待遇皆担保到底；無論个人調任何职，必仍以禁軍自随；并声明自己决不与革命党往来，倘发现有言行相违之处，准許本軍之人随时枪杀，不許家屬报复。又命公推两人跟随出入，當場推出正目福喜、德祿两人，馮立即派为副官，各給馬一匹、手枪一支，随同进城。于是此一場大风波，乃得平安渡过。此外尚有瑣事可紀：馮直至民元八月，其所仅存之发辮，尚保留未剪；其时高級將領，除張勳外，固无一不去辮者。又馮所戴紅頂花翎之官帽，亦一直放在帽架子上，蓋均对禁卫軍有作用也。

## 鄭汝成之死

陈 一 叶

袁世凱窃国之后，为了准备帝制，一九一三年特任郑汝成为上海鎮守使，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党人受其害者甚多。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日为日本国庆节，是日上午十一时駐上海日本总領事館举

行酒会，招待来宾。此时郑汝成乘车前往道贺，刚经过外白渡桥，当车正要向东拐时，忽然有人在车前投了一个炸弹。司机见状，急将车向后倒退，瞥见车后又有一人投来炸弹一枚，车遂停下。刺客两人同时打开左右车门，持枪向郑头部射击，郑和同车的某参谋立即倒毙于车内。最后，一刺客更将所持手枪用力向郑头部掷去，致将郑的头颅击得粉碎。迨巡捕闻枪声驰至，两刺客遂从容就逮。以后此二刺客被租界当局引渡交袁政府，遂遭杀害。

此事发生前夕，周哲谔同志（民初由我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在非常大总统时期任陆军次长）邀宴于法租界寓所，上座两客，均称姓王，气宇轩昂，言词激烈。事后方知此二人即杀郑汝成之烈士。

## 袁世凯之死与唐天喜之背叛

陶 樹 德

一般人都知道袁世凯之死，受陈二庵（宦）的影响最大，但在袁左右的人，则认为袁在死前所受刺激最大的事是唐天喜的背叛。

唐天喜，河南人，幼年在豫剧班中唱小旦，人长的俊美，袁世凯在家当少爷时就爱上了他，收留下来作为贴身仆从。袁去朝鲜时把唐带到汉城，仍作随从差役。小站练兵时，袁提拔唐为武卫右军右翼三营哨官（相当于连长）；后来改建新军，升唐为领官（相当于营长）；又后来编陆军第三镇，升唐为该镇第十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民国成立后，袁用唐的第十标作为自己的卫队。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曹錕的陆军第三镇发生了京、津、保兵变事件，袁世凯迫于舆论，下令解散第三镇，但只解散兵而仍保

留官。次年，袁調第三鎮第五協統領盧永祥接任第二十鎮統制，其遺職調唐天喜繼任。但盧遭到二十鎮軍人們拒絕，仍回原職。是時唐天喜已將第十標交出，於是袁又下令編兩個混成旅，以唐為第七混成旅旅長，不久又發表唐擔任京漢綫北段護路司令。袁的家住在彰德，實際上唐是給袁看家的。

一九一五年洪憲帝制發生，蔡鍔首先起兵討袁。袁派曹錕帶兵入川，對護國軍作戰，因護國軍獲得人民的擁護，袁軍作戰失利。

當時，因為湖南吃緊，袁世凱任命幫辦江西軍務馬繼增為援湘司令，由江西率第六師開入湖南。此時唐天喜往見袁世凱，痛哭流涕；唐說：“蒙大總統三十年養育之恩，我要上前綫去打蔡鍔。”袁囑以看家要緊，唐堅決要去，袁遂任唐為援湘副司令，歸馬繼增節制。唐天喜率部開抵湖南後，湖南趙恆惕等知唐最貪財，花了三十萬兩銀子的運動費，唐就變了心。在一個夜間，唐部忽向馬繼增的第六師襲擊，馬部猝不及防，全師潰亂，馬憤而拔槍自殺。袁世凱接到唐天喜叛變消息，如晴天霹靂，震動非常。一面電江西李純派員往湖南收容第六師，一面通緝唐天喜，指明如抓到唐即行就地正法。據靠近袁的人說，袁臨死以前，口口聲聲叨念：“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成了神經失常狀態。所以說袁世凱之死受唐天喜倒戈的刺激最大。（唐永良整理）

## 馮玉祥調任陸軍檢閱使的經過

鄧 漢 祥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以後，馮玉祥調任河南督軍；吳佩孚駐在洛陽，處心積慮，想壓制馮部。當時，直系已分裂為津、保、洛三

派，馮利用直系內部矛盾，投靠曹錕。一日，馮由河南到保定見曹，曹派人往車站迎接，并派其自用雙頭馬車駛抵車站，備馮乘坐。去接的人為了討好馮玉祥，報告他說這部馬車是大帥自己坐的，馮堅不肯坐，并說：“大帥坐的車，我不敢坐”，于是步行到達曹的巡閱使署。他一見曹錕，就跪在地下嚎啕大哭。曹問：“煥章（馮的號），咱們自家人，你有什么話；都可以向我說，何必這樣悲傷呢？”馮說：“玉祥是沒有娘的孩子，今天見到娘，我怎能不哭！”曹又追問他有什么困難，馮便坦率地說：“吳玉帥對我毫不諒解，使我動輒得咎，啼笑皆非。”曹立即以誠懇的態度對馮說：“你的事有我負責任，你的部隊調到北京去好了。”不久，馮即被任為陸軍檢閱使，他的部隊隨即移駐北京南苑。

## 黃埔五期“清黨”的回憶

鄭庭笈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繼續四一二政變之後，在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中也實行“清黨”。當時我是黃埔第五期步兵第二學生大隊第八中隊第三十區隊的學生。第五期學生約有三千名左右，是一九二六年九月間由入伍生團升學的，編成步兵科兩個學生大隊，第一大隊住校本部，第二大隊住蝴蝶崗（另有政治科一個中隊，是在入伍生團的時候編成的，後開往武漢隨軍北伐；炮兵隊、工兵隊也先後開往武漢；經理隊住校本部，步兵大隊和經理隊，一九二七年七月開往南京，八月十六日在南京舉行畢業典禮）。在四月十五日早上，我們和往日一樣，起床后就整理內務、洗臉，然後集合到大操場舉行徒手體操。但到大操場集合後，看到周圍山頭和十字路上站滿

了武装哨兵,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包围起来了。当时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精神上非常紧张,因为不准自由谈话,只好眼对眼互相看着。各区队值星官照例地报告人数,以区队为单位,排成横队由各区队长口头宣布命令:“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在原地不动。”,我记得这样连续地说了几次,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最后,区队长说:“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叫你们出来了,还是自动站出来好,没有什么,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区队长(姓林,名字忘记,广东海南岛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普通话讲得不很好,许多同学听不懂。后来共产党员赵范生(四川人)、吴玉瑤(广东人)首先站出来了,接着有八名也都站出来了。他们随即都被逮捕了。赵范生是我政治小组组长,他在课余时间还教我学普通话,我对他印象最深,他被逮捕后我不禁落了眼泪。后来才知道是蒋介石有计划地杀害共产党员。被捕的共产党员态度非常从容,没有丝毫难过和恐惧的表现。但那时站在队里的同学反倒心神不定,有些低下头来,有些脸都变色了。不久集合到大队部一起,由武装卫兵押送入蝴蝶岗的禁闭室,以后由大队长集合讲话,说奉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并说:“这和你们无关,你们要安心学习和遵守纪律。”我们回到寝室后,知道第二学生大队被逮捕的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第一学生大队和经理队有二百名左右。逮捕的学生均被利用夜间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杀害了。黄埔军校从此也就起了质的变化,变为蒋介石个人培养走卒的场所了。

## 九六公債發給利息的一段公案

周 士 觀

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曾以鹽余作担保，發行各種內外公債。迨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初，公債逐漸增多，已遠遠超過鹽余所能担保的限額。其時外國債權者常常透過海關稅務司，在鹽余交還政府之前，即直接將利息扣還。但實際交到政府之鹽余，每月不過一百一十萬元，此與每月償付七百萬元利息之數，相差懸殊。於是國內債權者，組成一個鹽余債權團，並提出兩項意見：一、政府對以後的任何借款，均不得以鹽余作担保；二、發行一種長期公債，用鹽余担保，旨在用以清償以前各項借款。是時，梁士詒任國務總理，張弧為財政總長，梁、張根據鹽余債權團的意見，並因得到華盛頓會議關於值百抽五稅則改良議案的消息，認為海關將有較多收入，遂決定發行九千六百萬元的國內公債，此即所謂“九六公債”的由來。但九六公債僅第一年付過利息一次，以後即無力付息。

張作霖就任陸海軍大元帥後（一九二七年），任命潘復為財政總長。潘企圖以整理九六公債，一顯身手，因於就職之前，通過顧維鈞，在天津邀宴海關總稅務司英人安格聯，並要求安格聯撥給一筆款項，作為九六公債付息之用；安格聯允於潘到任之後三日，在北京付款。當時潘、顧兩人喜出望外，在客人尚未送走之時，即用電話通知素有聯繫的人士，急速購買九六公債，希圖趁機獲取暴利。因此，九六公債在五天以內，即從二十幾元漲到五十幾元接近六十元大關，一時形成搶購現象。誰知大家正在購進時，安格聯卻大量拋出。及潘復接事後三日，安格聯竟自食其言，通知潘復，謂鹽余

項下，所余无几，无款可拨，关税增收问题，尚无把握，须到年关方能一笔整付云云。由于安格联玩弄一套欺騙手段，致使购进九六公債者都蒙受极大損失，安格联本人則大发其財。結果九六公債一直跌到十几元，成为廢紙。

## 一九三〇年閻錫山反蔣的一个起因

南 桂 馨

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在河南揭反蔣旗帜，閻錫山忌唐不与己合，因出兵断唐之后。唐部腹背受敌，节节潰敗。当时我随閻同至郑州，住在火車中，看見韓复榘带来卫队特多，似有非常举动，劝閻北返，免遭暗算，閻未介意。当晚，方本仁、何成濬、韓复榘等会商扣閻，事被王金鈺聞知，急来告閻，閻乃同赵戴文、孔繁蔚和我，星夜微服，乘一小火車头逃至新乡。此为一九三〇年，閻錫山联合馮玉祥、李宗仁等爆发反蔣战争的原因之一。

## 回憶張家口抗日同盟軍

魏 自 愚

一九三三年春馮玉祥在張家口树立抗日同盟軍旗帜，我因抗日心切，遂前往参加。参加抗日同盟軍的部队来自全国各地，成份相当复杂，因而思想意志都不一致。彼此之間缺乏合作誠意，各有打算，互相猜疑。馮玉祥本人气量相当狹隘，对非自己的旧部不大信任，他的左右都是原西北軍的旧屬。在政治宣传方面虽号召抗日，实际缺乏中心的思想主张，搖摆不定。



馮玉祥疑惑鄧文與何應欽有勾搭(有無勾搭我不知道實情),在黑夜派人把鄧文殺死在妓院中。當時在各方面影響極壞,更加深了上下彼此之間的顧忌猜疑,互相防備,內部頓呈解体狀態。

孫殿英率部西移之後,何應欽派宋哲元瓦解了抗日同盟軍。馮玉祥離張家口的前日傍晚,我去土爾溝總司令部找負責人,一個也找不見,只見捆好的舖蓋卷不少,也詢問不出真相。第二天早三四點鐘發現宋哲元的部隊已進入張家口市,到處搜捕同盟軍的人,對零星部隊包圍繳械。經了解始知馮玉祥於前夜已隨宋哲元離張他去。馮走時很少人知,對部隊毫無善後安置,因而同盟軍陷於混亂狀態,各自驚逃,互不相顧。我率部退至張北縣,方振武、吉鴻昌、張慕陶都在張北,由方、吉召集開會研究對策。在會上張慕陶力主進攻平津,並說在平津一帶已連絡好東北軍十餘萬人,立可響應。有一部分人主張和傅作義聯繫,經綏遠退至寧夏,驅逐馬鴻逵,再圖反攻(我屬於這一主張)。張慕陶說:“現往西北,都將凍死,還是以進攻平津為上策。”方、吉同意了張慕陶的主張,決定進攻平津,遂告失敗。

## 李 生 達 之 死

王 尊 光

一九三四年夏,閻錫山應蔣介石之命,派其師長李生達率所部三個旅并附周原健一個旅前往江西,參加“剿共”。蔣介石通過孔祥熙及CC頭子苗培成从中拉攏,除以大量金錢給李外(據李的副官長李維嶽說蔣給李一百萬元),并先後昇李以第十九軍軍長、國民党中央候補委員、安徽省政府主席等官職。

蒋介石对李生达的收买，大为閻錫山所不滿。翌年夏，李尚未就任安徽主席以前，經閻錫山的坚决要求，蒋介石不能不令李仍率部返晉。一九三六年春，閻錫山截获蔣致李亲譯密电一份，經其电务处处員任楚卿譯出，蔣电大意是令李在“剿共”期間，配合关麟徵、商震作倒閻之內应。因此，閻乃决心殺李，以除內患。李生达的馬弁熊希月，与李妾有私，后李生疑，将其調到部队服务，熊頗怀怨望。閻得此綫索，遂以金錢、官职为餌，使熊殺李，并許于事后将李妾給他。熊于得錢之后，曾給家中汇去两千元，当时人們就怀疑此款之所由来。是年五月二十九日深夜，李正在晉西离石县柳林鎮軍次，熊闖入其臥室将李枪殺。同时，閻預先准备有人，當場殺死熊希月以灭口，对外宣传則是熊以逃避不及，举枪自杀的。

李生达死后，灵柩运回太原北門街私宅，开弔之日，閻及太原軍政官員均前往致祭。傍晚，灵堂忽然起火，势极凶猛，在人們搶出李的灵柩之后，发现李妾被燃烧的花圈套住脖子，尚在掙扎，李妾所生两个幼子，均死于火中。李妾伤势严重，次日亦死于医院。

熊希月的胞兄熊希軒，任晉阳日报訪員，知閻錫山收买乃弟經過，在熊希月被杀后，拟向閻質問，被太原公安局扣押。一年后始被勒令回朔县原籍居住，并对乃弟殺李內幕，严飭不得对外洩露。

## 关于《蒋介石解决龍云的經過》的一些补充

宋 希 濂

杜聿明写了一篇《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經過》，現就我个人亲身見聞与此有关的一些事实补充如下：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我被派为第十一集团軍总司令兼昆明防

守司令；当时蔣介石对我說：“你到昆明后，首先要了解云南的情况，搞清楚昆明附近的地形，对各重要据点要确实控制，随时提高警惕，并与王叔銘（王当时任駐昆明的空軍司令兼空軍学校教育长）密切联系。”

次年二月，蔣介石偕宋美齡到昆明，当晚住在黑龙潭的一栋公館里；第二天一大早移住安宁温泉（距昆明四十余公里），他叫我立刻派一营人前往担任警卫。第三天蔣介石、宋美齡約我同我爱人到安宁温泉吃午飯；我們到达时，蔣外出散步，宋美齡对我說：“你們校长来到昆明的那天晚上，一夜沒有睡。那栋房子黑黝黝的，烏鴉乱啼，警卫部队又不是中央的，你們校长自西安事变后警惕性很高，所以那天夜里很焦急。来到温泉后，因为你派了部队担任警戒，他很高兴。昨天下午我和你們校长出去散步，有一个哨兵向他敬礼，他問那个哨兵来干什么，哨兵回答說是来保护委員长的，他高兴极了。”

不久，蔣介石訪問印度回来，又在昆明住了几天。有一次，他集合駐云南各部团长以上軍官講話，時間是上午九时，地点在西門外农业專門学校。那天早晨七点多鐘，他把我和七十一軍軍长鍾彬找去，叫鍾彬和各师副师长都不要参加集会，并叫各团的副团长呆在团部，要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但不要泄露。当天下午五时，蔣找我和关麟征去講話，他要我們把所知道的云南情况、龙云的态度及其左右的重要人物和这些人平日的态度，向他詳細报告；最后囑咐我們多和龙云左右的人接近，随时注意他們的言論，但不要让他们們觉察。晚上九时，蔣又把我找去，叫我过几天到西昌，了解刘文輝在那里駐有多少队伍以及西康和云南之間的联系情况。蔣在第二天上午飞回重庆。我随即飞往西昌，并将了解到的龙云和刘

文輝所屬部队的駐地及其他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亲往重庆交给蔣的侍从秘书肖自誠。次日蔣召見我，要我一两天回昆明，注意防范，并实行控制昆明附近各重要据点。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蔣、龙之間早已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早在一九四二年蔣就有了解决龙云和刘文輝的动机。

##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

王 化 一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淪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三十万人上下,活动地区几遍于全东北。东北义勇军的兴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并且及时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树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因此,东北义勇军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重视和赞扬。当时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之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之下,在装备、训练各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势之下,东北义勇军不顾一切,揭竿而起,以血肉和敌人相拼,这种民族正气,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敬佩的。

但是,无可讳言,东北义勇军也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其中主要的是:它的领导人物大多数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之间派别繁多,非但不能团结一致,而且意见分歧,甚至往往互相火并;他们所率领的部队成分复杂,有的纪律很坏,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这样,他们就不但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务,而且严重地危害群众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广大群众支持义勇军的积极性。

由于东北义勇军存在着这些弱点,他们虽然在东北淪陷初期

曾經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并且予日寇以相当的打击；但是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为时年余，便陷于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有些领导人物如丁超、程志远、王之佑等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变节降敌。

东北义勇军从兴起到失败，其间过程虽然不长，但是它的面既甚广，系统又多，变化起落也很复杂。我当时虽然参加过一部分义勇军的组织工作，对于全部情况也并不完全清楚，况且已事隔三十年，现在要把它的全过程作一个全面的追述，是相当困难的。下面所写的内容，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希望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加以指正。

东北义勇军是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作为义勇军的基础的旧军队，原来都是东北军的正规部队，它们抗击日寇的举动不仅是自发的，而且也是同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反的。同时，这些部队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又收纳了大量的民间武装力量和各阶层的抗日群众。因此，这些部队虽然有一部分仍然保持着正规军的番号，但是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统率之下的正规部队，而成为一支以旧的正规军为基础、包括民间武装力量和抗日群众参加在内的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了。

如果从义勇军各部分的成分来看，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旧军官、收编的胡匪、农民的秘密会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一）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

1. 馬占山部: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所率领的黑龙江省防軍,計有步兵第一旅孙鴻裕团、第二旅吳德林团、第三旅李青山团,騎兵第一旅(旅长吳松林)、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后投敌),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炮兵团(团长朴炳珊),此外还有一个保安大队和屯垦軍一个旅(旅长苑崇谷)。馬占山一度投降日寇后,他在抗日基础上团结起来的黑省軍隊从此瓦解。他再度抗日时所能統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长的步兵第三旅和吳松林旅扩編的邓文、才鴻猷、邵斌山等部以及徐子鶴的山林队和收編的胡匪李海青等部义勇軍,其余黑省部队都不再听他指揮。他自始至終,都用黑龙江省主席名义指揮軍隊。

2. 丁超、李杜部:丁、李所领导的东北軍,是駐吉步兵第二十八旅(丁兼旅长)、第二十四旅(李兼旅长)、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和山林警备队三个营。他們抗日时,吸收了其他部分潰敗的吉林省軍隊和一部分义勇軍,与馮占海等部会同商定称为“吉林自卫軍”。

3. 苏炳文部:苏所率领抗日的部队,为黑龙江省防軍步兵第一旅(苏自兼旅长)和张殿九步兵第二旅张玉珽团,还吸收了一部分旧黑龙江軍的殘部如朴炳珊、徐宝珍等部,称为“东北民众救国軍”。

4. 馮占海部:馮所领导的是吉林卫队团全部和张作舟第二十五旅的两个团及临时招降胡匪編成的宮长海、姚秉乾两个旅,会合丁超、李杜、赵毅等部并称“吉林自卫軍”,并曾接受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所給的东北义勇軍第六軍团的名义。

5. 唐聚五部:唐原来是辽宁省东边鎮守使于芷山(当时投敌)所兼步兵旅的第三团团长,抗日时先后組織了各县警察大队、义勇軍、紅枪会、大刀会等,称为“辽宁自卫軍”,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

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后来又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

6. 王德林部:王原来是吉兴部东北军步第二十七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率部参加抗日后会吸收了延边一带的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先称为“国民救国军”,后来参加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

7. 警察大队:沈阳被日军占领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并在撤退途中收集了北宁铁路附近的警察人员,进行抗日。东边桓仁县警察大队长张宗周、柳河县警察大队长王凤阁、凤城县警察大队长郭景珊、复县警察大队长刘景文等各率领其全部或一部分警察大队,参加抗日。

(二)旧军政人员: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有不少旧军官如彭振国、李纯华、于百恩、郑桂林、贾秉彝、康悦臣、严经武等,有的已经退伍,有的在军事机关挂个空名义,也有的是现役军官。他们在事变以后,纷纷参加到各部队抗日。因为他们多数是陆大、保定或东北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具有军事知识,所以大都在各部队中担任领导和参谋工作。此外,当时各部队还有一些政府官吏参加,他们多数在各义勇军总部工作。唐聚五部起义时,桓仁附近几个县的县长也都参加了自卫军,但以后多数中途变节投敌。

(三)收编的胡匪:东北历来素以胡匪著称,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多数是积年惯匪。九一八事变以前,有的正在拉竿(组织匪帮),有的被关在狱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已经地



方当局招降(如宮长海、姚秉乾)。事变以后,各地統治机构垮台,社会秩序混乱,乘机而起、临时报山头者更风起云涌,紛紛受各部队收編,参加抗日。

(四)农民的秘密会社: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紅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的农民出关謀生,也发展到东北各地。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地农民在日寇蹂躪之下,无法从事耕种,一經号召,这些秘密組織便迅速发展起来,加入各部义勇軍。吉林省敦化、延吉、东宁、海林、珠河,辽宁省东边一带的通化、桓仁、新宾等地,这一部分民間武力最为活跃。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軍中,以这一部分人数为最多。

(五)青年学生和知識分子:事变以后,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各抗日队伍之外,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軍,而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訓練班(如学生軍)的东北籍学生为最多。此外,何香凝先生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錦西前綫的工作。又如国民党中央軍校有学生四十多人憤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事变以后,代表救国会出关工作的人員,如車向忱去黑龙江,徐靖远去吉林,黄宇宙去辽东,苗可秀去三角地带,宋黎、张希尧(宋、张等系中共黨員)、张雅軒等去沈阳和辽西各地,都是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对各部义勇軍起了宣传、推动和組織作用。在辽东惨遭日寇集体屠殺的救国会分会人員,也多数是知識分子。

## 二

东北义勇軍在領導关系上各有系統,互不相下。大体上有三

个系統，即：东北軍系統，救国会系統和后援会系統：

1. 东北軍系統：馬占山、李杜、馮占海、苏炳文等义勇軍將領，原来都是东北軍正規軍隊的軍官。在事变以前，他們从“正統”观念出发，认为既受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的委任和领导，就必须事事听命于蒋介石和张学良；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他們，不准抵抗日軍，他們便遵命退让。在事变以后，他們激于爱国热情并在广大羣众和爱国官兵抗日浪潮的冲击下，起而抗日，但是他們受到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对于抗日仍然是动摇的、沒有信心的。因此，蒋介石說要运用外交，依靠国联，他們就相信这种欺騙宣传，松懈抗日的斗志，等候国联制裁日寇。蒋介石要反苏反共，他們有的便拒絕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有的拒絕共产党人参加工作，甚至有的有时遇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打。当苏炳文在苏联的援助下，最后率部退入苏联、駐在沃木斯克的时候，苏联希望他的官兵就地参加劳动，苏推說“容后再議”，加以拒絕（見苏炳文的秘书长賀圣达給国内的“支电”，載一九三三年一月某日的《大公报》），因为他唯恐这样作法将会得罪于蒋介石。最后这些將領还是多数投靠了蒋介石。

馬、李、苏、馮各部，都有国民党东北各省党部的分子如王宪章、吳煥章、韓春萱、韓清伦、赵在田、王育文等在各部队进行活动。他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各义勇軍將領同共产党接近，防止他們脱离国民党的领导。

2. 救国会系統：救国会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平成立后，即着手将辽宁义勇軍划分为五个軍区：辽西为第一軍区，辽南、辽东、辽北、热边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軍区；并委任了五十二路司令和二十七个支队长，还派出了七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員到

各部队去进行宣传和組織工作。救国会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为止援助义勇軍的款項共用了卅八万七千余元。

辽宁境内各部义勇軍,經過救国会的組織和领导,在名义上和編制上虽然統一起来了,但是由于救国会的成員很复杂,既有共产党地下黨員、进步青年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也有国民党CC派、国家主义青年党、国民党改組派等反动党派分子,因而在对义勇軍的领导工作上就一直存在着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国民党CC派由于自己单独号召不起来,他們就打着救国会的招牌向义勇軍勾結拉攏,暗地里搞小組織。金子明、石盘(解放后已被鎮压)是公开的CC派,他們又暗中拉攏王全一、王显庭等自成一系。

青年党(全称是国家主义青年党,又被称为国家主义派)是一个法西斯政治組織,在当时很活跃。他們在后方打入了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吸收青年学生,拉攏重要職員;在前方滲入各部队,并且自己組織武装。他們的政治負責人霍郁文和軍事負責人王慎庐常到前方去发展組織,很多政工人員如高鵬、紀廷榭等被拉入了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骨干分子苗可秀、赵侗等在三角地带自己組織鉄血軍,并发表反苏反共言論。

3. 后援会系統:朱庆澜于事变后經上海各有关团体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以历年办賑有关的救济团体和个人为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五月組織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后来与救国会合作,于同年九月改組了救国会的各軍区。不久以后,后援会受国民党压迫,宣告結束,因而它在后期义勇軍的领导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它对义勇軍的援助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上述三个系統之外,国民党改組派朱霽青在一九三二年曾亲自到过錦西、义县一带,召集他的家乡中的一批人組成“辽吉

黑民众救国軍”，并向救国会系統內的义勇軍进行拉攏。他本想独树一帜，但为时不久，便告結束，影响也很小。

这里，还須說明一下东北义勇軍和张学良的关系。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奉行蔣介石的命令也为了保存实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他在东北淪陷以后，受到輿論严厉的譴責，不能不感到內疚，何况日寇是他的杀父之仇，因此他对抗日的东北义勇軍不仅表示同情，而且极力予以支持。但是他又不敢采取公开的行动来支持义勇軍，因为他既怕被日寇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蔣介石的不滿。因此，他对义勇軍的支持，都是秘密地在各种名义的掩盖下暗中进行的。例如：他利用救国会名义的掩护，曾拨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現款，交由救国会轉发給义勇軍。他曾用发行爱国奖券等方式給救国会以种种协助。他曾不断地用白綢条写成祕密手諭，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义勇軍將領到北平，他都随时接見，慰勉有加。张学良就是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暗中支持义勇軍的。

### 三

东北义勇軍的活动，除已有其他同志专篇紀述外，茲再概述如下：

#### (一)黑龙江、吉林各部

1. 馬占山部：在馬占山未到龙江就任黑省代理主席以前，謝珂等黑省爱国官兵已在江桥南端击退了张海鵬伪軍的进攻。馬占山到龙江以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旬在江桥附近予进犯的日軍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举世知名。日寇不甘挫敗，随即大举进攻，龙江被占。馬率部退往海伦后，思想动摇，汉奸复乘机引誘，遂至变节投敌，重返龙江。后来在国联調查团到来之际，馬又出走黑河，重揭

抗日旗帜，并率部东下。日寇派松木师团主力跟踪追击，广瀨师团封锁两江，并以飞机沿途轰炸。馬率部边战边走，七月下旬在刘家店附近遭到日軍平賀、平松两旅团的袭击，全軍潰敗。馬偕数十人遁入深山密林，經龍門鎮繞道前往海拉尔与苏炳文会合，退入苏联。其殘部則由邵斌山、邓文、檀自新等率領，穿越中东路，經肇东、大賚、开通、瞻榆等地退入热河，由国民党政府北平軍分会收編。

馬部吸收的义勇軍以李海青部人数最多。李部以扶余、肇州、肇东、兰西各县为其活动地区，曾袭击过农安、安达、昂昂溪等地，但因系烏合之众，战斗力很弱，往往日軍一来，即紛紛潰逃。

2. 馮占海部：吉林淪陷后，馮率部北上，并在途中吸收了宮長海、姚秉乾等部义勇軍，日寇派于琛徽部尾追。馮部先后在榆树、拉林等地作战后，于一九三二年初撤至蜚克图一带休整，会合丁、李等部，参加了哈尔滨的保卫战。哈尔滨失陷后，馮拟率部反攻吉林，在团山子和伪軍遭遇，激战后轉向方正县退却。当时由哈尔滨撤退的邢占清旅山林警备队和其他殘部均結集于方正附近，敌人遂分路围攻，企图一网打尽，与馮、邢各部在桶子沟、会发恆、夹信子、宝兴隆各地发生激战。各部奋勇抵抗，牺牲惨重。邢部退往依兰，追随丁、李；馮到大勒勒密一带整理，从此和自卫軍失去联系。一九三二年四月到十二月中間，敌軍以全力对付馬、李、苏各部，馮部轉战榆树、五常、农安、长岭、瞻榆各地，于十一月到达热河，經朱庆瀾委以东北义勇軍第六軍团番号，同时經国民党政府北平軍分会收編为六十三軍。

3. 丁超、李杜部：吉林淪陷后，丁超、李杜两人虽未附逆，也未討逆；敌伪派汉奸孙其昌等多次向他們誘降，他們也不断派人到吉林省城探听情况。当时哈尔滨在敌軍主力未到之前，成为三不管

現象(張景惠無實力,李振聲僅有虛名,丁超人懦弱無能),又是富庶之區,因而成為漢奸、野心家爭奪目標。李杜和馮占海在蜚克圖會商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乘機進占哈市。丁超經王之佑撮合,同李杜合作,趙毅在雙城護路,距哈很近,也與李、丁、馮聯合一起,共同成立“吉林自衛軍”,推李杜為總司令,馮占海為副總司令兼右路總指揮,丁超為護路總司令,王之佑為前敵總指揮,趙毅為左路總指揮,李杜(兼)、邢占清為中路總指揮。計劃防守哈爾濱市,驅逐漢奸謝介石,並約請馬占山合作,派兵增援。敵人以多門師團為主力大舉攻哈,經二月四、五兩日戰鬥,各部不支,相繼撤退,丁、李退到依蘭。這時松花江下游和吉敦路左右,義勇軍、大刀會、紅槍會風起雲湧,都和自衛軍發生聯繫,其中以王德林部最為活躍,在綏芬的東北軍第二十七旅張治邦團也響應起義。敵人以廣瀨師團進迫依蘭,五月十七日丁、李由依蘭撤向勃力;以後轉戰于哈綏綏東段。敵人松木師團於五月下旬到海林,在牡丹江地區寧安、一面坡、烏吉密一帶布置,切斷丁、李和王德林各部聯繫。丁超中途變節,在寶清投敵,自衛軍士氣大為渙散。一九三二年冬,敵人於結束對蘇炳文部攻擊後,又抽回騎炮空各有力部隊,加入對李、王各部的戰鬥。一九三三年一月敵人一路沿穆稜河向虎林、密山追擊,一路由綏芬河進軍,占領八面通、東寧各地,在小綏芬河將劉萬奎部包圍,劉部繳械投降。至此,吉林自衛軍大部分被消滅,李杜率三千多人退入蘇境。

王德林率孔宪榮、王玉振、吳義臣、陳玉清等,配合紅槍會、大刀會,共約五六千人,出沒于寧安、海林、延吉、和龍、汪清各縣,給敵人以極大威脅,東寧戰後,也退入蘇境。

4. 蘇炳文部: 由於吉、黑各部義勇軍將領不能團結一致、合力

抗敌，日寇乘机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实行各个击破：一九三二年四月間击潰了丁超、李杜、馮占海各部主力，五月到七月解决了馬占山部队，十月里“扫蕩”我辽宁东边各部，追击丁、李殘部并消灭了王德林部。至此，所剩下的只有哈滿綫上的苏炳文一部了。日寇派松木师团駐齐齐哈尔，在十月开始对苏用兵。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帶領的步兵第一旅、张殿九步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約計一万二三千人。日、伪进攻之前，先派馮广有接收张旅，苏、张不同意，又拟調张旅离开苏炳文范围去安达，形势越逼越紧。在羣众和部下的督促之下，苏炳文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发出通电，成立“东北民众救国軍”，宣言抗日。敌人用对付馬占山方式来对付苏：先由敌軍參謀长小磯要求会晤进行利誘，經苏拒絕；繼之，松木师团长发出布告，威胁苏炳文說，如不投降，将以空軍轰炸札兰屯、博克图、海拉尔、滿洲里各車站。

敌軍进攻开始后，朴炳珊先在泰安鎮地区和敌人发生战斗。敌以一部压迫富拉尔基的张旅，另以騎炮步兵由鉄路两侧直扑札兰屯(苏軍前方指揮部)，切断哈滿綫苏軍的联络，并以飞机沿綫轰炸。苏炳文率眷属、士兵四千余人于十二月四日退出国境。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珽、邵斌山等率領，穿越兴安岭經蒙古草地进入热河。

## (二) 辽宁各部：

1. 辽西(救国会第一軍区范围内)：九一八事变后，辽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队，沿鉄路向錦州且战且退。黄在沿途以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組織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編胡匪，組織义勇軍，并扑灭张学成部伪軍。黄在撤退到錦州的途中，即和救国会联合动作。以后郑

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繼周、赵殿良各部在綏中、北鎮、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紛起抗敌。日寇进攻錦州和榆关时，他們都配合正規軍，或多或少起了牵制敌軍的作用。国联調查团出关时，他們和各軍区一道接受救国会命令，发动总攻，破坏鉄路交通，对敌軍进行扰乱。他們所在地区因为距北平較近，得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員协助也較方便。他們之中以郑桂林部成績較好，支持較久，但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热河战事結束以后，各部都次第潰散。

2. 辽南(救国会第二軍区范围内)：这一地区义勇軍的实际力量最大不超过一万人。事变不久，汉奸凌印清偕敌特仓岡和日伪軍队数十人，到盘山县沙岭鎮去招降辽南胡匪項青山、张海天，全部被項等誘杀。接着李純华、邓鉄梅、苗可秀、刘景文等在辽阳、海城、营口、盘山、盖平、复县、辽中各地，紛紛組成抗日部队，与救国会联系。这一部分义勇軍在南滿一带，多次拆毀鉄道，破坏交通，曾顛复敌寇兵車，攻占首山車站，燒毀海城大矢組敌軍軍草，在关门山击毙敌軍支队长成泽直亮。邓鉄梅、苗可秀在黄花甸子、尖山窩、龙王庙三角地段活动最久(苗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予敌伪扰害也最大。以后邓被敌人捕去杀害，苗亦被俘壮烈牺牲。

救国会曾拨付第二軍区大批炸药、迫击炮、輕重机枪、电台等，由海上以木船运抵安东边境登陆，辽南各部队力量得以充实壮大，引起了日寇注意。日寇在解决馬、苏各部以后，于一九三二年年底抽調多門、坂本、西义一等师团主力合以守备队、伪靖安游击队深入辽南各地，瘋狂进攻。各部队立足不住，步兵化整为零，潛伏各地，騎兵則由李純华率領，寻隙穿越辽西到达热河后(邓、苗原地应战，未来热)，适值热河抗战发生，他們参加了建平、赤峯各地战



斗,王子丰副司令負伤,部分潰散。他們又被何应欽派黎明前往分化,脫离了救国会。李純华和孙殿英合流西退,到宁夏为国民党收編,所余不足千人。

3. 辽东:一九三二年初救国会派工作同志黃宇宙去东北,歷經沈阳、开原、鉄岭、清源、撫順、新宾、海龙、撫松、长白、輯安,临江、寬甸、桓仁各县,前后凡三次,以于芷山所部三个团为目标,进行策反,兼发动各县爱国志士,历尽艰险,几丧生命。当时唐聚五表示同情,但无决心。东边各县知識分子王育文、邹心达、包景华、英若愚、刘克俭等适亦在各县鼓动抗日,聯絡新宾警察大队长郭景珊、桓仁警察大队长兼五县剿匪司令张宗周、通化警察队孙秀岩等共同向唐会商起义。正值黃宇宙第三次到桓仁,带去救国会第三軍区委任状,并传达国内外对抗日的一切情况,于是决定先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推唐聚五、黃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为常委,在委员会下設政治、軍事两委员会,在軍委会內成立辽宁民众自卫軍总司令部,推唐为总司令,张宗周、孙秀岩,郭景珊、王凤閣、李春潤、唐玉振为各路总指揮,王育文为政治部委员长。四月廿一日在桓仁师范学校开抗日誓师大会,軍民参加者万余人,朝鮮爱国人士很多参加,当即分头向各县宣传聯絡,声势所及,人心振奋,各县紛紛响应,大刀会、紅枪会等均起而合作。其时敌伪主力正忙于应付吉、黑各部义勇軍,命于芷山、邵本良、王殿忠、姜全我等伪靖安游击队分头向我軍进攻。孙秀岩首向通化围击日警,逼走日領事。廖逆弼臣(于部团长)伪降,乘机逃走。接着李春潤在新宾(李三次攻守新宾,裹創血战,异常英勇),王凤閣在輝南、柳河,唐玉振、张宗周在寬甸,郭景珊在輯安、临江等地,分別和敌伪对抗,前后达八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唐部开办小兵工厂,发行軍用票,

但困难重重，救国会八月十日派康悦臣、石培基、秦喜霖携款万元前往慰劳，并协助工作。

日寇于十月初由吉、黑抽回兵力，向东边总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同时由朝鲜江岸攻向辑安、临江，配以大量飞机轰炸。我各路部队，节节溃退。十五日总部退撫松，廿六日唐聚五化装去平，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一九三三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新宾。

辽北、热边、吉西各部，属于救国会第四、第五两军区范围，有宋国荣、金山好、包善一、魏国昌、吴家兴各路义勇军，他们在抗敌伪政权秩序上，都起了一些作用。

当时东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批为地主豪绅所掌握的所谓民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如辽阳刘仁堡民团、辽中北大台、铁岭大团等等。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实际上与敌伪沆瀣一气，为虎作倀；见日军就开门欢迎，见抗日军就闭门不纳，甚至加以袭击。他们都是东北人民的死敌。

东北义勇军在抗战期间，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全国报纸刊物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国内外各阶层人民源源不断地捐助大批的物资和款项。东北当地人民更为支持义勇军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桥抗战时期，群众自动帮助马占山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昂昂溪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哈尔滨保卫战发生后，哈市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苏炳文在海满宣布抗日，札赉诺尔矿工立即自动捐献工资，以助军餉；满洲里召开市民大会，附近各县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尔举行会

議，表示支持。各地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各部义勇軍，直接拿起武器抗击敌寇的，更难以胜数。这些事实，都充分表示东北和全国各地人民对义勇軍的抗战所給予的巨大支持。

#### 四

东北义勇軍兴起之时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最高时（一九三二年夏）达三十万人上下，乃一經敌人进攻，便节节潰敗。到一九三三年初，义勇軍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敌軍消灭，殘灭部分如李春潤、邓鉄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后，也完全被消灭。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对于东北武装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还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軍的保甲連坐、經濟封鎖、“三光”政策等殘酷手段，而且当时在东北各战場活动的敌軍也只有多門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广瀨第十师团、松本第十四师团以及鉄道守备队等，經常参加作战的兵力不过三万人；日寇所利用的伪軍也不足三万人。敌我兵力相比，固然装备訓練我不如敌，而我在数量上則超过敌人两倍以上，主客形势和地理条件又都对我有利。乃仅历时年余，三十万人的武装力量竟全部失敗。其主要原因約不外下列三点：

首先，东北义勇軍是以旧軍队为基础所組成的自发武装抗日力量，领导各部义勇軍的都是一些旧軍官，他們虽然在东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为形势所迫，起而抗战，但是他們在政治上大多数是落后的，他們对于抗日救国并没有信心。他們虽然一面抗战，但是一面仍然希望保存实力，靜候国联制裁日寇。馬占山通电曾說：“明知勢孤力薄，难支大厦”；苏炳文通电也說：“倘再坚持，势将同归于尽”。这些话都表明他們的抗日思想是动摇的。各部

之間，彼此觀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于“徒損實力，無濟于事”的保存實力的想法在作祟。他們的思想既然沒有武裝起來，他們的軍事行動就不可能有政治靈魂，從而他們一遇到困難挫折，自然就不能堅持下去，甚至有人變節投降，作了漢奸。

義勇軍的將領們因為在政治上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他們在軍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們在當時環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規，套用正規軍的陣地戰的戰略戰術，不知採取游擊戰爭。因此，他們作戰時，一經敵軍迂回抄襲，頓即陷于包圍，全綫潰敗。江橋戰役和海滿抗戰的失敗，即其顯例。至于收編的胡匪，則在對敵作戰時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慣技，更無戰略戰術之可言了。

其次，脫離羣眾也是東北義勇軍遭致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它是以舊軍隊為基礎和大量收編胡匪所組成的，雖然也有不少農民和各階層抗日羣眾參加，但是它在本質上並不是人民的武裝。一方面它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因此，它也就不能聯繫羣眾、依靠羣眾，甚至还脫離羣眾。

東北義勇軍各部往往濫發空白委任狀，濫收胡匪；有的委任貪官污吏，縱使搜刮人民，借機發財；還有部分軍隊紀律很壞，尤為東北人民所不滿。舊奉軍原來的紀律本已不夠好，時有擾民情況，但是多少還能保持舊軍隊的紀律；至于收編的胡匪，更是紀律蕩然了。例如李海青部進入大賚縣城時，將商店搶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櫃，把農民的馬匹全部牽走，見着行人就強換鞋帽，拿不走的東西丟棄滿街，甚至還有強拉青年婦女成婚之事。後援會委任的義勇軍司令武中原不去東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門外旅館大賣委任狀斂財。甚至還有義勇軍到北平後，竟有在北新橋、東城一帶進行搶劫的。因此，許多地方的羣眾，往往一聽到義勇軍要來，便堅壁清野，

逃避一空。象这样严重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队伍，怎么能不失败呢？

最后，各部义勇军互相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冲突，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失败因素。江桥之战，丁、李、冯各部按兵不动；及至丁、李、冯在哈尔滨和敌伪发生战斗，马也坐视不救。最后到苏炳文抗日的时候，已成了孤军奋斗的局面了。而吉林的义勇军刘万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长马宪章击毙，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宪荣不和，唐聚五和东边的将领闹意见，到北平后还公开地互相攻讦。辽南、辽西各部亦有自相火并、大鱼吃小鱼的互相残杀行动。

除了上述原因外，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当时国民党政府如能出兵东北，坚决抗战，这三十万抗日部队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结果当不至如此。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虽然很快地失败了，但当时参加义勇军的广大将士的爱国热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在抗日战斗中牺牲了的烈士们更是永远受到中国人民歌颂的。同时，他们的失败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坚持东北十四年的抗日斗争及以后八年的全民抗日战争提供了经验。因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的抗日事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分别加以整理，既要肯定他们的成绩，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作为信史存入我们伟大祖国的史册。

## 东北抗日軍进入新疆后十年中的遭遇

張 鳳 儀

东北吉、黑两省的抗日軍，于一九三三年初在日本侵华关东軍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与李杜、馬占山等將領失去联系；經過多方面的探听，并派入到苏联国境联系，始悉他們已进入苏联国境。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軍的將士們在东北人民大力支持下，历尽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同殘暴的日寇进行了英勇頑強的斗争；而李杜、馬占山等將領竟不作任何布置安排，貿然进入苏境，这对抗日軍的士气起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在敌人強大兵力围攻夹击、弹尽援絕的情况下，抗日軍内部产生了动摇和分裂現象。除了有一部分化成小股，分散开来繼續打游击，并于一九三四年併入李延祿所領導的抗日联軍以外，其余大部分抗日軍都陸續进入苏境。

抗日軍进入苏联后，即向苏方当局要求晤見李、馬等將領，但据苏方派来代表說，李杜、馬占山、苏炳文、王德林等均已乘飞机去上海。全体將士对李、馬等这种抛弃抗日軍于不顧的行动甚表不滿，并提出仍从原道回国繼續抗日的要求。經苏方解释，这样作法对双方都不利，只有等候中国政府安排，叫大家安心休息。以后抗日軍又曾多次請苏方轉达早日回国繼續抗日的請求，終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盼到回国的消息。全体將士乃由伯力分乘火車經西伯利

亞、赤塔、伊爾庫次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等地，在阿亞古斯下了火車，換乘汽車到達中國的新疆塔城。進入蘇境的抗日軍，除傷病員暫留蘇境各醫院治療外，全部由蘇方分八批交新疆塔城地方政府接收。

抗日軍和隨軍家屬在蘇境內停留休息期間，受到蘇聯政府的關懷及工作人員的熱情照顧。尤其是傷病員在蘇聯醫護人員的細心治療和看護下都很快地恢復了健康，陸續回到國內。這是抗日軍全體將士對蘇聯政府和人民永遠不能忘懷的。

一九三三年夏季，第一批由蘇聯回國的抗日軍由黑龍江省抗日救國軍十五旅旅長鄭潤成率領，到達新疆的省會迪化（即現在的烏魯木齊）。先後由蘇聯假道進入新疆的抗日軍共計八批，包括家屬在內，總計約三萬人。其中除吉林抗日自衛軍廿六旅由旅長王孝芝率領到達伊犁外，其餘均進入迪化、昌吉、呼圖壁、綏來一帶，擬稍事休息即續行東進入關，繼續抗日。這是當時全體抗日軍的一致要求和願望。

## 二

當抗日軍第一批進入新疆的省會迪化時，正值新疆爆發了“四一二政變”。

原來新疆省主席兼新疆邊防督辦金樹仁，自一九二八年盜取了新疆的統治權後，對新疆各民族的壓迫、剝削、欺騙和奴役，以及政治的腐敗貪污，較前更為猛烈。金樹仁所援引的河州同鄉和親信黨羽驕橫跋扈，助桀為虐。當時新疆各民族人民形容金的這些爪牙說：“早晨學會河州話，晚上就把洋刀跨”；又說：“只要學會河州話，一任縣長滿載歸”。他們強種強占人民土地、霸占強姦維族婦女

等等非法行为，激起新疆地方民族对金树仁政权的反对和仇恨。一九三一年首先在哈密爆发民变，各地相继而起，星火燎原，蔓延于全疆。其中有自发性的农民起义，也有借机企图使新疆脱离中国版图的阴谋活动。如留学土耳其归来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宗教关系，在喀什组织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自称国务总理，拥兵喀什，攻陷阿克苏，占领库车。又如和闐的夏满素尔在英帝国主义者扶植和唆使下，在和闐组织回教国，自称和闐王，盘踞和闐，进攻巴楚，占领莎车。和加尼牙孜与尧乐博斯盘踞哈密，勾结甘肃河西的国民党军卅六师（回民军）马仲英进兵新疆，占领焉耆，随后马仲英又与和加尼牙孜因争夺权利而分裂。这些地方统治者們假借推翻金树仁政权的机会，互相争夺权利，造成新疆各民族互相仇视和残杀。

当时全疆各地除省会以西县城尚在金树仁的控制下以外，南疆、东疆各地县城全部独立，交通电讯完全断绝。金政权的参谋处处长陈中<sup>①</sup>，久蓄取金而代之的野心，在此情况下认为时机已到，就与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迪化县长陶明樾密谋，并联络归化军<sup>②</sup>，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对金树仁实行政变。金树仁毫无捍卫之力，并认为大势已去，乃仓皇携眷出走，经昌吉、塔城假道苏联，逃往内地，结束了他在新疆的反动统治。

这次政变却给盛世才造成夺取新疆统治权的机会，以后他把这次政变叫做“四一二革命”。

---

① 陈中系国民党培植留学苏联，因行动不轨，被苏联驱逐到新疆；后返内地在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要求重返新疆，任金树仁的参谋处处长。

② 苏联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逃到新疆的俄罗斯人（亦称白俄）被金树仁组织起来编为归化军，任巴品古特为指挥。



盛世才是辽宁省开原县人，出生于大地主官僚的家庭，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国民党政府参谋部作战科长。一九三〇年間，金树仁为了巩固其统治政权和镇压新疆人民，物色军事人才，盛世才经人介绍，到达新疆。一九三一年新疆各地人民因不堪金树仁的残酷压榨，发生民变，盛世才乃乘机崛起，成了当时新疆的风云人物，由参谋擢升参谋长；不久又任前敌总指挥，转战各地，颇树战功。盛世才借兵权在握之机，又以新疆地处边陲，就野心勃勃，蓄意伺机当土皇帝。他并大肆拉拢，掌握了当时新疆兵力最强的归化军和部分土著部队，假施宽厚，伪装禁止民族仇杀，骗得了部队与人民的信仰。四一二政变时，握有兵权的伊犁张培元、阿尔泰山的魏振国及西路指挥陈品修等，均距省会迪化遥远，消息迟缓，不能派兵来迪救援。唯盛世才在吐鲁番闻变，星夜兼程，占领迪化近郊“一炮成功”，拥兵观望。发动政变者陈中等鉴于城内秩序紊乱，又以盛世才占领“一炮成功”，拥兵不动，居心叵测，陈中等乃亲临“一炮成功”，请盛进城维持秩序和讨论善后事宜。盛乘机率兵入城，召开临时会议。归化军指挥巴品古特首先提议拥护盛世才为临时督办，刘文龙为临时省主席。另一部分与会者则提议推东北抗日军将领郑润成为临时督办。郑润成当场表示因系客军假道新疆，将转回内地继续抗日，不能接受斯职，要求当局积极协助解决运输给养问题，以便早日东进；他并表示拥护盛为临时督办。陈中等虽有异议，因慑于盛世才兵权在握，亦不得不表示拥护。

### 三

盛世才取得新疆政权未久，马仲英又由甘肃率其卅六师及幕僚张亚灼、刘佛吾、杨波清等，并有土耳其人凯木耳为其参谋长，再

度入新，攻下哈密、木垒县、古城县等重要城市，并继续向迪化方向挺进。盛世才深悉馬仲英精明善战和馬再度入新的动机，又以省方大局未定，情况复杂，乃以緩兵之計通知馬暫停前进，选派各族有名望的人士与馬进行和談。盛主张馬任南疆綏靖总司令，他自任新疆督办，意图与馬平分天下。馬則主张盛为新疆省主席，他为督办，意在图謀独攬兵权。結果双方意見相距太远，和議未成。馬仲英率兵已达孚远与阜康之間，逼近省城。盛世才急邀东北抗日軍协助，并調动归化軍全部迎击馬軍。一九三三年六月間，盛亲自出馬，在紫泥泉子与馬部遭遇。当时正值夜間，驟然风雨交加，馬部前后失掉联络，自相火併。盛乘机反攻，一战而胜。馬放弃了孚远、古城，退至木垒，翻越天山，占領了鄯善、吐魯番就地整訓，待机再战。盛世才于紫泥泉子一役战胜馬仲英，造成他整頓内部的有利机会。那时四一二政变发动者陈中不满于自己的地位，曾假借赴南京报告新疆政变情况的机会，慫恿国民党政府委派黃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国民党政府久欲控制新疆，但又限于力量和条件的不足，为了暂时使新疆造成多角关系，便于操縱，就任命伊犁張培元为国民党的中央第五师师长，命令馬仲英占領南疆，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这样使盛、馬、張的力量互相牽制，他們誰也不能取得新疆整个統治政权，以便将来直接控制全疆。盛世才看透了国民党对新疆的意图，于同年七月利用召开軍事會議机会，先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三人當場逮捕，立即枪决，并宣布三人阴谋罪状，以威胁黃慕松。

盛世才既要独霸新疆当土皇帝，为了巩固其已得的政权，并对付有国民党政府支持、在南疆积极备战的馬仲英，于是伪装进步，与苏联駐新疆領館联系。他提出：（一）澄清吏治，（二）改良司法，

(三)整理財政,(四)實行農村救濟,(五)擴大教育,(六)推行自治,(七)實行民族平等,(八)保障信教自由等施政方針,和反帝、和平、建設三大政策,以後又增加民族平等、清廉、親蘇三項,合為六大政策,要求蘇聯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新疆新政府給以援助。

另一方面盛世才又假借鞏固邊防為名,威脅黃慕松電請國民黨中央將東北抗日軍留在新疆。在七月間,國民黨政府派李杜的副官處長王子耀飛往新疆,宣布東北抗日軍編為新疆部隊。

為了籠絡抗日軍,收買軍心,盛世才曾多次集合抗日軍講話,提出了親蘇反帝、建設西北、收復東北的欺騙口號。當時抗日軍全體將士是受了盛世才的欺騙和蒙蔽的。馬仲英欲戰敗盛世才,奪取新疆的政權,窺悉抗日軍不願久羈新疆,乃與伊犁張培元合謀促使抗日軍早日離開新疆,并向抗日軍表示關於運輸及軍需供應等問題他們願意協助解決。抗日軍將領考慮到馬仲英過去兩度進入新疆,所到之處,漢人受其屠殺,甚為殘酷,此次欲協助抗日軍進關,是否出於真心誠意,殊屬可疑。乃抗日軍將領正在研究考慮之際,被盛世才偵悉,即利用宴會機會,借口與馬仲英在大板城作戰失利,即席將抗日軍將領鄭潤成、楊耀鈞、蘇國、應占斌、楊炳森、李志、徐國光等逮捕,關入監獄,後均於一九三九年左右被秘密處死。鄭潤成系黑龍江省抗日救國軍第十五旅旅長,蘇國系黑龍江省抗日救國軍總部參謀長,楊耀鈞系吉林抗日自衛軍總部參謀長,楊炳森系吉林抗日自衛軍炮兵指揮,李志、徐國光、應占斌等均系吉林抗日自衛軍旅長。

#### 四

馬仲英利用盛世才內部分裂和東北抗日軍軍心不安的機會,

复于一九三三年冬季与伊犁张培元配合向迪化进攻，并包围了迪化。盛世才唯恐抗日軍有变，乃用分散隔离办法，将部分抗日軍調进城里，由归化軍牵制防范，将另一部分抗日軍关在城外，发给少数土炮，配合新疆土著部队与馬仲英作战。鏖战月余，抗日軍死伤惨重，迪化岌岌可危。嗣經苏联派兵救援，始将馬仲英击败。馬仲英率所部逃至喀什后，只身逃到喀什苏領館，要求保护进入苏境，并将卅六师殘部交給馬虎山指揮。馬虎山退至和闐、向盛世才提出在拥盛的前提下要求保存卅六师番号，軍需供应由和闐地方自筹，部队不归盛世才直接指揮等条件。张培元在伊犁也被苏軍击败自杀。盛世才乘战胜余威，于一九三四年收服了和加尼牙孜，委为新疆省副主席，并委其部属麻木提为騎兵师师长，和加尼牙孜的其他幕僚委为各厅处的厅长和副厅长等职。盛世才另一个布置是把尧乐博斯安排在哈密当县长。但尧的胃口太大，非哈密警备司令不愿就范。盛为了稳定局势，将計就計，委尧为哈密、鎮西（现为巴里坤县）警备司令。

盛世才为了分散抗日軍的力量，便于直接指揮起見，将抗日軍师旅番号取消，以团为单位，改編为騎兵第八团（駐鄯善），騎兵十二团（駐吐魯番），騎兵十六团（駐鎮西），騎兵二十团（駐古城，现为奇台），騎兵卅八团、騎兵四十团（駐喀什），騎兵第十团（駐焉耆）。一九三七年又混合新疆土著部队，增編騎兵四十六团（駐且末），四十八团（駐喀什），并編成喀什、和闐、阿勒太、塔城四个边卡大队，另編炮兵大队、战車大队、工兵队、通信队和教导团，均归盛世才直接指揮。另将抗日軍中有文化程度的青年选入新疆軍官学校、新疆宪警学校学习，并将抗日軍老弱分別拨归地方机关工作及編入各区警备司令部的警卫連。

盛世才將新疆內外部情況處理後，全疆在形式上已告統一。一九三五年，他將在新疆的德國、瑞士、英、印等外國教堂神父、傳教士等驅逐回國，有的因從事間諜活動更加以逮捕。一九三六年，盛世才禁止在新疆掛國民黨黨旗及國民黨國旗，將國民黨在新疆設立的海關、郵局等機關撤消，人員遣回內地。他並偽裝進步，要求蘇聯派專家顧問等來新協助整理財政、教育、軍事等，改訂學校教科書，命令全疆軍政幹部等學習馬列主義著作，部隊學習蘇聯的軍事學術，並進行各項和平建設事業。那時全疆呈現了穩定狀態。

一九三七年盛世才採用兩面手法，用六大政策作為幌子，製造了一個震動全疆的“大陰謀暴動案”。他以此為借口作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計有省副主席和加尼牙孜、教育廳廳長張馨、財政廳廳長胡壽康、民政廳長馬紹武、建設廳長郁文斌和省高級幹部桂芬、馮梁，以及抗日的高級將領劉斌、哈玉良、王孝芝、徐有興、張國祥、王玉庭等，地方上的民族王公喇嘛，蒙族的滿汗王、維族的沙親王、哈族的沙里福汗，宗教界馬良駿等大阿訇、大毛提，學校校長，軍隊里的團長，機關里的處長、行政長、縣長等，歸化軍里的團長以上的人員共七百餘人。硬說這些人要在慶祝“四一二革命”的機會掀起暴動，顛覆新政府。這一批被逮的人均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先後被秘密處死。

在盛世才製造大陰謀案大肆逮捕的期間，喀什騎兵第四師師長麻木提（和加尼牙孜舊屬，和加尼牙孜被盛世才收服，委為省副主席，和的兵力交與麻木提，編為騎兵第四師轄四個騎兵團，麻木提為師長）率兩個多騎兵團，並與哈密堯樂博斯串通反對盛世才。麻木提率兵至莎車，又與和闐卅六師馬虎山（馬仲英的殘部）聯絡一起，馬虎山由和闐出兵，在莎車與麻木提會合，攻打喀什。盛世才

分兵两路迎击，麻木提、馬虎山、尧乐博斯等均因力量不足而失敗。麻木提、馬虎山率小部逃入印度，尧乐博斯攜其家屬逃入关內。事后据盛世才公布說，麻木提、馬虎山等与英帝国主义勾結謀叛，占据南疆，并說尧乐博斯自駐哈密后，利用哈密地理条件关系，經常与国民党联系，說尧与麻、馬等叛变，系在英帝国与国民党指示下进行的。

## 五

盛世才自一九三三年夺取新疆政权，到公开投降国民党、于一九四四年离开新疆的前夕，十年来在新疆連年不断地制造各种阴谋，大肆逮捕，如馬良駿案、杜重远案、盛世祺案等等。一九三八年后，連苏联、中共派到新疆协助建設事业的工作人員，也都被盛世才制造种种借口加以逮捕，有的被秘密处死，如中共黨員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关于中共派到新疆协助工作的同志遭受盛世才殘酷杀害等情况，請參看楊南桂同志写的新疆監獄小冊子，这本书对于盛世才如何耍弄两面手法及殘酷迫害等情况都写得很詳細，我在这里不多写。）

一九四〇年后，当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莫斯科吃紧的时候，盛世才露骨地暴露出来反苏的凶恶面目。他首先把苏联派到新疆协助工作的王宝乾等遣回苏联，說这部分人是托洛茨基份子，不宜在新工作，請苏联調回处理。同时他把中共派到新疆协助工作人員也誣蔑为托派，加以逮捕，并說杜重远是日本汉奸。盛世才的亲兄弟盛世祺由苏联紅軍大学毕业回来不久，盛恐怕他在苏联学习后思想进步，对自己不利，竟派人将盛世祺刺杀，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又大逮捕一場，誣称这些被捕的人“反对督办，把督办的亲兄弟

都杀了”。盛世才为了投降国民党，消灭他的假亲苏亲共的口实，把几年来在苏联培养的留学生及部队中的政治指导员約千余人全部逮捕起来，其中絕大部分是东北抗日的軍官和青年进步分子。这部分人被逮捕后没有一个生还的，全部被盛世才殘杀了。

盛世才这个劊子手統治新疆十多年，到一九四四年他离开新疆时为止，据統計被他殘杀而死的約五万余人。他将要离开新疆时，为了把他在新疆与苏联、中共的关系及反对国民党的口实消灭干淨，每天从監獄提出来成千上万的人处死。但是这样还杀不过来，在他上飞机的前两天，借口說監獄囚犯暴动，派劊子手包围了監獄，准备大量汽油要焚燒監獄，想把逮捕的新疆各族各界人們都燒死，幸被张治中先生发觉制止，这部分人(約一万多人)才幸免于难。

## 六

东北抗日軍到达新疆后，在与馬仲英等作战中伤亡的以及病老而死的，不过五千人，而十年来被盛世才逮捕杀的竟达一万多人。一九四四年盛世才离开新疆时，国民党政府接收的新疆部队，計有騎兵十团、十二团、十六团、二十团、三十八团、四十团、四十六团、四十八团、四个边卡大队和通信队、工兵队、炮兵团、教导团。这些部队的官兵，在一九三四年盛世才整編时，东北抗日軍占80%以上，到了一九四四年国民党反动派接受时，这些部队番号未变，但东北抗日軍官兵只占20%左右，只有个别的占50%左右，总起来东北抗日軍官兵在这个时候在部队中不过五千人。另外就是十年来被淘汰下来的老弱殘废的抗日軍共約二千人，其中有的在地方机关中当个小职员；有的流落各地，以摊販为生；有的当了泥瓦工；也有的流落街头当乞丐。再下余的就是被害的抗日軍官兵的家属

們。抗日軍里還有少數敗類如李溥霖、李英奇等到達新疆後即甘受盛世才利用，在抗日軍中挑撥破壞，當了盛世才的忠實幫凶。這些人後來均隨盛世才離開新疆。以後李溥霖又隨盛世才逃到台灣；李英奇解放前在北京潛伏，解放後被人民檢舉，解到新疆，經新疆各族人民公審後已被鎮壓。這是東北抗日軍三萬多人到新疆後在盛世才統治時期的遭遇的大概情況。

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反動派開始統治新疆，將東北抗日軍又整編了一次：把十六團、二十團及哈密邊卡大隊編為第一師，駐綏來；把十團、十二團及教導團的一部合編為一二八師，駐焉耆；把四十團、四十八團及喀什邊卡大隊合編為騎兵第十二師，駐喀什；把卅八團、四六團及和闐邊卡大隊合編為騎兵第二師，駐莎車、和闐。各師師長和部分團長全由國民黨反動派另外委派。各團中的原東北軍軍官大受歧視排擠，有的被迫離職另謀生活，也有的離開新疆，到達甘肅、陝西一帶另謀生活的。

國民黨反動派懷疑抗日軍受了紅色影響很大，加以種種歧視，還逮捕了一些人。它為了瓦解這部分力量，用遣送還鄉的辦法來分散抗日軍。一九四六年東北抗日軍部分官兵約一千五百多人被遣送還鄉，但是實際上國民黨反動派把他們送到蘭州以後，就扔下不管了。

## 七

一九四九年初包爾漢當了新疆省主席，領導新疆各族人民爭取和平解放新疆。在新疆被編入國民黨各部隊的東北抗日軍，如劉金泉騎兵團、于學志騎兵團、洪亞東騎兵團、昌生祥騎兵團、王玉昶騎兵團，經過張鳳儀的聯絡與包爾漢主席接上關係，接受包爾漢



主席的領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起义 这年九月,在全疆人民的支持下,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神速地打垮了西北馬步芳匪軍,迅速由甘肅向酒泉挺进,使新疆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部队进退維谷。他們曾一度要死守迪化,与解放軍頑抗到底,最后不得已时拟在迪化烧杀搶掠后退至喀什,再退到印度。由于包尔汉主席的正确領導和三区革命民族軍的配合,駐在新疆的反动派軍队始終未能得逞。在新疆的各民族人民強大压力下,反动派的高級軍官如騎五軍(青海馬家部队)軍长馬呈祥、第二軍軍长叶成、师长罗恕仁、鍾祖蔭等認为大势已去,而且由于部队中抗日軍的影响,已呼喚不灵,乃不得不放下枪杆,各自离开軍队,帶少数亲信由迪化逃至喀什,由喀什进入印度,轉道香港逃往台灣。

新疆和平解放后,在新疆的东北抗日軍除一部分編入国防軍守卫祖国边防外,其余在大生产中都編入新疆軍区生产建設兵团参加生产。几年来有的把东北的家属接到新疆,有的已在新疆成立了家庭,他們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安心于建設祖国边疆,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